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論貪腐與拉美左翼退潮—以司法制衡的角度分析

Corruption and the Ebbing of Pink Tide:

The Rise of Judicial Constraint

陳光震

Kuang-Chen Chen

指導教授：張佑宗 博士

Advisor: Yu-Tzung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論貪腐與拉美左翼退潮—
以司法制衡的角度分析

**Corruption and the Ebbing of Pink Tide:
The Rise of Judicial Constraint**

本論文係 陳光震 君（學號：R07322002）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9 年 1 月 8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張佑宇

（簽名）

（指導教授）

許考斌

邱振華

謝辭



加入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是碩班生活的轉捩點，每週開會時大家輪流發表碩論進度，彼此學習，由張佑宗老師給予理論及研究方向上的修正建議。此外與煥凱學長、忠偉學長、晨心、家洋及東亞的各位夥伴們的討論，都為論文注入新的想法，讓這篇論文能順利完成。

俞振華老師、蘇彥斌老師以及張佑宗老師，都是我學術生涯重要啟蒙老師。大學時俞老師指導的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開啟我對量化研究的興趣；蘇老師指導研究所推甄的研究計畫大綱，是我對拉美研究的濫觴，也是這篇論文的起始點；張老師是我學術研究集大成者，指導如何建構理論框架、限縮成更明確的題目，並結合所學，以量化方式分析拉美區域現勢。

感謝研究室的啟安、冠霆、王貿、江軍、大猷學長們，從我踏入研究所的第一天就灌輸研究所生存法則，彼此在研究方法及主題方向上的研討對這篇論文的完竣貢獻良多。也要感謝政研所一起修課、做報告的同學們，一同面對作業與考試的挑戰，互相學習，共同成長。

最後要感謝撫育我成長的家人，從高中選讀文組，大學修讀政治系、外交系、赴西班牙修讀國際關係，至回國進修研究所，在人生道路上都尊重我的選擇，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回顧大學到碩士的六年政治系生涯，學的不是背誦的知識，而是看世界的角度，拓展對於事件的思考層面以及分析架構。而今研究所生活將畫上句點，將要踏入職場開啟新的人生篇章，在校園習得的批判性思考，將成為未來面對挑戰的利器。

得之於人者太多，期許能夠貢獻一己之力回饋社會，秉持服務的心為這塊養育我的土地付出，踏入外交領域拓展我國國際空間。

中文摘要



從新自由主義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左翼浪潮，意識形態的轉變在拉丁美洲研究一直被廣泛地討論。對於近年來左翼浪潮的衰退現象，本文以委任式民主理論為基礎，認為選民對左翼領導人貪腐行為的課責是關鍵因素，而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有助於對貪腐的揭露。

本文分成兩部分檢驗這個觀點，首先以總體層次資料分析，發現左翼浪潮以降，當選民愈認為政府貪腐，左翼得票率愈低，且在領導人意識形態右轉的國家中，選民對政府的貪腐感受有上升趨勢。換句話說右翼候選人之所以能取代左翼執政者贏得選舉，可能與選民對政府的貪腐感受有關。此外，經觀察發現右轉國家中，總統受司法起訴的比率較高，且右轉國家的司法制衡力量亦有上升趨勢。本文續以事件史分析，發現左翼政府若面對高司法制衡力量時，失去政權的可能性較高。最後，透過初步的質化研究，驗證左翼執政者具有委任式民主領導人特徵，以及在右轉國家有貪腐案件的浮現，且政府努力改善司法制衡力量。

個體層次以複層次迴歸檢驗假設，確立選民貪腐感受對投票行為的影響以及司法制衡的調節作用。另外，經由從左翼浪潮崛起到退潮兩個時間點的比較，發現選民所關注的國家問題有結構性變化，右轉國家選民最重視的議題從經濟轉至貪腐議題，符合左翼以經濟問題崛起，因貪腐議題受到課責的觀點。

關鍵字：左翼浪潮、右翼政黨、委任式民主、貪腐、司法制衡

Abstract



CORRUPTION AND THE EBBING OF PINK TIDE :
THE RISE OF JUDICIAL CONSTRAINT

by

KUANG-CHEN CHEN

July 2020

ADVISOR: YU-TZUNG CHANG, Ph.D.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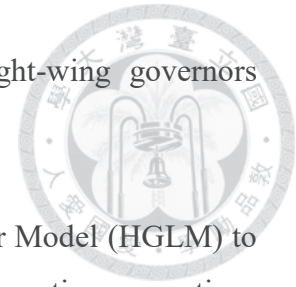
DEGREE: MASTER OF ART

KEY WORD: Pink Tide, Right-wing parties, Delegative Democracy, Corruption, Judicial Constraint

From neoliberalism to the Pink Tide, ideology has been a topic worthy of discussion in Latin America. With the purpose of explain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ebbing of the Pink Tide, we adopt the theory of O'Donnell's delegative democracy, presuming that corruption is a key factor in this outcome. Furthermore, we argue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judicial constraint, which is treated as the moderator in this research, increases the exposure of politicians' corruptive behavi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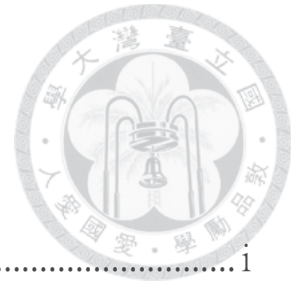
The research consists of two levels of analysis to examine this point of view. At the macro level, the data shows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ink Tide, the higher the voters' corruption perception, the fewer votes the left-wing parties can get. Besides, there is an ascending tendency towards the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the right-turn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judiciary, there is a higher rate of judicial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presidents in the right-turn countries. Moreover, the power of judicial constraint also has a rising tendency in these countries. By means of the surviv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left-wing governments are more likely to lose power if they face a high level of judicial constraint. Through preliminary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se countries are in concordance with our argument. The left-wing governor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legative democracy.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around these right-turned countries, and the new right-wing governors commit to stamp out corruption during their electoral campaig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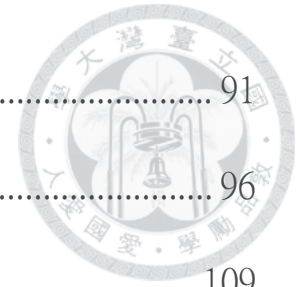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e use 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HGLM)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 corroborates the impact of voter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on their voting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judicial constraint. By taking the tim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 is a structural change on the major national issues in comparison of the rise of the left-wing parties and the ebbing of the Pink Tide. In the right-turned countrie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voters shifts from economy to corruption issue. This transition corresponds with our perspective that the left-wing parties arise from voters' economic concern, but decay due to the corruption issue.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章節安排.....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5
第一節 拉丁美洲的左右翼之爭.....	5
第二節 拉美的左退右進.....	20
第三節 貪腐與左翼.....	26
第四節 左翼與委任式民主理論.....	32
第三章 總體層次分析.....	47
第一節 資料初步分析.....	47
第二節 事件史分析.....	56
第三節 案例討論.....	60
第四章 個體層次分析.....	91

第一節 資料來源與變數設計.....	91
第二節 實證模型分析.....	96
第三節 解讀民意支持的變化.....	109
第五章 結論.....	115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15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116
參考文獻.....	117
中文部分.....	117
西文部分.....	117
網路資料.....	126



圖目錄



圖表 2-1	貪腐影響重分配政策的途徑	19
圖表 2-2	2008 年政府意識形態	21
圖表 2-3	2018 年政府意識形態	22
圖表 2-4	總統制下的委任式民主.....	33
圖表 2-5	司法制衡力量調節投票行為示意圖.....	45
圖表 3-1	貪腐印象指數變化	48
圖表 3-2	水平制衡能力變化.....	53
圖表 3-3	1998-20018 經濟成長率.....	54
圖表 3-4	拉美吉尼係數變化.....	55
圖表 3-5	資料結構示意圖	57
圖表 3-6	Kaplan-Meier 估計	58
圖表 3-7	Cox 比率危險模型.....	59
圖表 3-8	未右轉國貪腐印象指數變化	67
圖表 3-9	未右轉國司法制衡能力變化	67
圖表 4-1	司法與貪腐交互作用－左翼執政時期.....	108
圖表 4-2	司法與貪腐交互作用－右翼執政時期.....	108

表目錄



表格 2-1: 民粹左翼領導人 (1998-2009)	10
表格 2-2: 左右翼政黨變化	23
表格 2-3: 委任式民主與代議民主的差別	42
表格 3-1: 政黨得票率與貪腐印象指數	48
表格 3-2: 學生 T 檢定	49
表格 3-3: 國會彈劾下台的總統	49
表格 3-4: 受起訴的總統	51
表格 4-1: 變數與操作化指標	95
表格 4-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98
表格 4-3: 交叉效果測試	99
表格 4-4: 複層次迴歸完整模型	101
表格 4-5: 敘述統計摘要表－左翼執政時期	103
表格 4-6: 敘述統計摘要表－右翼執政時期	103
表格 4-7: 分層估計結果	105
表格 4-8: 勝算比	106
表格 4-9: 國家主要問題－未右轉國家	111
表格 4-10: 國家主要問題－右轉國家	11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近年拉丁美洲右翼政黨在選票上屢有斬獲，如阿根廷(2015)、智利(2017)、巴西(2018)都由右翼總統取代原本的左翼執政者，本文首先討論左右翼意識形態在拉美為什麼重要，並證實左翼退潮的現象存在，接著回答「是什麼因素造成左翼的退潮？」。

目前學界討論聚焦在左翼崛起的成因，對於左翼退潮的文獻討論仍有不足。本文認為左翼退潮的主要原因是貪腐議題的影響，而貪腐議題之所以成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是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故筆者從 O'Donnell (1994)的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理論切入，在這樣的觀點下以經濟為號召的左翼浪潮領袖具有委任式民主領導人特徵，而委任式民主的產生是因為新興民主國家的水平課責機構缺乏制衡力量，剩下總統對選民選票負責的垂直課責機制。

在缺乏水平課責的前提下，利益交換的貪腐行為油然而生。拉美新興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與水平課責機構因受制於具個人魅力的委任總統而被弱化，此時總統作為國家救星的角色，強調反機構並將行政權高度集中化且個人化，而個人魅力領導人所領導的泛意識形態政黨需要靠買票取得不同政黨的立委支持，如巴西在 2005 年的 Mensalão 貪腐案。

隨著左翼執政帶來的貧窮人口減少、教育與醫療等社會福利提升，人民不再以經濟改善作為唯一的投票準則。而司法制衡力量的增強，讓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體系能對於政府貪腐案件起訴，經由媒體的報導影響選民對執政者的觀感，讓貪腐議題在近年對選民投票行為有更顯著的影響。

是以本文主張近年右轉國家的新右翼產生，是因為司法制衡力量增強後，左翼執政者受到司法起訴，而被揭露的貪腐行為使選民對執政者感到不滿，如巴西左翼領導人 Dilma Vana Rousseff 受到國會彈劾、阿根廷前總統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因貪汙受到司法起訴。反觀持續由左翼執政的國家則係因人民需要由國家救星形象的領導人來改善其生活，經濟仍為選民心中最關注的議題。且在這些國家中左翼執政者未有貪腐醜聞，或是司法制衡力量較弱不足以揭發貪腐行徑，是故貪腐並沒有成為選舉中的重要議題。


在實證上本文首先以貪腐印象指數觀察，發現 1998 年至 2018 年間右轉的國家貪腐印象指數有下降的趨勢，即右轉國家的選民自左翼浪潮以來愈漸覺得政府貪腐。進一步觀察貪腐印象指數與政黨得票率的相關係數並採用學生 t 檢驗，證實「若選民愈覺得政府貪腐，左翼政黨得票率愈低」。

在水平制衡的部分，觀察拉美近年因國會彈劾而下台的總統以及受司法起訴的總統，發現受彈劾或受起訴的總統多屬於右轉國家的總統，且受起訴的時間多於本研究之左翼退潮時間段 2008 年至 2018 年間。並經由司法制衡能力指數與國會制衡能力指數，發現右轉國家不論在司法制衡或國會制衡力量都明顯高於未右轉而維持左翼執政的國家。此外本文亦透過吉尼係數證實拉美右轉國近年貧富差距確有縮減，貧窮減少也可能是使經濟議題對選民投票行為影響減低的原因。

在確立貪腐與左翼得票率的關聯性，並比較在右轉與未右轉國的水平制衡能力後，為考量左翼退潮的時間因素，本文以事件史分析觀察這些國家在不同司法制衡力量下，左翼隨時間失去政權的可能性。分析發現從 2008 到 2018 年間隨時間的推進，高司法制衡下的左翼失去政權而右轉的可能性，明顯比低司法制衡的左翼執政國家高。在確立左翼政黨得票率、貪腐感受與司法制衡之間的關係後，以個案研究觀察未右轉國與右轉國的左翼領導人是否符合委任式民主的論述，以及右轉國是如何提升其司法制衡力量。

個案研究發現未右轉國家如委內瑞拉的 Nicolás Maduro、尼加拉瓜的 Daniel Ortega、玻利維亞的 Evo Morales、厄瓜多的 Rafael Correa、烏拉圭的 Tabaré Vázquez 都有委任式民主特徵，並在不同程度上弱化水平課責機構。如 Nicolás Maduro 以總統命令通過法律、控制法院與選舉、購買媒體等方式弱化水平課責機構；Ortega 與 Morales 則是不理會憲法的任期限制，繼續參與選舉並有選舉舞弊的疑慮；Correa 則於 2008 年通過新憲法取代 1998 年憲法，將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

右轉國家中的前左翼總統也有委任式民主領導人特徵，然而讓貪腐議題浮上檯面的司法制衡力量則以不同方式提升。諸如公民團體的助益，如阿根廷有合法



正義(Justicia Legítima)推動司法部門民主化；司法部門的改革，如阿根廷最高法院修改國家治安法官委員會(Consejo de la Magistratura)成員組成、巴西設立國家司法委員會(Conselho Nacional de Justiça)；與國際組織合作打擊貪腐的方式，如瓜地馬拉與聯合國合作成立的「瓜地馬拉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Comisión Internacional Contra la Impunidad en Guatemala)、薩爾瓦多與美洲國家組織合作成立的「薩爾瓦多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Comisión Internacional Contra la Impunidad de El Salvador)、巴拿馬的「捍衛國際金融服務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Defens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政府推動的反貪腐法案，如巴西 2013 年的反貪腐法案(Anti-Corruption Law)與犯罪組織法(Criminal Operations Law)；反貪腐政策建議機構的設立，如智利總統 Bachelet 設立排除政治人物的技術委員會來建議反貪腐政策。

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讓右轉國許多領導人因而受到起訴，而新上任的右翼多為超脫傳統左右翼政黨的政治局外人，與既有政治菁英的貪腐形象脫鉤，並以打擊貪腐為競選承諾，如阿根廷的 Mauricio Macri、薩爾瓦多的 Nayib Bukele、巴西的 Jair Bolsonaro。

在個體層次分析上則以複層次迴歸驗證貪腐議題在左翼退潮中確實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左翼執政時期若選民愈認為執政者貪腐，愈傾向投給右翼政黨。且相對於低司法制衡國家而言，高司法制衡國家的選民對於貪腐議題的課責更強，將選票投給對立意識形態政黨的可能性更高。並且在貪腐課責的效果上對左翼執政者的課責效果比對右翼執政者的課責效果強。

考量個體層次的時間因素，觀察選民關注的議題在左翼高峰期與左翼退潮期間是否有明顯轉變。經由右轉國家在 2008 年左翼高峰期，與左翼政權下台當年的關注議題比較發現：「認為經濟是國家主要問題的總變化下降 54%；認為貪腐是國家主要問題的總變化上升 25%。」可以見到選民關注的議題確實存在結構性轉變。

最後必須聲明的是本研究所論述之左翼退潮現象並不表示右翼的崛起，選民自認意識形態並沒有大幅改變。貪腐議題對左右翼政府皆存在課責效果，若新右翼無法實踐其倡議的反貪腐政策亦可能因此失去政權。此外右轉國司法制衡力量的增加亦不能推論為民主的提升，在弱政黨體系與弱公民社會的政治環境下，高水平制衡會侵蝕垂直制衡形成失根民主的現象。

第二節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前言的部分是通篇研究的主旨，闡明研究動機並說明為什麼左翼意識形態的退潮在拉美是值得被關注的議題、過去學者在這個主題有什麼看法，並提出本文的觀點，接著概括統整本文的研究發現、學術貢獻以及限制。本節的章節安排中則告訴讀者接下來將如何分析這個問題。

第二章是對於文獻的梳理，首先告訴讀者左右翼意識形態在拉美地區的重要性，既有研究多聚焦於新自由主義的引入到左翼浪潮的出現，然而鮮有左翼退潮的相關研究，故本文藉由過去關於左翼浪潮文獻的對話，以及近年左翼國家右轉的研究成果探討，發現貪腐與左翼政權的消亡有關，故深入討論左翼與貪腐的關係，並以委任式民主理論中司法制衡的概念，解釋貪腐議題如何逐漸成為影響拉美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議題，以形成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設。

第三章以總體資料證實貪腐感受與左翼得票率有關，且右轉國家水平制衡力量確實較高。並以經驗資料佐證研究時段 2008 年到 2018 年間經濟下滑讓左翼執政受到壓力，而不論左右翼執政下的吉尼係數都有下降，讓以重分配政策為號召的左翼吸引力降低。為考慮時間因素影響，並突顯「退潮」現象，以事件史分析論證「司法制衡力量較高的國家，左翼較可能失去執政權」，因為司法制衡力提升會讓人民關注貪腐議題。最後以未右轉國家與右轉國家的案例研究，說明本文理論中水平制衡—尤其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如何讓貪腐議題成為左翼失去政權的原因。

第四章以個體問卷資料分析，首先呈現左翼崛起到左翼退潮時期，選民關注議題從經濟到貪腐的結構性改變。接著闡述迴歸模型的選擇，以及依變數、自變數、調節變數與控制變數的選用及資料來源，並呈現統計結果探討拉丁美洲左翼國家在 2008 至 2018 年間是否會因為貪腐感受影響其投票行為，且這種影響會不會因司法制衡力量的提高而增加。

第五章結論部分會針對問題意識、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間的關聯進行討論，並說明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拉丁美洲的左右翼之爭

為什麼左翼退潮是一個值得被研究的議題？左右翼之爭在拉美有其歷史背景，債務危機造成右翼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從 1970 年代中期智利「發揮私人積極性，國家只起補充作用」，歷經 1985 年的貝克計畫(Baker Plan)、1989 年的華盛頓共識，到 1994 年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生效，奠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

但新自由主義使拉美地區貧富差距加大，經濟因素讓兩千年後拉美政治向左轉，以盧拉的區域性布雷爾主義與查維茲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為代表(March, 2007: 72)，其支持者以鄉村、本土原住民等低收入選民為主，期許政府以重分配政策改善其生活。這股粉紅浪潮¹(Pink Tide)反對私有化以及國際貿易的自由化，是對於 199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反撲。

對於左翼浪潮持反對看法者認為選民的意識形態並沒有大幅向左移動(Baker & Greene, 2011; Remmer, 2012)，且並非所有左翼領導人都採行重分配政策(Biglaiser, 2016; McNulty, 2017)，尤其在農業改革上成效更為匱乏(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Vergara-Camus & Kay, 2017)。對於為什麼不採取重分配政策的原因，貪腐是一種解釋途徑。Sánchez & Goda (2018)提及四種貪腐讓重分配政策無法實踐的解釋途徑。但若沒有採取重分配政策，如何解釋各國吉尼係數下降的事實呢？Mathew (2017)指出侍從主義亦為一種降低貧富差距的方式。

左翼浪潮是過去重要的研究議題，而對近年左翼退潮現象的相關討論較少。於本節回顧左右翼討論的相關文獻之後，下節將探討左退右進的左翼退潮現象。

¹ 粉紅浪潮(Pink Tide)亦稱為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新發展主義(neo-developmental)或後新自由主義(post-neoliberalism) (Rojas, 2017; Colburn, 2019; Oyhantçabal, 2019: 124)。



壹、左右翼之定義

定義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包含演繹性定義與歸納性定義。Bobbio (1995)採用演繹性定義，認為在當代世界，左翼和右翼黨派之間的差異源於對平等的不同觀點。右翼政黨關注的是機會平等，相對地左翼政黨強調結果的平等。換句話說，右翼認為不平等是自然而難以根除的，反之左翼認為不平等是社會建構的，因此需要通過重分配政策來改變這種情況。Nikolajczuk & Prego (2017)回顧學界對左右翼的討論後亦同意這種看法，認為左右翼之間最根本的差別在於平等與不平等觀點的二元對立面(Nikolajczuk & Prego, 2017: 9)。

另一種是歸納性的定義方式，Baker & Greene (2011)以政府政策偏好為劃分左右翼的判準，將右翼定義為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左翼定義為國家導向(country-oriented)。Castañeda (2006)認為拉美左翼浪潮的特徵是強調社會政策，包含教育、對抗貧窮、健康照顧以及住房保障。

是故我們可以假定左翼普遍不贊成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左翼選民傾向反對市場改革以及自由貿易，進而預期左翼政府更可能背離市場政策，改而採行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Biglaiser, 2016: 187)。

貳、新自由主義在拉美

一、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發展

拉美在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到九零年代初期，幾乎所有政府都從中央經濟調控政策(statist policy)轉向到市場導向改革(Biglaiser, 2016: 185)。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阿根廷的 Carlos Menem、秘魯的 Alberto Fujimori、玻利維亞的 Víctor Paz Estenssoro 與 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巴西的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厄瓜多多的 Jamil Mahuad Witt 以及巴拉圭的 Juan Carlos Wasmosy (Nikolajczuk & Prego, 2017: 4)。拉美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政府所採行的緊縮開支政策(retrenchment)與先進工業化國家不同，後者的緊縮開支政策受到先前政策設計、政策遺風(policy

legacy)與既有政策的廣大支持者所影響，因此緊縮開支政策並不受歡迎(Pierson, 1996)。

新自由主義的起因為拉丁美洲國家在七零年代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主導的石油價格攀升與發達國家經濟成長停滯的影響，工業化進程放緩，拉美國家因而走向大規模舉借外債來發展經濟的道路。而八零年代美國與歐洲採取通貨緊縮政策，造成國際利率大幅上調，使眾多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如 1982 墨西哥宣布延長歸還債務，隨後幾個月巴西也宣告無法如期償還。於此西方債權國與國際金融機構施壓，加上西方輿論鼓吹新自由主義，宣傳市場化改革是擺脫困境的唯一方法(Skidmore et al., 2010: 368)。

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演變有四個階段。第一個是七零年代中期的智利的首都聖地亞哥，當時的獨裁政府 Augusto Pinochet 將軍發布法令(Decree Law) 3500，廢除國家主辦的年金體系，把退休金制度私有化。在新的年金體系下，工人不能再透過國家社會保險作為其退休生活基金的規劃，新自由主義在智利以「發揮私人積極性，國家只起補充作用」的方式實施(Brooks, 2009)。

第二階段是 1985 年貝克計畫(Baker Plan)對舉債國的改革要求，貝克計畫追求兩個目標：一是提供貸款為條件，迫使拉美國家在債務危機的困境中接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化改革；二是緩解債務國經濟壓力，以免最後喪失償還能力。第三階段是 1989 年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是國際貨幣基金顧問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於 1989 在英國參加發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研討會，為布雷迪計畫(Brady Plan)政策背書所提出的十項具體改革，包含遵守財政紀律(Fiscal discipline)、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優先順序(Reordering public expenditure priorities)、稅制改革(Tax reform)、金融自由化(Liberalization of interest rates)、競爭性匯率(Competitive exchange rate)、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開放國外直接投資(Liberalization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國有企業民營化(Privatization)、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和確立財產所有權(Property rights)，這十條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Skidmore et al., 2010: 369-370; Williamson, 1990: 3-4)。至此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實驗」已從智利擴展到其他國家，而這十項改革是從拉美眾多國家歸納而成。第四階段則是 1994 年 1 月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生效，

以及同年年底於邁阿密舉辦的美洲峰會(Summit of Americas)中，對於 2005 年簽署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的願景(Skidmore et al., 2010: 371)。

總的來看，在 1980 到 1990 年代，拉美國家普遍採取緊縮社會福利開支(retrenchment)的方式。例如在智利有右翼的獨裁政府 Augusto Pinochet；在阿根廷有工人動員組織貝隆主義(Peronist)政黨的總統 Carlos Menem 的自由化社福計畫。而拉美的緊縮開支政策是源於債務危機、社會保險機構表現不良、民主角色薄弱、公民社會的積弱與左翼政黨的脆弱(Brooks, 2009)。

二、 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發展

但新自由主義下的拉丁美洲國家真的有因此發展起來並解決債務問題嗎？答案是否定的。學者 Sala-i-Martin (2002)計算世界收入分佈，以加權人均收入(population-weighted income per capita)作為該國的收入分佈平均值，再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的購買力評價調整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PPP-adjusted GDP per capita)為測量收入的方式，得出 1970 到 2000 年之間的世界貧窮²在各區域的分佈狀況，而拉丁美洲地區在世界的貧窮比率從 1970 到 1980 年有下降趨勢，但隨後又回升，2000 年時達 5.3%高於 1970 年的 4.0%。

Costa (2018)認為新自由主義無法讓拉丁美洲國家經濟成長的原因，在於公民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利的取得先後順序不同。西方國家在採行民主政治，公民取得政治權利之前，已有普遍平等的社會權利；而拉美國家在沒有基本公民權利的前提下擴張其政治權利，此時國家仍處於世襲制度以及侍從制度下，新自由主義去管制化的概念使得國有資產經由貪腐的形式進入私部門並世襲至下一代，造成極端不平等的社會產生(Costa, 2018: 81)。

² 以世界銀行的貧窮線計算，日收入低於 1.5 美元或年收入低於 570 美元。



參、 拉美政治向左轉

一、 拉美的發展困境

過去殖民時期的拉丁美洲與歐洲市場建立起的貿易依賴，在獨立後仍繼續出口初級產品，沒有在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進行變革。儘管以進口替代的方式，透過調高關稅、工業享有優惠稅率、低息貸款、稅收激勵及國有化的方式保護工業發展，但在 1970 年代因油價驟然攀升而走向舉債(Skidmore et al., 2010: 380-381)。

而 1980 到 1990 之間拉丁美洲國家採行新自由主義後，對於國際市場高度依賴，而這些國家無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包含安全、社會正義、少數族群的保障、以及公民社會的積弱與貧窮(Costa, 2018: 80-81)。在這樣的經濟、社會危機背景下，公民對於政黨信任降低，對民主的信任也降低(Costa, 2018: 81-82)。

Kaltwasser (2014)指出，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左轉」的原因可歸因於自由主義政策的現代化進程失敗。由於不平等議題的政治化、對美國的怨恨、以及全球市場中原料價格的提升，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導向意識形態不再像過去受到人民喜愛。

二、 左翼的發展

拉美的左轉開始於 1998 年前委內瑞拉總統 Hugo Chávez 傾向採取憲政改變 (constitutional changes)，如透過憲政慣例(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制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ies)的方式集中行政權並弱化司法、立法權，目的係以提高社會福利政策、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公共服務支出，來減少貧窮與不平等的現象(Seligson, 2007)。此外玻利維亞的 Evo Morales、厄瓜多的 Rafael Correa 分別在 2006 年、2007 年取得執政權，智利的 Michelle Bachelet、巴西的 Lula da Silva、古巴的獨裁政府 Fidel Castro、尼加拉瓜的 Daniel Ortega、瓜地馬拉的 Álvaro Colom 以及薩爾瓦多的 Mauricio Funes 也是左翼政府的代表。在阿根廷、圭亞那、烏拉圭、秘魯也都有左翼政府的出現，特別是在 2005 年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的簽署失敗後，注重國家在財富重分配角色的左翼來到高峰

(Houtart, 2017: 3-6)。而左翼浪潮之所以能出現或許和美國歐巴馬總統執政下的友善國際環境有關(Colburn, 2019: 167)。

表格 2-1: 民粹左翼領導人(1998-2009)

國家	年分	總統	政黨
阿根廷	2003	Néstor Kirchner	Partido Justicialista
	2007	Cristina Fernández	Partido Judicialista
玻利維亞	2005	Evo Morales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巴西	2002	Luiz Ignácio Lula da Silva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2006	連任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智利	1999	Ricardo Lagos	Partido Socialista/ Concertación
	2006	Michelle Bachelet	Partido Socialista/ Concertación
厄瓜多	2006	Rafael Correa	Alianza País
	2009	連任	Alianza País
薩爾瓦多	2009	Mauricio Funes	Frente Faribundo Martí para la Liberación Nacional
墨西哥	2006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ática
尼加拉瓜	2006	Daniel Ortega	Partido 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秘魯	2006	Ollanta Humala	Unión por el Perú/ Partido Nacionalista Peruano
巴拉圭	2008	Fernando Lugo	Alianza Patriótica para el Cambio
烏拉圭	2004	Tabaré Vázquez	Frente Amplio
委內瑞拉	1998	Hugo Chávez	Movimiento V República
	2000	連任	Movimiento V República
	2006	連任	Movimiento V República

資料來源：Remmer (2012: 950).



(一) 具有經濟民粹色彩的左翼

左翼浪潮中的左翼領導人具有經濟民粹的特徵。民粹主義³主張依靠民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並積極動員民眾廣泛參與政治進程。在過去阿根廷的貝隆主義(1945-1955)⁴便具有民粹主義的特徵，會採用譁眾取寵的(demagogic)煽動性言語並利用侍從政策將公共資源用於博取大眾支持(Oyhantçabal, 2019: 123)。制度化的政黨能藉由競爭性選舉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候選人，並助其進入國會代表人民對行政部門產生制衡力量(Ezrow, 2011: 9)，而脆弱的政黨體系或政黨解組(dealignment)會利於救世主般的領導人(messianic leader)贏得選舉勝利，一旦勝選後這些領導人會採取抑制國會中反對黨的相關舉措(Biglaiser, 2016: 189)。

兩千年後左翼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⁵的興起可歸結與兩個原因，第一個是隨著社會現代化發展，菁英所把持的舊有建制開始衰弱，利於使未被組織化的群眾受到政治動員。第二是嚴重的經濟問題使這些舊有政治階級被去正當化(delegitimated)，讓超凡魅力的領導人能吸引廣大人民，並繞過如政黨、工會等傳統管道與人民取得連結(Weyland, 1998: 113-114)。左翼民粹強調動員人數廣大且同質性高的基層人民，來對抗腐敗的政治菁英，藉以抹去傳統的社會分立。具有社會主義、反菁英、賦權(empowerment)、包容、道德與福利的特徵(March, 2007: 65)。

根據問卷調查 Americas Barometer 的結果指出，自認為左翼的人傾向認為他們的政治體系缺乏正當性，且較不支持民主制度(Seligson, 2007)。該調查用以測量民

³ 民粹主義有時會和具有廣大民意基礎的個人魅力領袖混淆，民粹主義代表著對於基本民主所保障的公民自由的濫用，特別是言論自由。民粹主義者認為立法機關和法院的制度是不合時宜、不合效率的，與「人民意志」的真實表現不符。然而民粹領導人通常只實現自己的意志而非傾聽人民，並阻絕那些與自身意見相悖的反對者(Seligson, 2007)。民粹主義是一個反覆無常的(chameleonic)的概念，會依據不同背景脈絡變化，與保守主義或社會主義結合，但在本質上是中立的(March, 2007: 64-65)。

⁴ 貝隆主義(Peronism)源自阿根廷 1940 年代的 Juan Domingo Perón，結合經濟民粹主義、重分配與國家主導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致力於追求社會正義，故又稱正義主義(Judicialism)。阿根廷總統 Eduardo Duhalde 是貝隆主義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領導阿根廷政治改革，於 2003 年支持 Néstor Kirchner 角逐阿根廷總統，故 Kirchnerismo 也受貝隆主義影響(Costa, 2018: 82; March, 2007: 65)。

⁵ 1930 到 1950 年代的民粹主義者以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為目標，將其納入政黨和工會等新組織中；新民粹主義者反而吸引那些被排斥在這些組織之外的人，例如農村貧困人口。新民粹主義者主要通過電視媒體觸及他們的追隨者，同時透過民調了解人民的意願。他們聲稱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並反對「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與既有的政治菁英及利益團體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Weyland, 1998: 114)。

主支持方式有兩個項目，第一個是 Winston Churchill 問題⁶，第二個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 和 David Easton 所提的正當性(legitimacy)。其結果發現越左派的人對當前政府的正當性與民主制度支持率越低，意識形態相對靠右的選民對政府正當性與民主制度支持率則較高。可見左翼民眾比較不相信自己國家的政治體系具有正當性，不相信政黨、立法、司法等自由民主的制度，而傾向支持強領導人⁷。

(二) 左翼支持者的人口特徵

在支持者的部分，左翼浪潮的政府多仰賴鄉村及原住民的運動，並且訴諸於對窮人的承諾，促使委內瑞拉(1998)、巴西(2003)、阿根廷(2003)、烏拉圭(2004)、玻利維亞(2005)、厄瓜多(2006)、尼加拉瓜(2006)、巴拉圭(2008)、薩爾瓦多(2009)的左翼上台(Debs & Helmke, 2010: 220)。

這些國家的農民運動多與農民之路⁸有關，而在拉美國家農民運動是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前線。譬如巴西的無地工作者運動⁹和巴西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PT)有長期聯盟關係；玻利維亞左翼領導人 Evo Morales 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¹⁰也和原住民運動、社會運動、工會以及其領導的古柯運動(Cocalero movement)有關；厄瓜多的左翼領袖 Rafael Correa 在 2005 年勝選也有賴於原住民運動，如全國原住民族聯會以及全國農民、原住民與黑人聯會(Federación Nacional de Organizaciones Campesinas, Indígenas y Negras, FENOCIN)的支持，然而上述兩團體都沒加入 Correa 的政黨主權祖國聯盟運動(Alianza País, AP)；在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⁶ 是否同意以下論述：「儘管民主有很多問題，但它仍比其他政府體制來得好。」

⁷ 在西歐由於穩定的政黨體系以及議會制度體系的背景，使得具有個人魅力的左翼民粹領導人較無崛起的空間。但在拉美具有囊括型政黨(catch-all party)與個人化領導的傳統，自威權垮台至民主轉型，以及從農業出口轉至國家領導的工業化運動，再加上委任式民主下的弱機構特徵，讓左翼領導人具有民粹色彩(March, 2007: 69-70)。

⁸ 農民之路(La Vía Campesina)是由農民、中小型生產者、鄉村女性、原住民社群、新興農業工作者、佃農組成的國際運動，旨在保護農業家庭與永續發展。這個聯盟發起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的概念，作為地方糧食生產及農牧業村落的權利(Martinez-Torres & Rosset, 2010: 151-155)。

⁹ 無地工作者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 MST)興起於 1984 年的群眾抗議運動，原宗旨為追求農業改革，訴求手段包含遊行示威、絕食抗議等。其動員支持者從最初的鄉村農民擴展到都市的工人階級，並追求社會正義，如孩童教育、健康照顧、性別與種族歧視議題等(Valente & Berry, 2015: 268-269)。

¹⁰ 社會主義運動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是工會、人民及原住民團體組成的廣泛聯盟，批評西方資本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追求從後殖民秩序中解脫、去殖民化 (Kaijser, 2014: 67)。

Nacional, FSLN)重回執政權也和農民及家庭農場業主有緊密連結(Vergara-Camus & Kay, 2017: 240)。

Blanco & Grier (2013)認為這是因為過去 1990 年代中期拉美少數團體相較於世界其他少數團體而言，面臨更嚴重的政治、經濟歧視，而這種政治邊緣化的感受讓這些少數群體傾向投給左翼政府。

具有經濟民粹色彩的左翼多以吸引貧窮、低教育程度與年輕族群為主。Seligson (2007)分析教育、財富與民粹主義的關係，發現民粹情緒在相對貧窮與教育低落的背景下明顯地提高。另外也發現年紀對民粹主義的影響相當大，年輕選民對民粹政府的支持度較高。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年長選民經歷了 1970 年代的軍事獨裁，故民粹主義下的魅力領導人對其吸引較低。然而年輕選民並沒有經歷那個威權時期，只感受到對民主時期的現狀以及對不如預期的經濟成長的不滿。

(三) 左翼的政策選擇

在新民粹主義導致的左翼崛起過程中，政治領導人繞過傳統政黨角色，以廣泛政治動員的方式追求個人影響力，並強行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如在委內瑞拉 Chávez 的軍方接管石油產業；在阿根廷 Néstor Kirchner 於 2005 年期中選舉後¹¹採行價格控制、增加出口稅收並重新國有化公共服務企業(public service industries)，2007 年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當選後增加 40%公部門員工，並國有化退休金體系以及針對主要出口產品大豆增稅。此外亦在 2011 年將西班牙石油公司 Repsol 國有化，並於 2013 年國有化國內的鐵路公司(Biglaiser, 2016: 195; Colburn, 2019: 168)。

左翼政府除了實施財富重分配政策外，亦重新建構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衛生和教育的改善以及公共工程投資的增加。並得力於原物料價格的提升，使原物料如石油、天然氣、礦產以及農產品出口所獲取的收入增加，讓左翼政府能利用其收入實踐財富重分配政策，有效地減少貧窮人口(Houtart, 2017: 3-4)。左翼政府為了重新建構新自由主義時期建立的政治經濟環境，具有個人魅力的左翼領導人會企圖將權力集中化，並讓社會運動工具化。在這個過程中會阻礙官僚機構的發展，

¹¹ 由於對手 Menem 在第二輪策略性退出選舉，使 2003 年 Kirchner 當選時只有 22%的票，沒有足夠的支持度讓他進行改革(Costa, 2018: 86)。

甚至可能形成大規模的貪腐。此外社會溝通媒介如電視、廣播等媒體在國有化過程中將受到政府更大程度的控制(Houtart, 2017: 4-6)。



三、 左翼崛起成因分析

March (2007)認為左翼崛起有五項原因，分別為持續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對新自由主義與華盛頓共識的失望、左翼接受選舉政治(electoral politics)的決定、民主轉型中選民對右翼的政治與機構支持弱化，以及冷戰結束後左翼形象的去汙名化(March, 2007: 70-71)。而本文認為最重要的因素是貧富不均與經濟議題。

(一) 貧富不均

第一種對於左翼崛起的看法是高度的貧富不均。根據中間選民理論(median voter theorem)，在單一選區且選民偏好呈現單峰結構時，政策趨向選民偏好中間的候選人最可能勝選(Black, 1958: 55-56)。當收入不均程度高時我們預期的是一個高稅收、轉移性支付體系，因為大多數的選民都能從重分配中得到利益。

Castañeda (2006)認為左翼崛起的國際背景是蘇聯的垮台，使美國不能以對抗蘇維埃為理由打擊左翼勢力。然而最重要的是不平等與民主的結合，如同二戰後的西歐，極端的不平等、貧窮、財富集中會導致左翼興起。隨著民主選舉的鞏固，拉美的社會、人口、種族特徵勢必讓左翼興起(Castañeda, 2006: 28-30)。

Debs & Helmke (2010)則認為不平等與左翼勝選之間具有倒 U 型關係。當低度不平等時，有錢人不用擔心政府以稅收進行重分配政策，因此沒有動機去賄賂選民，以防止左翼候選人勝選；當高度不平等時，有錢人會避免重分配政策，因此賄賂收入較低的選民令其支持右翼，進而降低左翼當選的可能。換句話說當低度不平等時，窮人投給左翼也不會因此獲得很多重分配；當高度不平等時，左翼當選會讓有錢人面臨高額稅金以支付社會福利政策，故富者會以賄賂等方式極力阻止左翼當選。因此只有在貧富不均處於中間時左翼才可能當選(Debs & Helmke, 2010: 220-229)。



(二) 經濟


民主國家的經濟性投票的文獻大抵可做三點總結：第一，經濟表現會影響選舉結果，政府執政時期經濟表現愈好，愈可能得到更多選票，反之則會流失選票。第二，愈明確的課責標的，經濟性投票的效果愈強。第三，課責的明確性會受到選舉規則和制度影響，當規則和制度充分表現時，會弱化經濟投票(Valdini & Lewis-Beck, 2018: 410)。

在拉美地區總統相較於政府的其他部門，受到國家經濟表現課責的影響較大。然而拉美的總統選舉不只是政黨間的競爭，更是候選人個人魅力的較量，如委內瑞拉的 Chávez、巴西的 Lula 及阿根廷的 Christina 等都是具個人魅力的左翼民粹領導人(Valdini & Lewis-Beck, 2018: 412)。

Dornbusch & Edwards (1991)認為在拉美地區屬於經濟民粹主義(economic populism)並具有三項特點，首先是人民對於經濟表現不滿，有強烈希望其變好的期待。第二是政策制定者會公開地否決過去經濟政策模式，並忽略既存的總體經濟政策限制。最後是提出自己的政策處方，強調三個元素：再激活(reactivation)、收入重分配(redistribution)以及經濟的重構(restruction)。

人民對新自由主義時期經濟表現的不滿，給予左翼以及反對自由主義的政黨有崛起的政治機會。2000 年後拉美經濟的好轉，讓政治領導人能夠採行社會福利政策，減少貧窮、促進社會平等與宣揚經濟民族主義(Rammer, 2012: 951-953)。而經濟好轉最主要體現在原物料的出口，包含農業、礦業以及石油產業的出口都與左翼候選人當選機率呈顯著正相關。且當右翼政府執政時期出現危機時，不穩定的政治環境也會讓左翼當選(Blanco & Grier, 2013: 85-88)。換句話說原物料價格大漲給予左翼政府重分配的能力，使得左翼浪潮盛行(Lansberg-Rodríguez, 2016: 56)。

在具體針對左翼時期的經濟課責分析中，Murillo et al. (2010)認為左翼的選舉支持來自於選民對右派政府執政的失望。透過通膨與右翼執政的交互項，發現在右翼執政時，通貨膨脹率的提升與左翼得票的成長有正相關，證明最近拉美左翼在選舉中的成功來自回溯性投票，但經濟成長率則沒有顯著的影響。在拉美這個新興民主地區，選舉課責仍是主要決定係由何人執政的主要機制，然而收入不均與貿易開放程度則對意識形態投票沒有顯著影響。



但 Baker & Greene (2011)研究 1996 到 2008 年間左翼的崛起，將分析分為政策任務(policy mandate)與表現任務(performance mandate)，在表現任務方面與 Murillo et al. (2010)相反，發現通膨對左翼支持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在政府表現的回溯性投票的部分額外增設經濟狀況評估、犯罪率、貪腐、民主支持等變數，分析在右翼執政下，上述回溯性投票相關變數對左翼得票率的影響，其結果都不顯著。因此認為真正導致左翼崛起的原因是政策任務而非表現任務，換句話說是因為拉美選民對於市場經濟的支持度下降，以及反美情緒的上升導致左翼的崛起。Rammer (2012)以個體層級分析 2004 年到 2006 年選民對左翼的投票傾向，發現經濟評估對投票傾向影響並不顯著，而反美情緒在上述三年都有顯著影響。

Wiesehomeier & Doyle (2013)認為 Baker & Greene (2011)的大眾對市場支持指數無法捕捉到選民個人在快速社會經濟改變下的動態經歷，總體經濟的測量方式如 GDP 增長率與吉尼係數亦不能反映人民在經濟艱難時期的感受。Wiesehomeier & Doyle (2013)指出個人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是影響投票行為的主因，也就是在右翼執政下愈多對生活不滿的選民，愈可能增加左翼政府的得票率，這樣的測量方式著重在個人的感受而非總體的施政成果。其結果發現左翼支持度愈高，在右翼執政下的不滿選民愈多；政黨體系建制化程度愈高，左翼政黨能崛起的空間愈低；不論在總體或個體上，選民對右翼執政者時期經濟表現的評估都會影響左翼的支持度。

肆、 拉美真的走向左派嗎？

一、 選民意識形態是否真的左轉？

在意識形態上，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利用左右意識形態量表(left-right ideology scale)測量全球意識形態，以 1 到 10 的量尺讓受試者就其意識形態自評，發現在 1981 到 2004 年間的平均值是 5.56，雖見拉美的意識形態往左偏移，但相較世界平均而言仍屬右派。

但世界價值觀調查在拉美的資料並不完全，因此觀察 Americas Barometer 對拉美地區的調查，發現選民自我定位意識形態在 1-10 的量表中於 1996 年是 5.37，而

在 2007 年是 5.24，雖有稍向左偏移但並沒有相當大的浮動，甚至在玻利維亞、墨西哥、巴西於 2007 年較偏向右翼(Remmer, 2012: 954-955)。

貝克(Andy Baker)在其著作 *The Market and the Masses in Latin America* 認為儘管拉美政治向左翼傾斜，還是支持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改革。他認為「如果市場改革帶來的低價進口商品對於大眾消費文化的衝擊可以被測量，會發現在巴西、智利甚至其他國家的中左翼的統治者，都不該被視為反對新自由主義」。

Baker & Greene (2011)認為拉美的左轉並非真的左轉(to the left)，而是中右翼的選民往中左移動(toward the left)，且這種現象只在總統選舉出現，在國會選舉並沒有明顯的左轉。認為選民雖不支持私有化，但仍支持全球化，左翼的崛起原因來自於反美情緒的提高，以及選民希望放緩市場改革。

二、左翼領導人與其經濟政策

(一) 左翼領導人都採重分配政策嗎？

從經濟政策面的角度來看，左翼領導人比起重分配政策而言更關注經濟的發展，由於害怕與國內外的政治菁英疏離，往往採行較務實的政策(Becker, 2013: 249)。譬如智利的社會黨(Socialist Party)便擔心受到威權主義的反撲，尤其是 Pinochet 時期支持者的反彈，而較沒有進行激進改革(March, 2007: 72)。是以左翼的領導者也未必都採行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大多數的左翼仍保留市場經濟模式與自由貿易的政策(McNulty, 2017: 575)。綜觀而言，在阿根廷與委內瑞拉的左翼興起於經濟危機時期，其經濟政策確實仰賴較高國家力量；而在巴西、烏拉圭、薩爾瓦多這些崛起於經濟下滑但不至於經濟危機的左翼，仍舊深化市場政策；玻利維亞、厄瓜多、智利、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魯的左翼在經濟表現良好時取得政權，但前兩者的國家力量介入較深，後四者仍偏向維持現狀或增強市場導向政策(Biglaiser, 2016: 185-187; March, 2007: 71; Vergara-Camus & Kay, 2017: 240-242)。

從新貝隆主義的 Kirchner 夫妻執政下的阿根廷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其留有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包含出口導向、壓榨式的累積模式(extractivist model of accumulation)以及低廉且停滯成長的工資。所以 Kirchner 民粹主義的改革事實上是一種新形式

的民主新自由主義(democratic neoliberalism)，恢復公民權利與一定程度的管制，並非背離新自由主義，而是解決新自由主義的危機(Rojas, 2017: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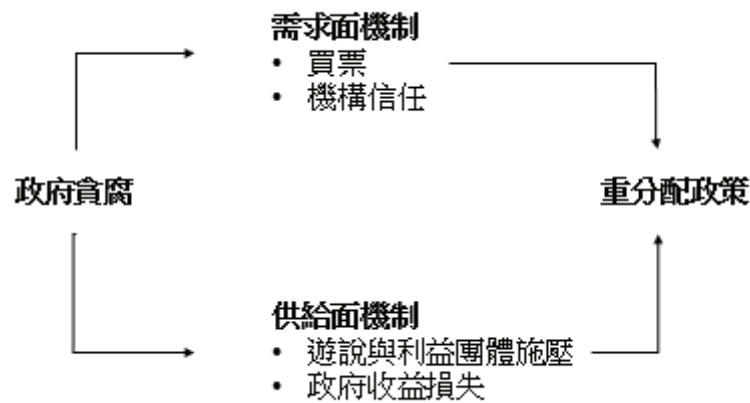
若單從農業政策來看，巴拉圭左翼領導人 Fernando Lugo (2008-2012)競選時承諾對農業改革，但直到 2012 年受到國會彈劾為止，在農業改革上並未有所實踐(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279-280)。雖然左翼浪潮的政府多仰賴鄉村及原住民運動，在選舉時都以反對新自由主義為口號吸引廣大群眾階級，並以糧食主權、好生活(buen vivir)等親農民議題誓言要對農業政策進行大規模改革，譬如土地重分配政策，或以政策支持小規模生產者，但勝選後都沒有做出具有重大成效的改革。

以社會運動為基礎崛起的左翼政黨，雖誓言採行改善農民及鄉村工作者生活的福利政策，然而這並不足以強化農民組織化及參與政治的能力，故農村運動無法對國家政策方向施加壓力，進而改變現況。農村社會運動冀求一個大政府，但農民卻沒有能力與政黨或代議士結盟，進而去影響及控制這個國家的政策方向，因此政府並沒有對農業政策深化改革(Vergara-Camus & Kay, 2017: 239-253)。

(二) 什麼原因導致有些左翼政府不採重分配政策？

為什麼左翼的領導者未必都採行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呢？經觀察發現近年從左翼轉向右翼的國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巴拉圭都有左翼貪腐醜聞，政府的貪腐行為也可能使選民較不願意採取重分配政策。這樣的邏輯是如果一個政府貪腐程度高，那麼以賄賂逃避賦稅的成本降低，因此在政府貪腐時較容易避稅，使人民有更多搭便車(free rider)心態的動機，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使得繳稅的意願降低，致使人民較不偏好收入重分配政策(Yamamura, 2014: 74)。

Sánchez & Goda (2018)統整過去關於政府貪腐對收入重分配政策產生影響的機制，如下圖表 2-1 所示。在貪腐需求面的機制認為高收入選民會利用其經濟能力來買票，確保大多數人不會加重政府課稅；第二是貪腐增加會導致社會對機構信任下降，人民不認為政府會用稅收來造福社會，進而降低重分配需求。在供給面第一是透過利益團體遊說對法案的通過施加壓力，產出偏好其利益的法案；另一種解釋是認為在竊取國家財富的同時，貪腐的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去實施社會福利政策。



圖表 2-1 貪腐影響重分配政策的途徑

資料來源：Sánchez & Goda (2018: 679).

除了貪腐之外，Biglaiser (2016)提出幾種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左翼政府是否採行重分配政策取決於幾種因素，首先是政黨制度化程度，高政黨制度化較不可能產生政策的劇變，透過政黨合作以及立法和行政權間的溝通，可以使政策偏向維持現狀，使市場導向政策存續。其次從路徑依賴角度來看，若一國在 1990 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中傳統左翼政黨採取擰節措施(austerity measures)，會導致政黨體系解組，讓選民在 2000 年開始擁抱更採取國家干預政策的左翼政黨；反之若在該時期傳統左翼拒絕緊縮政策並維持政黨體系，則會偏向市場導向的政策(Biglaiser, 2016: 185-186)。第三是利益團體角度，由於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使拉美初級產業與世界接軌並持續壯大，而政治人物需要該類利益團體來創造工作機會及政治捐獻，故會受其約束而維持市場政策，因此是否採行市場政策取決於出口部門利益團體遊說力量。第四是若國家有豐富自然資源，其創造的收益會給予領導人更多政策空間，左翼有更多的財政彈性來執行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最後是政治賦權，即選舉的得票率以及總統在國會的政黨是否占多數。若總統有較高的得票率及所屬政黨在國會有多數席次，代表其具有較高的政策委任(mandate)以及立法的支持。同時對單一政黨高得票率代表選民清楚的意識形態(Biglaiser, 2016: 187-189)。

(三) 為什麼吉尼係數會下降?

Cabrera (2008)分析貪腐對教育、健康支出及社會資本的影響，發現在社會支出方面，貪腐印象指數愈高，在健康與教育的支出就愈低。若政府貪腐且沒有確實執行重分配政策，如何解釋左翼浪潮時期各國吉尼係數的下降呢？侍從主義是一個解釋途徑。即貪腐的菁英透過買票的方式，以資源重分配建立侍從主義¹²連結，實際上可以降低分配不均(Mathew, 2017)。

當政府能夠以對市場的介入取得超額利潤時，便有動機以賄賂的方式脫離法規限制，並將尋租取得的收益分給其他行為者(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50)。由農民與原住民社會運動興起的左翼政黨勝選後沒有對農業政策全面改革的矛盾，而是將大公司國有化，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小政府及分權化概念已經改變政策制定和公民社會的互動關係，使左翼政府並不總是採取以農業改革為主的政策，而傾向以侍從主義的方式達成其政策目標(Vergara-Camus & Kay, 2017: 239-241)。

第二節 拉美的左退右進

左翼真的退潮了嗎？究竟是哪些國家右轉？為什麼會右轉呢？首先確定左翼退潮的現象存在，並回顧相關文獻之後發現左翼對於沒有對抗獨裁政府記憶的新生代選民吸引力降低。此外這些犧牲經濟菁英利益，將出口外匯收益用於重分配政策的左翼，面臨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時，無法持續其重分配支出滿足對窮人的承諾，造成左翼吸引力衰退。此時對選民來說，與經濟菁英關係較好的右翼更能發展一個可持續的經濟政策。最後一種看法是近年左翼領導人受到貪腐醜聞的影響，在經濟與貪腐的雙重打擊下導致左翼的衰退。

¹² 侍從網路是一種層級結構，其中網絡中每個節點都對其雇主或上級負責，而上級或顧主則以個人關係網絡而非職業關係滿足他們的需求(Cabrera, 2008: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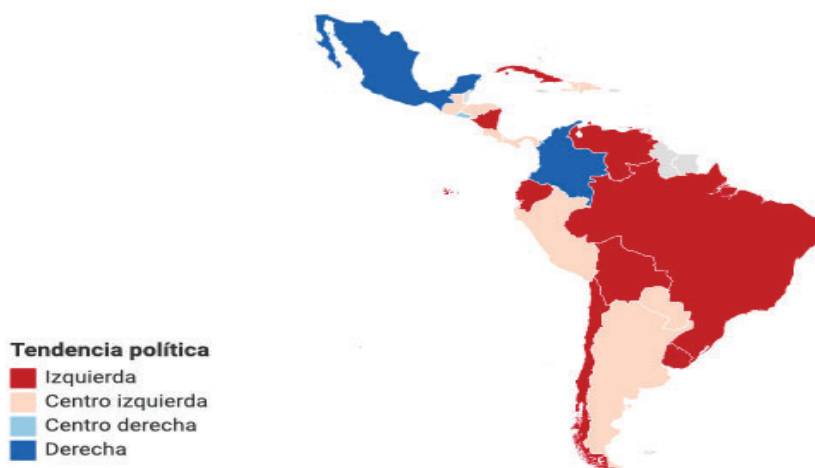


壹、右翼政黨在哪些國家回歸?

一般而言以 2015 的阿根廷 Mauricio Macri 的上台以及 Nicolás Maduro 領導下的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 PSUV)在議會選舉中輸給反對黨民主團結圓桌會議(Mesa de la Unidad Democrática, MUD)為粉紅浪潮逆流的起點(Mitchell, 2016: 1-2)。

更具體來說 2015 年阿根廷 Mauricio Macri 領導的中產階級、親商人政黨擊敗新貝隆主義(neo-Peronist)政府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標誌著右翼政黨再次出現的起點。同年在委內瑞拉的國會選舉中，右翼的民主團結圓桌會議(MUD)擊敗左翼 Nicolás Maduro 的大國愛極點(Gran Polo Patriótico Simón Bolívar, GPPSB)。在巴西左翼的 Dilma Rousseff 被彈劾，形同司法政變(constitutional coup)。2017 年智利由右翼的 Sebastián Piñera 當選，而 2018 年巴西極右翼的 Jair Bolsonaro 亦取得勝利(Rojas,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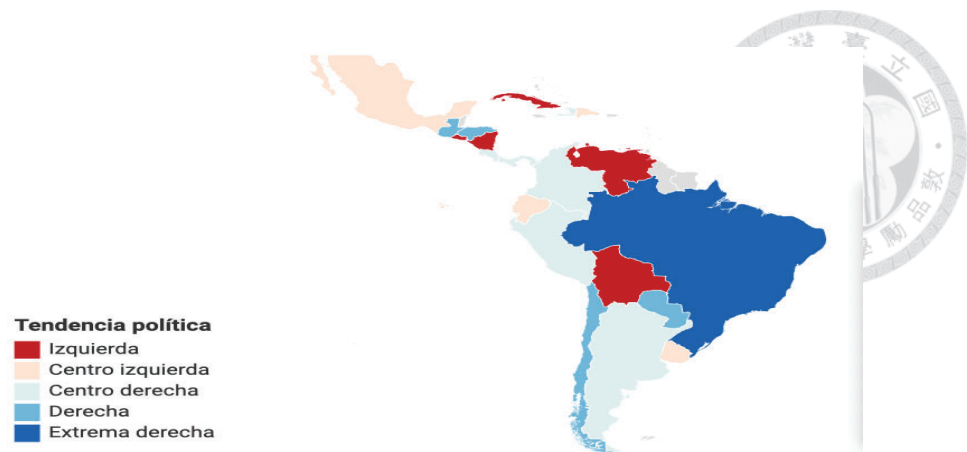
透過圖表 2-2 與圖表 2-3 之比較，深紅為左翼執政(Izquierda)，粉紅為中左翼(Centro izquierda)，淺藍為中右翼(Centro derecha)，深藍為右翼執政(Derecha)，我們可以發現 2008 年到 2018 年兩個時點在南美洲地區明顯從左翼轉為右翼執政。



圖表 2-2 2008 年政府意識形態

資料來源：RTVE.es¹³

¹³ Santiago Riesco Pérez. 2018. “Latinoamérica se hace de derechas”. RTVE. <http://www.rtve.es/noticias/20181030/latinoamerica-se-hace-derechas/1829180.shtml>.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圖表 2-3 2018 年政府意識形態

資料來源：RTVE.es

進一步觀察拉美十八國，以左翼浪潮時執政者意識形態與 2018 年執政者意識形態的製作一個交叉表，我們可以從表格 2-2 觀察此期間內從左翼轉到右翼的國家為智利的右翼 Sebastián Piñera 取代左翼的 Michelle Bachelet、阿根廷的右翼 Mauricio Macri 取代左翼的 Cristina Fernández、瓜地馬拉的右翼 Pérez Molina 取代左翼的 Álvaro Colom、巴拉圭的左翼總統 Fernando Lugo 在 2012 被彈劾後由右翼副總統 Federico Franco 接任、秘魯的右翼 Pedro Pablo Kuczynski¹⁴取代左翼的 Ollanta Humala、巴西的左翼總統 Dilma Rousseff 在 2016 被彈劾後由右翼副總統 Michel Temer 取代、巴拿馬的右翼 Ricardo Martinelli 取代左翼的 Martín Torrijos、薩爾瓦多的右翼 Nayib Bukele 取代左翼的 Salvador Sánchez Cerén，故這八國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標的，並與過去為左翼、現在仍為左翼的國家厄瓜多、尼加拉瓜、玻利維亞、烏拉圭及委內瑞拉進行對照，了解為什麼過去左翼執政的國家中，有些國家右轉，有些國家仍然維持左翼政府執政。至於分類在右右以及右左的國家，既然不是過去左翼浪潮的國家範疇，在此亦不列入所謂左退右進的討論標的。

¹⁴ Pedro Pablo Kuczynski 是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2005 年擔任 Toledo 的經濟部長，得到利馬菁英的支持，2011 年第一次參選秘魯總統職位，2016 年當選秘魯總統(Levitsky, 2011: 85; McNulty, 2017: 565)。

表格 2-2: 左右翼政黨變化

	2018 年為右翼執政	2018 年為左翼執政
左翼浪潮時右翼執政	右右(right-right, RR) 哥倫比亞 多明尼加 ¹⁵ 宏都拉斯	右左(right-left, RL) 墨西哥 哥斯大黎加
左翼浪潮時左翼執政	左右(left-right, LR) 智利 阿根廷 瓜地馬拉 巴拉圭 秘魯 ¹⁶ 巴西 巴拿馬 薩爾瓦多 ¹⁷	左左(left-left, LL) 厄瓜多 尼加拉瓜 玻利維亞 烏拉圭 委內瑞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是什麼導致右翼的回歸?

一、 對抗右翼威權的記憶減退

在中美洲過去的政治狂熱已經消失，年輕人沒有與威權時代對抗且犧牲的記憶。左翼高成本的改革與社會福利被右翼機會主義取代。左翼浪潮時期，左翼在中美洲代表年輕、生機、未來、現代、平等，但現在對年輕人來說左翼與過去連結，而過去與暴力連結。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左翼是僵化(ossified)且與新社會現實脫節的代表。他們認為左翼政黨以列寧的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概念作為威權統治的藉口，而缺乏廣泛政黨參與的左翼無法更新亦無法吸引青年加入，尼加拉瓜的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FSLN)及薩爾瓦

¹⁵ 多明尼加在 2000 至 2004 年間為左翼 Hipólito Mejía 執政，雖然在 2004 年改由右翼 Leonel Fernández 執政，仍不列入近年才右轉的國家。

¹⁶ 秘魯在 2006 年 Alan García Pérez 以反對新自由主義勝選，但其執政時期作為仍屬於右翼，直至 2011 年 Ollanta Humala Tasso 才被歸類在左翼。至 2016 年 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 的上台視為右轉，故本文仍將其視為右轉國家。

¹⁷ 薩爾瓦多 2008 年仍為右翼的 Antonio Saca 執政，2009 年才由左翼的 Mauricio Funes 執政，而在 2014 左翼的 Salvador Sánchez Cerén 繼任，直至 2019 才由中右翼的 Nayib Bukele 執政。雖然有一年的差距，但分類上仍將他歸類在左翼轉右翼的國家之中。

多的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黨(Frente Farabundo Martí para la Liberación Nacional, FMLN)即為此例(Colburn, 2019: 166-170)。



二、 經濟、分配問題持續

中美洲的國家貧窮且人口及國家面積較少，從石油到生活用品多仰賴進口，而進口需要足夠的外匯，外匯的來源在於傳統經濟菁英手上，他們主導產品出口，如咖啡與蔗糖，透過出口賺取外匯提供進口使用。而左翼政府犧牲經濟菁英的利益來滿足窮人時，若經濟無法持續發展將導致左翼失去支持，畢竟窮人的政治支持一向是變化無常的(fickle) (Colburn, 2019: 166-170)。

在過去以農民、原住民及窮人為基底勝選的左翼領導人，在競選期間高喊著改革，而一旦取得執政權後，卻往往在政策上沒有落實當初的諾言(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477)。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一個收入高度不均的國家中，若伴隨對於政治機構的低度信任、貪腐的政府，要求激進的重分配政策時，其產出的政策只會進一步增加社會緊張，無法產出實質的重分配政策(Rothstein & Uslaner, 2005: 65-67)。

因此拉美的政治父權主義(political paternalism)以及政府干預主義(dirigisme)的左翼僅能在國際原物料價格高時維持其統治，因為這能滿足人民對經濟成長、補貼政策以及社會服務的期待。一旦總體經濟變差，國際原物料價格崩盤後，以反建制以及民族革命為統治基礎的民粹政府將不再能持續其正當性，在此經濟危機背景下，人們傾向尋找更能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Lansberg-Rodríguez, 2016: 56-58)。

有別與左翼的政府干預主義，右翼政府選擇與資產階級合作發展國家的經濟策略，譬如阿根廷的 Mauricio Macri 政府、秘魯的 Pedro Pablo Kuczynski 政府、智利的 Sebastián Piñera 政府以及巴拉圭的 Horacio Cartes 政府所任用之政務官員都與大企業、商業、媒體及金融人士有所關聯(Ansaldi, 2017: 47-48; Nikolajczuk & Prego, 2017: 20)。



三、 貪腐議題

隨著國際油價以及原物料價格下跌，對於中產階級的就業環境以及消費能力有立即性的影響。再加上對於貪腐成為拉美政治文化中的常態，使得人民普遍對貪腐不滿。右翼得利於這些因素，藉由人民的不滿情緒開始重新拾回權力，並打著民主價值來吸引選民，尤其是印地安原住民以及中產階級選民。

美國的支持也扮演重要角色，透過傳播媒體發揮其影響力(Houtart, 2017: 5-6)。在南美洲貪腐醜聞的影響很大程度弱化左翼政府的支持度(Caetano & Iber, 2019: 47)。Kaltwasser (2014)也指出，右翼政黨的支持者往往對大眾媒體，大公司產生巨大影響，並試圖通過遊說來影響左翼政府。Rojas (2017)認為在阿根廷、巴西與委內瑞拉的右翼則利用醜聞和批判其經濟政策的錯誤來打擊左翼政府。

腐敗的政治醜聞在近年來右翼崛起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過去民粹主義左派領導人以國有化經濟體中的大型部門，來達成在不提高中產階級稅額的前提下維持補助貧窮人民的資金來源，創造工人階級的恩人的形象，如墨西哥的 Cárdenas 國有化石油部門、阿根廷的 Perón 是國有化鐵路部門、巴西的 Vargas 是鋼鐵部門、玻利維亞的 Victor Paz Estenssoro 是錫礦部門、秘魯的 Juan Velasco Alvarado 則國有化銅部門。左翼領導人以民族主義與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正當化其裙帶資本主義(Castañeda, 2006: 33-34)。侍從主義(Clientelism)、裙帶關係(nepotism)的形象與經濟民粹左翼政府掛勾，這會導致公共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界線模糊化，造成公共權力的濫用並使人才選拔及行政管理效率低下(Cabrera, 2008: 159)。在缺少水平課責的環境下，新民粹主義領導人由於維繫其個人魅力以及在選民心中的完美形象需要高額成本，使其仰賴貪腐維持資金來源。但隨司法制衡力量提升，貪腐被揭發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緊接而來的醜聞則會危及其政治生涯(Weyland, 1998: 115)。Kaltwasser (2014)認為右翼支持者對大眾媒體有較大影響，將左翼與貪腐的形象掛勾，藉此影響選民來對政府進行垂直課責。

左翼政府如巴西前總統 Luiz Inácio da Silva 和阿根廷前總統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都被指控貪腐，智利前總統 Michelle Bachelet 在其任內亦因金融醜聞使其支持率大受打擊，使 2017 年右翼的 Sebastián Piñera 得以勝選。故接下來將回顧貪腐相關文獻。

第三節 貪腐與左翼



為什麼會產生貪腐？選民的貪腐感受如何被形塑？貪腐是濫用公共權力來獲取私人利益的一種方式，在測量上有其限制性且影響因素眾多。貪腐是相對長期的結構因素，從獨裁向民主轉變的新興民主國家中，由於政治舞台否決者增多，在缺少健全司法體制的情境下容易有貪腐產生。原因有二，其一為弱政黨體系，個人主義總統須靠政治職位分贓的侍從主義得到泛聯盟支持；其二為弱公民社會，面對高變動民意，領導人以政治運動維持與選民聯繫的成本高昂，貪腐則成為維持聯繫的重要收益來源。

但貪腐在拉美存在已久，為何在這時發揮作用呢？大多時候貪腐行為存在但不會對選民的貪腐感受產生大幅度的變化，直到貪腐醜聞在特定時間出現，便會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即本文中對於左翼執政者的課責。貪腐醜聞會經由媒體報導影響選民貪腐感受，而司法機構是否能對貪腐官員起訴則成為重要的關鍵。


壹、貪腐的定義與局限

一、貪腐的定義

道德與合法統治的定義隨時代變化而改寫，貪腐亦為如此。綜觀拉美過去的歷史，過去視為對領主的忠誠，現在被視為是裙帶主義。而貪婪自利的行為如今反倒因為市場機制的普及而正當化(Andvig, 2006: 328)。

在現今的定義下，廣義而言「貪腐」一詞是指違反規則(an infringement of rules)。而「規則」是區分正確和錯誤的行為標準，由此推得規則只能通過社會互動而存在，這種規則的違反會在具有該行為準則的社會中受到道德譴責。在 Newell (2008) 的這種廣義定義中，貪腐的界定高度依賴背景脈絡(context-dependent)，是一種存在於特定國家的特定道德規範。

較為狹義的概念是將貪腐定義為「濫用公共權力來獲取私人利益」(Andvig, 2006; 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 Warf & Stewart, 2016)。此概念包含賄賂、貪汙(graft)、勒索敲詐(extortion)、挪用公款



(embezzlement)、高報貨價(over-invoicing)、對外援、通膨、就業的盜竊(theft of foreign aid, inflation of payrolls)、對走私和盜獵的容忍、買票、利用裙帶關係雇用、非法出售政府合同、許可、讓步(illegal sale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licenses and concessions)等，且上述每項都有各自清楚的定義(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29-30; Warf & Stewart, 2016: 134)。Canache & Allison (2005)認為濫用公共權力來謀取私人利益的政治貪腐，其存在可能會扭曲政府的產出，因為參與貪腐的行為者從政府那裡獲得不成比例的利益。Nye (1967)認為廣義的貪腐定義流於道德評價(moral evaluation)，無助於政治分析，因而傾向採取狹義的定義，即「貪腐是由於私人利益而偏離公共角色正式責任的一種行為」。這些行為包含收賄、裙帶主義及為私人利益非法挪用公共資源等。

儘管狹義定義較利於政治分析，Bohn (2012)認為狹義定義具有兩項缺點，首先是無法區分貪腐案件的程度，將不同程度的單一種類現象加總，無法區別大規模貪腐與基層公務員收賄。第二是測量方法上無法捕捉到大規模貪腐，儘管問卷採匿名方式，但參與大規模貪腐的人不會也不會在問卷中承認(Bohn, 2012: 69-71)。

二、 測量方法與局限

在實踐上貪腐有多種形式，這些形式無法在單一的全面定義(single catch-all definition)中被完全捕捉(Heywood, 2007: 695)。在測量上主要區分為總體與個體的方式，在總體面而言考量國家在不同時間不同面向的變數，如國際透明組織與自由之家的方式；在個體層面則採用問卷評估，譬如去了解貪腐對政權正當性、民主滿意度的影響(Quiroga, 2009: 206)。

在總體方面，國際透明組織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從十二個獨立機構取得十三個資料來源，指數的建立包含受賄、轉移公共資金、官員利用公職機構謀取私利而不面對結果的普遍程度、政府遏制貪腐的能力、可能造成貪腐行徑的過多行政繁文縟節、公務員選拔的裙帶關係任命、能否對腐敗官員進行有效的刑事訴訟、訂定有關財務披露和利益衝突預防的適當法律、對舉報人、記者及研究人員調查貪腐和賄賂的法律保護、民間社會獲取公共事務資訊

的近用等指標。但無法捕捉到公民對貪腐的感受或經歷、稅務詐欺、非法資金流動、洗錢、私營部門腐敗、非正規經濟及市場(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

在個體方面，LAPOP(Latin America Public Opinion Project)亦有對於貪腐的相關問題。這種問卷調查方式使我們能夠分析個人的社會經濟、態度及規範性的觀點，有助於了解貪腐感受對於個人對民主的滿意程度。缺點的部分誠如上述提到，參與大規模貪腐的人也傾向不會在問卷調查中承認。此外問卷亦難以捕捉私部門的貪腐，例如基於付費，特權，機密信息的商業交易及盜版或非法間諜活動都無法在問卷中被測得(Bohn, 2012: 68-70)。除此之外，問卷研究對於貪腐自填回答的可信度亦受質疑，也無法區分賄賂是為了便利行政過程還是受公務員威脅所支付(Fried *et al.*, 2010: 77)。

三、 拉丁美洲的貪腐現況

自 1990 年代初期，貪腐醜聞就被視為拉美政治的特徵之一(Balán, 2011: 459)。腐敗的政權會造成公共資金及外援被濫用，阻礙外國投資及經濟發展，並擴大社會不平等及對國家的不信任。在拉美貪腐的成因常被歸類為以下因素：資源詛咒(委內瑞拉)、高地猷(caudillo)及個人領導(personalismo)的遺緒(瓜地馬拉)、外國政策如外國對獨裁者的支持或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墨西哥)、盜賊政治(kleptocracy)的盛行(海地)。此外，殖民歷史、貴族政權較低的課責性、缺少透明性、受制約的媒體、公務員低薪及文化的影響亦為導致拉美地區貪腐的主因(Warf & Stewart, 2016: 143-144)。

貳、 貪腐如何成為重要議題？

我們首先要了解潛在可能造成貪腐的因素，才能在經驗研究更好地選擇控制變數(Brunetti & Weder, 2003: 1802)。在經濟上，貪腐和拉美低經濟成長(Cabrera, 2008; Quiroga, 2009; Warf & Stewart, 2016)與公務員低薪相關(Rijkeghent & Weder, 2001; Fried *et al.*, 2010)；在人口特徵上，貪腐感受與教育程度、年齡、性別、個人社經地位及收入相關(Bohn, 2012; Canache & Allison, 2005; Fried *et al.*, 2010; Quiroga, 2009; Warf & Stewart, 2016)；然而媒體與民主的角色對於選民貪腐感受的

形塑亦相當重要，媒體對政治人物貪腐醜聞的報導會提高選民對政府貪腐的感受。(Brunetti & Weder, 2003; Balán, 2011; Heywood, 2007; Jiménez, 2004; Quiroga, 2009; Weyland, 1998)。



一、 媒體角色使貪腐議題浮上檯面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通常被認為是重要人權和對政府瀆職的有力控制。一個獨立的媒體可能是揭發政府非法行為最有效的機構之一，原因是任何獨立記者都有強烈的動機來調查和揭露政治人物的不法行為(Brunetti & Weder, 2003)。

在選民的貪腐感受方面，Quiroga (2009)提到看電視的頻率愈高，貪腐感受也愈高，Heywood (2007)也強調媒體對揭露貪腐的重要性¹⁸。Jiménez (2004)明確指出醜聞產生和詮釋的最重要行為者就是大眾媒體¹⁹，其扮演的角色是揭露政治人物貪腐行為如何被用作滿足其政治目的。

貪腐是一個長期相對穩定的結構性現象，但貪腐醜聞會在特定時間點出現，換句話說多數貪腐行為從來沒有被揭發而曝光於新聞媒體版面。因此貪腐醜聞的出現代表更健康的民主，有更自由的媒體以及更好的水平課責機制。此外貪腐醜聞的出現亦可能來自於政府機構間的政治競爭，而當貪腐醜聞出現後，會促使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實行反貪腐措施，懲罰貪腐行為(Balán, 2011: 111)。譬如巴西 2005 年 Mensalão 貪腐醜聞中就有很密集的媒體播送，而同年亦為 1998 年到 2009 年之間，巴西人民認為貪腐是最重要的國家問題比例最高的一年(Michener & Pereira, 2016: 481-489)。

隨著拉美地區水平制衡的提高，可以預期的是新聞自由度亦有提升，媒體作為第四權的功能也更能體現。而 Kaltwasser (2014)認為右翼支持者對大眾媒體有較大影響，並將左翼與貪腐的形象掛勾。右翼可能會透過媒體將左翼與貪腐連結，或將打擊貪腐作為政績宣傳。而使得貪腐議題在這次左翼退潮扮演選民對左翼政府課責的主要因素。

¹⁸ 描述原先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 PSOE)政府的貪腐程度相似於人民黨(Partido Popular, PP)政府，然而經由媒體強烈披露和 PSOE 相關的貪腐事件後，西班牙人民的貪腐感受在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期就高於人民黨執政時期(Heywood, 2007: 698)。

¹⁹ 尤其強調菁英的作用，因為揭露信息的人不見得有資源來獲得版面，此時大眾媒體的總編輯就比一線記者來的重要(Jiménez, 2004: 1113)。



二、民主化過程中貪腐的升降

理論上民主會降低貪腐，自由的媒體能告訴大眾政府的濫權，立法和司法有權對政府不當的作為進行調查並予以處罰(Geddes & Neto, 1992: 657)。反之非民主國家在較少權力制衡的情況下，比較容易產生貪腐(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321)。但 Davis et al. (2004)認為選民自我意識形態以及回溯性投票是左右翼候選人更迭的主要原因，在其分析中貪腐的感受對投給左右翼候選人並沒有顯著影響，筆者認為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控制民主這個變數。

(一) 為什麼新興民主國家貪腐會增加？

若新興民主國家的左翼政府與貪腐有關係，那為什麼民主化的過程中會產生貪腐呢？因為貪腐能和選舉式民主共存(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477)。Montinola & Jackman (2002)以經驗資料分析發現獨裁國家的貪腐通常比部分民主化的國家貪腐程度較低，且貪腐在貧窮國家更為嚴重。更具體而言，從專制到民主化的過程中權力從集中到分散，公共資源的分配由更多行為者決定，讓這些新的否決者(veto players)能夠利用其影響力收取賄賂，因此民主化增加了要求非法回報的行為者數量(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48-151)。

巴西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Mensalão案即為一例。Lula利用總統相對優勢的權力，經由給予議員特權(prerogatives)或設定國會議程的方式，形塑符合其偏好的政策(Melo, 2016: 55)。在Lula第二任期，其支持者為包括12個政黨的泛意識形態聯盟，而為了得到該聯盟的穩定支持，內閣職位的分贓與恩庇侍從關係變得重要，政府每個月支付聯盟每位立委一萬兩千元美金的現金以確保法案通過，國會買票行為導致2005年爆發Mensalão貪腐醜聞(Michener & Pereira, 2016: 480-481)。在Lula和Rousseff任內巴西的權力分享機制充滿政治交易(horse-trading)、相互利用(backscratching)與滾木立法(log-rolling)(Melo, 2016: 59-60)。

此外新民粹主義領導人透過兩種機制造成貪腐增加，第一是缺乏機構課責使個人化的政治家能經由貪腐取得利益，第二是面對其高變動性、未組織化的支持基礎以及未來選舉活動的準備，電視媒體及民調是維持與選民連結的方法，但成本高昂。新民粹領導人需要大量資金來維持與選民的聯繫，而貪腐往往是滿足資

金需求的手段(Weyland, 1998:111-115)。



(二) 什麼條件使新興民主國家貪腐下降？

貪腐不論是對左翼或右翼的政府都有傷害，為什麼近年來貪腐議題才在投票行為中成為選民的重要考量呢？其實一直以來拉美有很多反貪腐運動並多由外部資助，包含世界銀行與非政府組織，但這些反貪腐運動並沒有帶來重大的改變。其原因為若要減少貪腐必須達到長期的經濟成長以及政治改革，譬如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公民更具政治參與意識、有足夠的資訊近用、活躍且可監督政府的媒體、對於不正當行為的嚴厲懲罰(Warf & Stewart, 2016: 144)。因此水平課責的存在對於貪腐的抑制相當重要，若缺少對政府的制衡力量、社會監督政府的能力以及新聞媒體自由，貪腐問題將難以解決(Quiroga, 2009: 212)。

Cabrera (2008)分析貪腐對選舉體系，利用政治約束指數(political constraint index, POLCON)作為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指標，結合自由之家、國際透明組織、世界銀行、政治機構資料庫(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PI)及 WVS 的資料。他認為當行政受立法與司法控制愈強，愈少恣意行事的可能，進而提高人民對政府信賴以及提高對於貪腐的課責力量。另外，當政治約束指數愈高，則貪腐印象指數愈低，而貪腐控制能力以及法治愈高。行政、立法及司法之間的權力分立之所以能夠有效地對貪腐產生制衡作用，是因為當政府在國會中沒有取得絕對多數，且政府無法随心所欲地透過指派法官讓司法部門對行政部門產生依賴性時，人民對其信任將會提升，進而讓新政府很難有突然且巨大的政策轉向。故當水平制衡能力愈強時，對於貪腐的控制力會提升。Montinola & Jackman (2002)以經驗研究發現在中等政治競爭的民主國家中，貪腐感受會略高於低民主國家，但隨著政治競爭增強達到一個特定門檻後，貪腐感受會迅速下降。換句話說在總統權力過大，壓抑立法制衡時，貪腐感受起初很低，但隨著立法制衡能力增強，政治競爭提高時，貪腐感受會上升，當到達某個點時則快速下降，也就是政治競爭有降低貪腐的效果(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67-168)。亦即當民主化過程中提高整體課責時，可以抑制政治過程中的行為者非法取得財富的可能性(Weyland, 1998: 115)。

第四節 左翼與委任式民主理論



經由上節我們知道弱政黨體系與弱公民社會容易滋生政治人物的貪腐行徑，但弱政黨體系、弱公民社會是如何產生的呢？在左翼浪潮的興衰之間又出現什麼結構性的轉變呢？O'Donnell (1994)的委任式民主可以作為解釋，其特徵包含強垂直課責、弱水平課責、以經濟危機產生的領導人具有高度個人魅力，並凌駕政黨與民主機構之上。再加上拉美強人領導的傳統，使缺少水平課責力量下的拉美地區侍從主義盛行。

左翼浪潮的興起是左翼領導人以經濟為口號吸引窮困選民，但在委任式民主低政治競爭下，從新自由主義轉至國家主導經濟政策時更易產生貪腐。而仰賴個人魅力的左翼領導人以政治運動崛起，選民視領導人為具有完美形象的國家救星，一旦被揭發貪腐弊案，感到失望的選民對其懲罰將會更為嚴厲。

從以經濟為口號的左翼浪潮，到以貪腐為主要因素的左翼退潮，司法制衡力量於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因為在水平制衡力量中，立法權是擁護多數想法，經濟民粹的左翼領導人在得到人民支持亦可於國會取得多數；反之司法權是保護少數、打擊貪腐，並獨立於政治力之外監督政府。此外媒體亦須仰賴司法對貪腐偵查案的持續進展來獲取新聞題材，影響選民貪腐感受。

壹、委任式民主與水平課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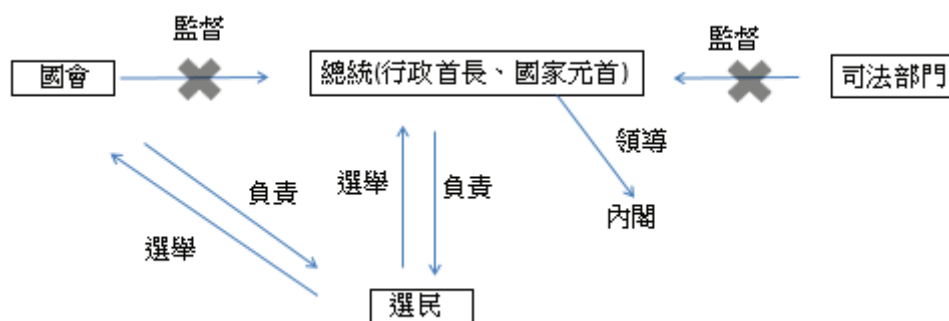
一、委任式民主與左翼經濟民粹

(一) 委任式民主的意涵

委任式民主就是所謂的垂直式民主，指選民和總統之間有很強的選舉連結，選出魅力(charisma)的候選人後，就按照總統的方式去建構其所認為的法治，同時抑制可能制衡總統的力量。委任式民主具有高度總統主義(hiperpresidencialista)、權力集中於領導人手中的特徵，而葉爾欽解散國會、砲轟國會的行為就是最鮮明的例子(Luna, 2016; Noriega & Puerta, 2015: 179-180)。而這種權力集中於行政首長

的現象從 1980 年代中期拉美民主化就已經出現，相關作法包含總統府編制改組以及創造新的機構等方式，如智利的總統府秘書部(Ministerio de la Secretaría de la Presidencia)、阿根廷的內閣總部(Jefatura de Gabinete)及秘魯在部長會議的正副主席(Vicepresidencias y Presidencia del Consejo de Ministros)(Lanzaro, 2016: 125)。

O'Donnell (1994)提出委任式民主的概念²⁰，認為 1992 年秘魯 Alberto Fujimori 的自我政變(self-coup)²¹，以及 1993 年俄羅斯憲政危機中，葉爾欽以坦克火砲轟擊議會大樓，對於這種強行政權的行使、總統權力的擴張是由於自由機構(liberal institution)的虛弱，也就是水平課責²²的不足(Costa, 2018: 79; Hagopian, 2016: 120-121)。如下圖表 2-4 所示，本文中所分析之拉美十八國中有十七國採行總統制，僅有秘魯採行半總統制，而水平課責不足意味著三權之間權力制衡的缺乏。



圖表 2-4 總統制下的委任式民主

O'Donnell 設想 1990 年代新興民主國家面對高通膨、全球債務危機及經濟垮台，總統必須要能化解經濟危機。而水平制衡機構會阻擋總統經濟穩定的任務。這種想法假設了水平機構，如立法機構有制衡總統的意願。

1990 年代新自由主義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改革意味著工會及社會弱勢族群需要負擔更高的成本，這些人會經由遊說國會內的盟友去阻止這個改革，由此可見

²⁰ 更準確來說是在 1991 年於葡萄牙的研討會提出這個概念，隔年以西班牙文出版，直到 1994 年翻譯成英文出版，以阿根廷的 Carlos Menem、巴西的 Fernando Collor 以及秘魯的 Alan García 為描述對象，但其概念可以適用其他領導人，如阿根廷的 Kirchneristas(Costa, 2018: 76)。

²¹ 指 Fujimori 暫停憲制的決定，倚靠軍事力量支持，宣布暫時停止民主的運作以建立新的制度，並重新建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經濟上採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政治上走向威權政治。這場政變得到技術菁英、軍隊、商人及國際金融界的支持，重新拾回國家能力(Mauceri, 1995: 32)。1990 年秘魯許多中產階級落入貧窮人口，通膨高達 7640%，再加上與光明路的武裝對抗，讓 Alberto Fujimori 在 1990 年上台後，於 1992 年實施自我政變，關閉國會並暫停憲法(Vergara & Watanabe, 2019: 30)。

²² 水平課責是指由法律授權的國家機構，願意且能夠對於失職或違法作為的國家機構或代理人進行例行監督、犯罪制裁或彈劾(O'Donnell, 1998)。



總統和自由民主機構看似互斥。而委任式民主的回饋效果是「對於合作逐漸產生提防，開始思考短時間的利益」，政府不同部門會破壞規則來取得短期利益，侵蝕法治的和其他正式機構的價值(Mayka, 2016: 144-145)。

(二) 是什麼造成委任式民主的出現？

委任式民主的出現源自於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社會破碎化(fragmentación social)、代表性危機及政黨政治的衰敗，造成水平課責機構的弱化(O'Donnell et al., 2011: 24)，亦可能來自於拉美歷史根源與文化影響(Costa, 2018: 79; Hagopian, 2016: 122)。當社會面對危機時，就需要具有個人魅力的領導人才能進行重大政治變革(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474)，因此這會讓人民將權力委任給領導人來確保穩定，除了選舉之外，放棄其他對行政權的制衡機制(Costa, 2018: 78)。而弱水平課責會產生強領導人來解決危機，社會因此委任更多權力給領導人，讓水平課責機制弱化，進而弱化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代議連結，加劇代表性危機(Vergara & Watanabe, 2019: 32)。

O'Donnell (1994)對於委任式民主的想法是因經濟危機而產生，然而 Mayka (2016)認為安全危機也會造成委任式民主的出現，委任式民主的產生關鍵是「危機的出現」與「水平課責的缺乏」兩項因素。而傳統威權時期的右翼在安全議題上具有優勢，故安全危機產生的委任式民主在右翼執政下的哥倫比亞出現，但新民粹左翼以經濟為重，故當經濟不穩定造成政治不穩定時，權力逐漸集中在總統個人並弱化國家的水平課責機構，左翼民粹領導人因而誕生(Costa, 2018: 80)。

1. 經濟危機

委任式民主與高度已開發國家的代議式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有所區隔。以歷史脈絡區別，二戰後民主國家人民經歷戰爭破壞而被喚醒權利意識；在發展面則有大量且全面的資金挹注如馬歇爾計畫；在國際環境則適逢世界經濟體的擴大，這些都有助於西方國家民主鞏固。反之，1970 至 1980 年代的民主轉型國家面對的是過去威權政權遺留的社經問題，且當時的世界經濟問題亦面對高通膨、經濟停滯、金融危機、高內債與外債、社經不平等及社會福利政策惡化等問題。



在課責性方面，兩者都有選民對執政者的垂直課責，但委任式民主缺少水平課責，也就是在委任式民主中，執政領導人宣稱為國家利益服務，但同時又對司法及立法等水平課責機構的限制反感(O'Donnell, 1994: 62-63)。

2. 安全危機

事實上除了經濟問題外，安全危機亦會導致委任式民主的產生。哥倫比亞的Álvaro Uribe 總統將權力集中在軍隊以維護安全秩序，使國會無法有效地對行政機構制衡。而 Uribe 能集中行政權力的主因是安全問題惡化，例如左翼的哥倫比亞武裝力量(Las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 FARC)及游擊戰等非法殺人的安全危機。這樣的背景脈絡讓公民支持以更強硬的手法鎮壓游擊戰，使 Uribe 於 2002 年因主張「強硬的手段、大膽的心」(mano firme, corazón grande)勝選，其民主安全政策(Democratic Security)將權力集中在總統和軍人手上，視安全優先於基本人權，並於 2002 年以 1991 年憲法第 213 及 214 條宣布實施緊急狀況法，讓軍警能在未經法院授權下逮捕人民，造成許多弱勢無辜百姓遭綁架或謀殺(Mayka, 2016: 140-142)。

不論是何種危機導致委任式民主出現，委任式民主中人民所委任的事項包含總統回復國家健全運作的權利及義務，總統一旦被選出就被視為國家的化身，具有高度個人主義，只受到既有權力關係和法定任期的限制。勝選的總統候選人凌駕於政黨和組織利益之上，其選舉具有高度情緒化與高利害關係的特性，選前承諾要結合國家整體力量來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一旦勝選後，選民成為被動的觀眾，缺少代議制度中的課責機制，使候選人只關注選舉的勝利。為了整合國家各部門力量，總統的政治支持基礎來自於政治運動(movement)，透過政治運動的方式使總統能在不依賴政黨的前提下取得廣泛支持，凌駕於政黨之上(Costa, 2018: 86; O'Donnell, 1994: 59-61)。這種特性可能與拉美地區的高地猶主義(caudillismo)有關，亦可以在拉美粉紅浪潮中觀察到其民粹主義及個人主義色彩。而讓總統更有民粹吸引力的來源就是虛弱的代表性機構(Hagopian, 2016: 122)。



(三) 委任式民主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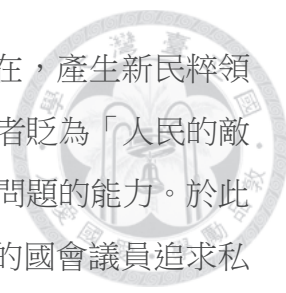
委任式民主帶來的危機是傳統政黨失去聲望、人民對於機構以及過往政治菁英失去信心(Noriega & Puerta, 2015: 176)。O'Donnell (1994)認為儘管拉丁美洲等新興民主國家符合 Robert Dahl 對民主定義中的多元政體(polyarchy)，但他認為新興民主國家沒有走向代議民主，而是委任式民主。委任式民主的概念是指強垂直課責，弱水平課責，受歡迎的總統是國家的救星，透過人民的信任及國家問題的解決得到權力，弱化水平制衡力量。Costa (2018)認為這種如委內瑞拉以總統作為國家救星的形象會導致二元極化政治環境，如本國與非本國人、相同民族與非相同民族之間的對立，縮小可以對話及達成共識的可能(Costa, 2018: 79-80)。

O'Donnell et al. (2011)進一步對委任式民主歸納出以下十一點特徵：領導人具有合法性；領導人的政治決定具有選舉的支持；水平制衡機構會干擾(interferir)行政權力的實施；行政權有必要抵銷(neutralizar)這些阻礙權力實施的機構；政策制定具有即興(improvisación)特徵、不受水平制衡機構控制；領導人為免於受到水平制衡機構控制，會選擇弱化代議制度，強化個人主義，將權力集中於行政部門；領導人凌駕於社會及機構之上；領導人政治支持的基礎取決於政治運動而非政黨；人民相信領導人為國家救星(salvadores de la patria)的角色，爰須集中權力解決國家問題；領導人在意識形態上是不偏的(imparcial)；領導人具有廣大社會支持(O'Donnell et al., 2011: 21)。

González (2013)亦整理出八點特徵：總統是國家的化身、國家利益的界定者(definir)及看守人(custodian)；政府政策不需與其競選活動時的承諾相符；總統政治支持基礎源於政治運動，且總統本身凌駕於政黨和組織利益之上；司法及立法機構被視為權力實施的阻礙；權力的實施並非制度化(non-institutionalized)；總統獨立任命並庇護其技術官僚；水平課責機制極弱甚至不存在；政策決定具有易變性，但總統須承擔結果(González, 2013: 5-6)。

(四) 委任式民主與經濟民粹左翼

由於新自由主義造成貧窮人口以及社會不平等的攀升，加上威權時期的遺緒、過去的民粹主義、總統制及平民主義等元素，造就委任式民主下極度個人化的權



力分布以及行政部門的權力集中，權力集中伴隨選舉制度的存在，產生新民粹領導人(Noriega & Puerta, 2015: 176-177)。新民粹領導人會將反對者貶為「人民的敵人」，並為證明政策效果，必須漠視既有法規，來強化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於此同時會弱化司法獨立，為貪腐開啟一道後門，並讓缺少代表性的國會議員追求私利(Weyland, 1998: 114-115)。政府之所以能集中行政權的原因來自於人民對民主的不支持，並且對他們國家的立法、司法機構不具信心²³(Seligson, 2007)。是以左翼民粹具有反自由民主或代議民主的特徵，尤其是那些阻礙「人民意志」(general will)表述的憲法限制，故委任式民主領導人經常是以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國家救星形象出現(March, 2007: 72-73)。

左翼民粹領導人與委任式民主的領導人相似，在特徵上皆由具有魅力的領導人統治、厭惡正式組織(formal organization)，並跨越代議機構直接訴諸人民，產生因素皆為經濟議題²⁴，使得左翼民粹強調平等主義與社會權利(March, 2007: 66)。如委內瑞拉的 Chávez 與玻利維亞的 Morales 便結合經濟民族主義與個人魅力，以左翼的財富重分配口號反對新自由主義(March, 2007: 75)。

二、 委任式民主下的水平課責與貪腐

(一) 水平制衡的缺乏

委任式民主創造的政權階級並不健全，雖然具有民主的平民主義(plebiscitarian)，但弱的水平課責代表自由與共和²⁵精神的缺乏。缺少自由與共和的民主會成為多數暴政(majority tyranny)；缺少民主與共和的自由會導致財閥統治的金權政治

²³ 根據 Americas Barometer，以 0-100 評分，人民最信任的機構是教會(69 分)、軍隊力量(60 分)，最低的是政黨(35 分)、司法機構(43 分)、立法機構和最高法院(44 分)。可以發現代表自由民主的機構都低於中間值五十分。World Value Survey 資料也顯示在拉美地區軍事和宗教機構最獲得民眾信任(Seligson, 2007)。

²⁴ 委任式民主的產生是為了回應特定危機，而左翼民粹是當既有的建制(establishment)遭遇正當性危機，同時必須回應特定危機時產生。兩者的形成在拉丁美洲皆以經濟危機為主，如阿根廷是回應 1990 年代以來國際貨幣組織要求的擰節經濟模式，委內瑞拉與玻利維亞則強調經濟自主的反資本主義政策(March, 2007: 71)。

²⁵ 「自由」代表人民有不受包含國家在內任何權力侵犯的權利；「共和」是指對於公共職責必須要嚴格遵守法律並為公共利益提供無私的服務(O'Donnell, 1998)。

(plutocracy)；缺少自由與民主的共和則會墮落為剛愎自用的菁英(selfrighteous elite)的父權統治(paternalistic rule) (O'Donnell, 1994)。

O'Donnell (1994)認為水平制衡是國家機構制衡總統力量的能力，如立法、司法，以及每次選舉之間國家權力如何實施；垂直制衡是來自於基層選民，而選舉扮演統治菁英和社會的關鍵連結；代議式民主主要同時兼具兩種制衡，即水平機構與公民對總統的制衡。他認為水平制衡機構在代議式民主中有四個主要作用：機構代表個人及社會利益偏好的加總；機構有助於限制及整合系統中的社會需求；機構提供穩定，並在不同行為者間促進協調；機構能促進民主體系的合法性(O'Donnell, 1994: 57-58)。

水平制衡不足對民主的侵害可見於集會自由的限制以及選舉舞弊，委任式民主作為缺乏自由面向的多元政體，行政部門無法保障人民免於住所侵犯、家庭暴力、虐待、不公平的審判，甚至這些犯罪行為可能是由國家機器中相對低階不受選民直接課責的官員，或基層公務人員對人民施加(O'Donnell, 1998: 118-121)。

(二) 貪腐與水平課責

當政治改革大於經濟改革，菁英會控制其他政治競爭機構，並榨取經濟利益，形成恩庇侍從機器(patronage machine) (Johnston, 1997: 73-76)。若要減少貪腐，不僅需要自由公平的選舉，還要有足夠制衡且政治競爭力量夠強的國會(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67-168)。但拉美文化有高地猶(Gaudillo)強人領導的傳統，立法的存在是擁護多數人的想法，在強人領導的文化下倘多數人選擇支持強人領導者時，政治競爭則不會提升。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亦認為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如習俗與禁忌也是理解貪腐成因的關鍵，這會讓貪腐行為在不同文化中的接受度不同(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276-278)。此種文化觀點強調對家庭或部落的忠誠，而非對於法治的遵從(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48)。

在政治競爭較低，且政府對於國家經濟干預的條件下，更容易滋生貪腐(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51)。在具有人民長期受壓迫歷史的國家，如海地、巴拉圭、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貪腐通常亦較為嚴重；而在有較高生活水準的新興民主國家，如哥斯大黎加、智利、烏拉圭，反貪腐的表現較好(Warf & Stewart, 2016: 144)。另外，貪腐也會阻礙民主的發展，Davis et al. (2004)在智利、哥斯大黎加以

及墨西哥進行問卷調查，詢問「什麼是這個國家民主進程最大的阻礙？」，三國皆認為是貪腐。

Costa (2018)以阿根廷左翼 Kirchner 的例子說明委任式民主在拉丁美洲為什麼會導致貪腐，拉美歷史文化上的世襲制(patrimonialista)²⁶讓 Néstor Kirchner 以國家救星的形象取得政權後，以侍從主義的方式提拔自身的親信，弱化水平制衡機構的能力，而提高自身利益的取得(Costa, 2018: 92)。

而在委任式民主國家有兩種情況會降低水平課責，首先是濫權(encroachment)，即行政權侵犯其他機構的合法權力。第二個是貪腐，也就是公務員為私人或與自己有關係之人取得不法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新興民主國家中，人們對於行政濫權較不關心，而對於貪腐的容忍力卻很低，尤其是對於政府高官以及高額度金錢貪汙(O'Donnell, 1998: 121-122)。委任式民主中民粹領導人的支持基礎具有高度變動的特性使其傾向貪腐，但同時也讓他們面對貪腐醜聞時會更脆弱(Weyland, 1998: 116)。Quiroga (2009)指出短期而言對拉美選民來說，貪腐對民主正當性影響不大，但對現任執政者影響很大。左翼民粹政府或許可以藉由高支持度，以整合國家力量為名侵犯其他機構的合法權力，但若貪腐行徑被揭發，人民對其批評亦將更為強烈(Quiroga, 2009: 227-229)。

(三) 水平制衡的關鍵—司法

那麼什麼情況下能夠增強水平制衡呢？公共—私人的區別、機構之間的界線與行政權的限制是水平制衡的重要概念，而這需擁有實權並願意監督、控制及制裁行政部門的國家機構，且該機構須事實上(de facto)獨立於行政部門，也就是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制衡的概念。當代多元政體的監督機關亦包含申訴專員(ombudsman)、調查官、審計部門以及檢調部門(Costa, 2018: 79; O'Donnell, 1998: 117-119)。簡言之，具有選舉支持的反對黨所領導的檢察機構、獨立於政治影響且專業化的審計部門及司法部門、貧窮人口與貧富不均的降低、國內社會團體與媒

²⁶ 世襲主義(patrimonialism)的特徵是會將公共議題視為自己的私人利益，私人意願(private will)勝過客觀利益。儘管他們表面上支持民主和自由原則，仍將政治機構用作提升個人利益的工具。從選民觀點而言，對候選人的投票傾向是基於個人信任而非候選人的能力，形成高地猶的政治體系 (de Moura, 2019: 352)。

體的蓬勃發展、獨立於政府的資訊蒐集機構都是增強水平制衡的要素，而制衡力量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法院的決定(O'Donnell, 1998: 117-123)。

若要打破委任式民主並增強水平課責，司法的角色比立法來的重要，因為在自由民主國家立法是擁護多數的想法；司法是保護少數，抵抗總統突破其任期限制、打擊貪腐並保護公民權利(Mayka, 2016: 145)。由於委任式民主的政府領導人往往有很高的民意支持，擁護人民想法的立法權與之抵抗無疑是政治自殺²⁷，因此在阻止委任式民主的發展過程中穩健的司法角色顯得格外重要。譬如 2002 至 2010 年間 Álvaro Uribe 強人領導下的哥倫比亞也符合 O'Donnell 的委任式民主概念，但由於司法部門介入，成功阻斷機構弱化的過程。2004 年爆發 parapolítica 醜聞，許多被控訴的立委都是 Uribe 國會聯盟的成員；最高法院亦對抗總統，2008 年 Uribe 非法監聽法院，法院仍不畏懼行政權，將五個省長和議員定罪；憲法法庭九位大法官亦扮演制衡角色，其作為包含（1）裁定總統沒有保護國內流離失所者的公民權（2）裁定國家健康體系沒有照顧到憲法保障的公民權（3）2010 年阻止 Uribe 企圖追求第三任期。最高法院指派的檢察總長對 False Positives²⁸的調查則成為挑戰軍隊自治的主要角色(Mayka, 2016: 146)。

在司法與媒體對貪腐的關係上，若要讓貪腐案件對於選民的貪腐感受產生影響，媒體的報導相當重要，但新聞能否長期占據媒體版面取決於司法機構的力量，也就是司法機構能否持續針對貪腐案件調查並起訴，進而挖掘更多值得被報導的後續發展，巴西的 Mensalão²⁹與 Petrolão 醜聞³⁰即為司法能持續調查起訴，因而佔據更多新聞版面影響選民貪腐感受的例子(Michener & Pereira, 2016: 491)。

²⁷ 在秘魯 Alberto Fujimori 領導下的國會並沒有達到限制領導人的功能，反而助其違法。如國會違反憲法原則通過「真正解釋法」(Law of Authentic Interpretation)，讓 Alberto Fujimori 能突破任期限制參選 2000 年總統選舉(Vergara & Watanabe, 2019: 30)。

²⁸ 在波哥大郊區發現 22 具穿成 FARC 戰士模樣的男屍體，這是因為 Uribe 政策對於剿除 La FARC 戰士者給予現金獎勵。雖然在 Uribe 任期中將非正規軍事活動地區化，解決安全危機，但 False Positives 調查中的非法殺人事件在 Uribe 任期劇增，尤其是少數弱勢民族如非裔哥倫比亞人、無土地農民、城市遊民非法被謀殺數增加，弱勢邊緣團體沒有比較安全(Mayka, 2016: 141-143)。

²⁹ Mensalão 案是勞工黨對國會議員的買票醜聞，會對國會制衡機制造成巨大傷害，侵蝕立法存在的核心價值(core raison d'être of the legislature)，扭曲代議政治中的選民偏好，將公共政策導向其偏好的方向(Michener & Pereira, 2016: 492-493)。

³⁰ Petrolão 貪腐案是指巴西國有石油公司 Petrobras 在 2014 年受到司法起訴(indictment)，又被稱為大油膩(the big oily)，透過媒體的報導於 2015 年造成大規模的遊行抗議，以及對 Rousseff 總統的彈劾(Melo, 2016: 52-60)。



三、 委任式民主、失根民主與代議民主

(一) 從委任式民主到代議民主

O'Donnell (1994)認為雖然委任式民主並非鞏固且制度化的代議民主，但仍然具有可持續性，不會突然回歸威權。委任式民主有經由二次轉型(second transition)走向制度化、鞏固民主的可能，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因素是「是否能建立制度並讓其成為政治權力中的決策點(decisional point)。」這些民主制度³¹更能處理社會經濟問題(O'Donnell, 1994: 55-59)。反之委任式民主非但無法在制度上取得進展，政府也無法有效地處理社會經濟危機。主要是因為委任式民主的全能(Omnipotence)觀點認為其他機構譬如法院、國會都是一種對全權委任總統的阻礙，總統孤立於大多數政治機構和組織利益之外，將國會和政黨排除在決策外，只對自己政策成敗負責(O'Donnell, 1994: 66-68)。這種反機構，對於行政權高度集中化、個人化的決策方式雖有助於快速的政策制訂，但同時有較高的犯錯風險，無法長期有效地規範社會生活。反之，制度化的民主決策過程儘管冗長，惟一旦決策定案後比較可能實現(Conaghan, 2016; O'Donnell, 1994)。

比較代議民主與委任式民主，代議民主以自由的概念為基礎，選民透過乾淨且有競爭性的選舉選出代表來履行被賦予的職責，政府的決策過程相對透明，且有健全的機構作為選民和代議士之間的橋樑；委任式民主的委任(delegación)缺少課責性及監督控制，少了人民的監督與課責，其委任的代表很可能走向與人民意向不同的方向(Costa, 2018: 77-78)。

³¹ 在此民主制度的定義是一種政治制度，在其領土內具有強制力的決定權、有近用政策決策的管道、並對於集體利益的追求與身分的形成具有制度化規範。具體而言是指憲政網絡中的多頭政治，包含國會、司法、政黨以及公平選舉(O'Donnell, 1994: 57)。

表格 2-3: 委任式民主與代議民主的差別

面向	代議民主	委任式民主
權力取得/ 批准	選舉	選舉／連任
權力實施	機構間協調 選民－代議士／公民－ 政府官員之間的連結	決策者個人 領導人－群眾／公民－ 政府官員之間的連結
民主過程	代議式為主，參與式為輔	參與式為主，代議式為輔
委任(delegación)	代議士	行政部門
課責性	高	低（僅垂直課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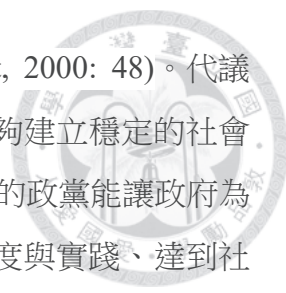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Noriega & Puerta (2015: 180)

以現今拉美民主發展回顧委任式民主理論，符合 O'Donnell 預期的是「政體不見得會從威權線性地往低民主、高民主發展」，衰退的民主也能透過水平課責的增強成為健全的代表性政體。不符合 O'Donnell 預期的是其基於過去 1990 年代的經濟結構調整背景，認為委任式民主是由經濟危機產生。然而事實證明經濟蓬勃發展亦會促進委任式民主，如玻利維亞、厄瓜多、委內瑞拉與阿根廷(Luna & Vergara, 2016: 160)。

(二) 失根民主與代議民主

右轉國家是否因為水平課責增強而提升民主品質，達到代議民主呢？答案是肯定的。制度化的代議民主要同時滿足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水平課責包含司法、審計、檢調及國會的力量，垂直課責是選民、社會組織、政黨以選舉和遊說的方式表達社會利益(Vergara & Watanabe, 2019: 26)。水平課責增強不見得會走向 O'Donnell 所期許的代議民主，當強水平課責與弱垂直課責同時存在時會導致失根民主(uprooted democracy)，此時政治系統與廣大的社會脫節，造成民眾需求與政策制定之間代表性連結的喪失，如近年來右轉的巴西、智利及秘魯就是此類國家(Luna & Vergara, 2016: 162-163; Vergara & Watanabe, 2019: 26-27)。

那麼為什麼垂直課責會弱化呢？這就要從政黨體系弱化談起。雖然 Talia & Ernesto (2017) 比較巴拉圭和烏拉圭的政黨制度化(institucionalización partidista)與民主品質之間的關係，認為政黨制度化並非民主的充分條件(Talia & Ernesto, 2017:



299)。但制度化的政黨體系仍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元素(Lipset, 2000: 48)。代議民主需要制度化的政黨來調和社會利益，因為制度化的政黨能夠建立穩定的社會支持(Mainwaring, 1999: 341)。尤其在新興民主國家中，制度化的政黨能讓政府為其行為負責、避免產生反建制的政治人物、使人民習慣民主制度與實踐、達到社會利益加總、政治領導人培育與甄補，並建立可持續的政府(Ezrow, 2011: 3)。而委任式民主領導人如秘魯的Alberto Fujimori統治下造成政黨體系瓦解，再加上對抗光明路導致公民社會的弱化，在缺少社會動員力量以及穩健政黨體系的環境下，選民難對領導人課責，公民社會成為「解體的群體」(disbanded multitude)，無法對政治產生影響力，亦使領導人缺少實踐其競選時改革承諾的工具，以及失去動機去面對改革所帶來的風險(Vergara & Watanabe, 2019: 2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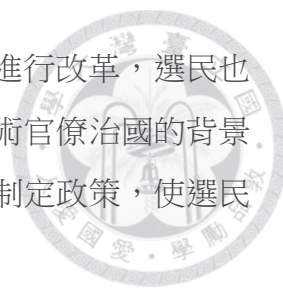
以秘魯為例，Alan García與Ollanta Humala都於競選時承諾改革，右翼Pedro Pablo Kuczynski則許諾打擊貪腐，但這些承諾最後都沒有實現，領導人在上任後都選擇維持現狀的政策，這便是受Fujimori時期以來弱政黨體系、弱公民社會的影響(Vergara & Watanabe, 2019: 32-33)。

而為什麼拉丁美洲政黨體系會失去總和與調節社會利益的能力呢？首先是後工業社會在社會、領土、文化的分歧是人類歷史以來最高，面對與地方領土界線的不相符，形成利益加總的挑戰，讓代議機構譬如政黨無法適當地代表不同社會利益。

再來是由於新聞、資訊及公眾事務更透明，關於特定議題的醜聞、媒體報導及自發社會動員對政治影響力加大，社會充滿許多「單一議題公民」，政黨難以在不同利益與意識形態中取得平衡，導致政黨體系弱化，更使得領導人的正當性取得與失去改變快速。

最後，在民意及政治支持高度揮發的政治脈絡下，政治菁英沒有動機與政黨長期合作。對菁英來說未來就是現在，政治家追求個人勝利，而非努力尋找穩定且全面的政黨作為代議的橋樑。就算有與菁英長期合作的政黨，他們的成功也是來自於過去社會創傷的廣泛認同感。譬如智利政黨體系的穩定是由於人民對Pinochet獨裁者的記憶，讓菁英願意與政黨長期合作以防止獨裁者再出現的可能(Luna & Vergara, 2016: 163-165)。

弱的政黨體系讓政治人物不受社會監督，政治人物缺少足夠的知識來領導人



民，且在國會中沒有穩定的政黨支持，使政治人物沒有動機去進行改革，選民也因此產生距離感。換言之，在弱政黨、去動員化的社會以及技術官僚治國的背景，政治人物缺乏動機追求政策變革，而讓非民選的技術官僚制定政策，使選民感到失去代表性(Vergara & Watanabe, 2019: 38-39)。

貳、待驗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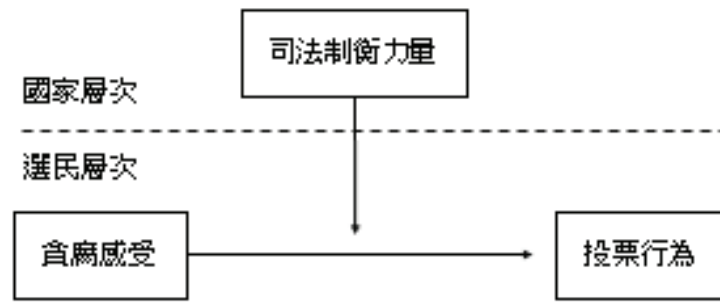
一、解釋變數－貪腐議題與司法制衡

拉美作為新興民主國家，自獨裁專制到民主化的過程中，權力從集中到分散，有更多新的否決者進入政治舞台，增加了要求非法回報的行為者數量(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48-151)，創造貪腐的需求。而委任式民主的領導人會強化個人主義，將權力集中於行政部門，使其權力凌駕於社會及機構之上，並以政治運動為基礎讓人民相信領導人為國家救星，進而取得廣大社會支持(O'Donnell et al., 2011: 21)。在弱政治競爭的環境下，若國家以積極干預經濟活動的重分配政策取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貪腐會有增加的趨勢(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51-152)。

在領導人方面，左翼浪潮的領導人具有委任式民主特徵，為有效地進行改革而集中行政權力，具體方式諸如頒布新憲法、控制媒體及水平課責機構、創造裙帶資本主義維繫統治、將企業國有化並與當地商人建立侍從關係，委內瑞拉的 Hugo Chávez 即為此例(Castañeda, 2006: 41-42)。

在選民層面，受益於左翼執政帶來的貧窮減少、退休金普及、醫療體系改善及社會政策擴大，讓過去貧困的公民接受政治人物買票(vote-buying)的動機下降，對侍從的需求降低(Hagopian, 2016: 122-123)。選民對政黨的信賴(credibility)不再仰賴侍從，而是來自於治理表現，即依照政府整體施政表現進行評斷(Hagopian, 2016: 124-126)。

在這樣的背景下若司法制衡力量增強，讓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體系能對政府貪腐行為起訴，經由媒體的報導影響選民對執政者的觀感，能讓貪腐議題在近年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增加，故以司法制衡力量作為本文的調節項。



圖表 2-5 司法制衡力量調節投票行為示意圖

根據前述的討論，本文提出假設一與假設二：

H1: 左翼執政下選民認為左翼愈貪腐，愈傾向投給右翼。

H2: 貪腐對執政者的課責效果會隨司法制衡力量提高而增加。

二、 控制變數－經濟因素

本文認為經濟下滑亦為左翼退潮的原因。粉紅浪潮的高經濟成長，有助於左翼執政黨採行重分配政策，如巴西的 Bolsa Familia³²、阿根廷的 Asignación Universal por Hijo (AUH)³³ 等轉移性支付，提供普遍無條件的教育與健康照顧計畫。亦有條件嚴格的社會福利政策如智利的 Sistema Chile Solidario³⁴。但這些社會福利擴張仰賴國際貿易中原物料的出口收益，在出口繁榮時足以支付高額社福支出，但當國際原物料價格下滑時則無法支應，如 2009 年的厄瓜多及智利、2010 年的玻利維亞及委內瑞拉、2013 年後的阿根廷。簡言之，好的經濟發展讓重分配政策以及挑戰美國自由主義霸權的左翼有崛起的機會，社會福利的擴張與否取決於國際銅、石

³² 巴西的 Bolsa Familia 計畫於 2004 年提出，是巴西聯邦政府的主要社會福利計畫，自詡為世上最大的社會福利計畫(el plan social más grande del mundo)，規模觸及巴西一億九千萬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三。該計畫預算占其 GDP 的 0.37%，基本上是對於低收入戶的無條件補助，包含小孩的教育與疫苗接種(Agis et al., 2010: 10-16)。

³³ 阿根廷的社會保護計畫 Asignación Universal por Hijo (AUH)於 2009 年開始執行，包含四大面向清寒(pobreza)、飢貧(indigencia)、不平等(desigualdad)與相對弱勢(vulnerabilidad relativa)的社會福利主軸，受益家庭比巴西 Bolsa Familia 的家庭數多出 55 萬戶，該計畫預算占阿根廷 GDP 的 0.58%(Agis et al., 2010: 8-16)。

³⁴ 智利共同體系(Sistema Chile Solidario)是一個由橋梁(puente)、聯繫(Vínculo)、街道(Calle)、道路(Camino)四大經濟援助計畫組成的福利體系，覆蓋層面相當廣泛，但與巴西和阿根廷的無條件轉移支付不同，智利共同體系中不同計畫是針對不同特定弱勢設計，不以消除貧窮為目的，而是以社會整合為宗旨(Agis et al., 2010: 12)。

油及大豆價格，而非重分配政策本身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一旦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使國家經濟下滑，將無法支付重分配政策所需支出(Blanco & Grier, 2013: 79-82; Rammer, 2012: 952-953; Rojas, 2017)。

而在拉美經濟投票課責的部分，張佑宗(2006)以混合模型將總體資料與個體資料一同納入分析，證實經濟投票的選舉課責機制確實存在於拉美各國，在民眾高度關切國家總體經濟狀況下，政府經濟政策表現的確影響人民是否繼續支持執政黨的決定。並發現總統制政府的得票率較內閣制政府的得票率更容易受到經濟政策結果的影響，而本文所分析之拉美十八國除秘魯採行混合制，其餘皆採總統制，故可預期經濟課責對投票行為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過去左翼崛起是因為 1989 年華盛頓共識後採行新自由主義，導致高通貨膨脹與高貧富差距，在貧窮人口眾多下，左翼以貧窮人口的選票為基底上台，在不對中產階級加稅為前提下，為了取得社會福利支出的收入來源，左翼領導人傾向國有化大型企業及能源產業，並受惠於國際油價上漲使左翼得以維持。而本文認為 2008 年經濟危機，加上國際石油價格走低，左翼政府難以維持重分配政策的龐大支出，人民對左翼政府的經濟表現不滿，使選民對左翼的支持降低。

H3: 左翼執政時期經濟成長率愈低，選民對左翼執政者支持愈低。

第三章 總體層次分析



第一節 資料初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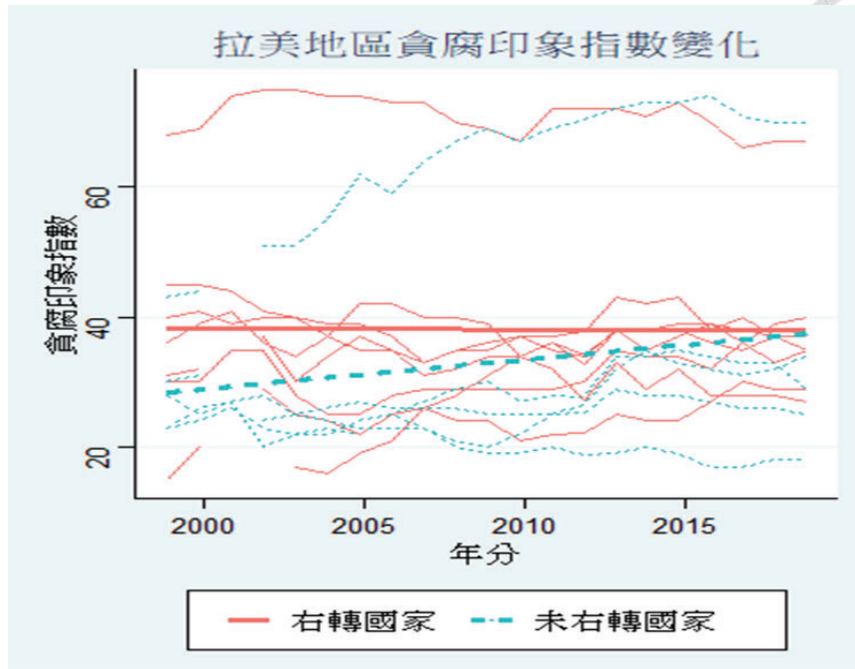
在確立本文理論架構與待驗假設後，本節以政黨選舉得票率、貪腐印象指數、司法制衡指數、經濟成長率與吉尼係數的變化，觀察在拉丁美洲這些變化是否符合理論預期。發現在貪腐印象指數變化上，右轉國家自左翼上台至近年左翼下台年間，有愈趨認為政府較為貪腐的趨勢；未右轉持續左翼執政國家則無此現象。並以 T 檢驗證實左翼政黨得票率會因選民對貪腐感受愈高而使得票率愈低。水平課責方面則可見對領導人的國會彈劾及司法起訴案件多於近年右轉國家出現。此外，右轉國家水平制衡指數都較未右轉國家高，且右轉國司法制衡力量在本文研究時間段呈現上升趨勢。

在經濟上，確實如預期中左翼浪潮時經濟成長上升，而本研究認為的左翼退潮時期經濟成長有下降趨勢。另外，各國吉尼係數亦有下降趨勢，即貧窮人口比例下降，選民在經濟水平提升後關心經濟以外的議題，如本文中的貪腐議題。

壹、貪腐議題與司法制衡

一、貪腐與政治傾向

在下圖表 3-1 中，實線是右轉的國家，虛線代表尚未右轉的左翼政權；細線是各國貪腐印象指數變化，粗線是右轉國家及未右轉國家的貪腐印象指數均值變化。我們可以觀察到整體而言右轉國家在過去貪腐印象指數較未右轉國家高，即認為政府較清廉，然而近年來有下降的趨勢，換言之這些右轉國家人民更覺得政府貪腐，也就是本文認為左翼退潮是貪腐所致；反觀未右轉的國家儘管過去認為政府較貪腐，但近年來則認為政府較清廉，其貪腐印象指數有上升趨勢。



圖表 3-1 貪腐印象指數變化

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但在回答假設一：「左翼執政下，選民對左翼反貪腐表現愈差，愈傾向投給右翼。」之前，我們要先確定左翼浪潮以來，貪腐確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且認為左翼政府愈貪腐，其得票率愈低；反之右翼得票率愈高。以本文分析標的拉美十八國，並以左翼崛起 1998 年委內瑞拉 Nicolás Maduro 上台為始點，採 Baker & Kenneth (2011)所建置的各政黨總統選舉得票率，以及國際透明組織的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³⁵分析。如下表格 3-1 所示，左翼得票率與貪腐印象指數之相關係數為 0.07541695，右翼則為-0.1505297，符合假設一：「左翼執政下，選民對左翼反貪腐表現愈差，愈傾向投給右翼。」之預期。

表格 3-1: 政黨得票率與貪腐印象指數

左右翼政黨與貪腐印象指數	相關係數
左翼得票率與貪腐印象指數	0.07541695
右翼得票率與貪腐印象指數	-0.1505297

惟相關係數介於 0 至 0.09 之間視為無相關，0.1 至 0.3 之間往往被視為弱相關，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進行 T 檢定，並觀測其 P 值（分布在常態分配下大於等於 T 值的機率密度值）是否顯著。由下表格 3-2 檢定結果可見 P 值小於 $\alpha = 0.05$ ，T

³⁵ 為 0-100 的順序尺度，愈高愈清廉，反之愈貪腐。

值顯著落在 95%信賴區間的接受域之外，因此拒絕虛無假設「政黨得票率與 CPI 無相關」，而接受對立假設「政黨得票率與 CPI 相關」，故假設一符合預期。

表格 3-2: 學生 T 檢定

T 檢定	T 值	自由度	95%信賴區間		P 值
左翼得票率與 CPI	-23.446	85.041	-37.47312	-31.61430	< 2.2e-16
右翼得票率與 CPI	-23.291	83.035	-37.70242	-31.76977	< 2.2e-16

二、 水平課責

回答假設二：「對於左翼反貪腐表現的課責效果，會隨著水平制衡（尤其是司法）力量提高而增加。」換句話說筆者認為現在的左翼退潮是由於水平制衡力量增強，使貪腐議題對於政治傾向的效果提高。如此我們可以先從 1998 年以來司法部門對於總統的起訴以及國會對於總統的彈劾案件作為觀察，若假設成立，理應看到的是 1998 年至 2008 年之間國會與司法部門沒有對總統作出制衡，而本文研究時間段 2008 年以降國會與司法部門對總統的彈劾與起訴案件增加。

表格 3-3 為作者自網路整理 1998 年以後拉美地區受國會彈劾下台的總統，不包含彈劾程序未走完³⁶。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左翼或右翼政黨都有被彈劾的案例。在表格 2-2 我們已知左翼轉到右翼的國家為智利、阿根廷、瓜地馬拉、巴拉圭、秘魯、巴西及薩爾瓦多共七國，可以看到六位總統中有五位來自於右轉國家，可見右轉國家的水平制衡力較強。

表格 3-3: 國會彈劾下台的總統

總統名稱	國家	事由	時間	左右意識形態
Raul Alberto Cubas Grau	巴拉圭	彈劾理由為意圖違反憲法第三條、違法對 Lino Oviedo 特赦 ³⁷ 、沒有完成其司法義務等五項理由	1999	右翼
Alberto Fujimori	秘魯	2000 年國會宣告其無法繼續執政，且該總統被指控貪腐、謀殺等罪刑。	2000	右翼

³⁶ 如秘魯的 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 是被彈劾後自己請辭，故不列入其中。

³⁷ Raul Cubas 原作為副總統候選人與 Lino Oviedo 一起角逐 1998 總統選舉，但因 Oviedo 參與 1996 年政變而被軍事法庭起訴，最後由 Cubas 勝選擔任總統，Cubas 當選後隨即對 Lino Oviedo 予以特赦(Servin, 2013)。



Lucio Gutiérrez	厄瓜多	干預國家司法，以政治親信撤換掉 31 個大法官中的 27 位，並被指控參與出售軍火給 La FARC 的貪腐案，國會因而撤銷其職位。	2005	左翼
Fernando Lugo	巴拉圭	被指控對 17 個死去的人民有政治責任，造成 2012 年的國會政變 (golpe parlamentario) ³⁸ 。	2012	左翼
Otto Pérez Molina	瓜地馬拉	因賄賂 (bribe) 與挪用公款 (embezzlement)，於 2015 年被國會剝奪總統豁免權。	2015	右翼
Dilma Rousseff	巴西	2015 年至 2016 年間，因違反財政法與貪汙而遭到彈劾。	2016	左翼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³⁹

根據 O'Donnell 的理論觀點，水平制衡力量中最關鍵的是司法角色，國會的彈劾需要通過司法的審理、貪腐案件的曝光亦需要司法體系的偵查與起訴，因此也要從司法起訴案件觀察，本文分析 1998 年至今受到起訴的研究標的 18 國之總統⁴⁰。表格 3-4 中我們可以看到左右翼總統皆有受到司法起訴的案例。

儘管過去的右翼政黨亦不民主，但近年右翼政黨利用人民對貪腐的不滿，打著民主價值再起 (Houtart, 2017: 6)。我們從起訴時間以及國家可以發現時間多在 2008 年以後，意即本文所謂左翼退潮時間的起始點，且這些受起訴的 15 位總統中，有 13 個來自本文所稱之右轉國家。

³⁸ 彈劾的起因是在 Canindeyú 省 Curuguaty 區的一場暴力衝突造成 11 位無地農民及 6 位警察死亡 (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280)，國會以違反 1992 年憲法第 17 條中保護公民權利提出彈劾 (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289)。

³⁹ Margot Desautez. 2017. "Los presidentes destituidos en América Latina en los últimos 25 años." Deutsche Welle (DW), <https://www.dw.com/es/los-presidentes-destituidos-en-am%C3%A9rica-latina-en-los-%C3%BAltimos-25-a%C3%B1os/g-41895232>. Latest update 15 November 2019.

BBC Mundo. 2018. "PPK y otros 5 presidentes de América Latina que no pudieron terminar sus mandatos por acusaciones de corrupción."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internacional-43509229>. Latest update 15 November 2019.

⁴⁰ 之所以不用審判為標準是因為執政者往往因為職務關係有審判豁免權，例如受貪腐起訴的阿根廷總統 Cristina Fernández 即為此例，由於是參議院議員身分有審判豁免權，使其能夠以副總統候選人身分角逐 2019 總統大選。

表格 3-4: 受起訴的總統

名稱	國家	事由	時間	左右意識形態
宣告有罪且服刑中				
Alberto Fujimori	秘魯	因違反人權，包含謀殺、綁架而被定罪貪腐 ⁴¹ 。	2007	右翼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巴西	貪汙行為，收受 OAS 建設公司的賄賂 ⁴² 。	2018	左翼
Antonio Saca	薩爾瓦多	因挪用公款與洗錢遭起訴。	2016	右翼
Rafael Callejas	宏都拉斯	罪名包含收受賄賂、有組織犯罪與選舉詐欺。	2016	右翼
等待審判				
Otto Pérez Molina	瓜地馬拉	因賄賂與挪用公款，2015 年被國會剝奪總統豁免權。	2015	右翼
Álvaro Colom	瓜地馬拉	因購買大眾運輸系統的貪腐案件受到起訴。	2018	左翼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阿根廷	因 Notebooks scandal 貪腐案 ⁴³ 與收受回扣 (kickbacks) 受到起訴，但因參議院職位有豁免權，並參與 2019 總統大選。	2018	左翼
Ricardo Martinelli	巴拿馬	為巴拿馬前總統，因在位期間非法監聽記者、政客、商業領袖，以及貪腐案件受到起訴。	2017	右翼
Alejandro Toledo	秘魯	被指控收受巴西 Odebrecht ⁴⁴ 公司 2 千萬賄賂。	2019	右翼
Alán García	秘魯	利用會議契約不當收取 Odebrecht 公司回扣，在被蒐證逮捕前自殺。	2019	右翼

⁴¹ Alberto Fujimori 在 2007 年被判刑入監服刑 25 年，理由是參與大規模貪腐案件及嚴重違反人權 (Levitsky, 2011: 86)。

⁴² Dom Phillips. 2017. "Brazil's ex-president Lula sentenced to nearly 10 years in prison for corruptio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ul/12/brazil-president-lula-convicted-corruption>. Latest update 15 November 2019.

⁴³ BBC News. 2018. "Argentina notebook scandal: Driver details 'decade of bribe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45049064>. Latest update 29 December 2019.

⁴⁴ Odebrecht 是一家巴西建設公司，2014 年 12 月該公司總裁因與洗車場(Lava Jato)調查有關而被逮捕。該案件揭露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及委內瑞拉政府高層的貪汙醜聞，Odebrecht 坦承在 2005 到 2014 年間在秘魯支付高達兩千九百萬美元的賄賂金。該事件牽連秘魯自 2001 年以降到 Pedro Pablo Kuczynski 任內的所有總統(McNulty, 2017: 567-568)。

Ollanta Humala	秘魯	因涉 Odebrecht 公司貪汙案受起訴。	2019	左翼
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	秘魯	被指控從公共計畫貪腐，包含大洋際公路 (La Carretera Interoceánica) 和灌溉系統，以及巴西 Odebrecht 的貪腐案件。	2019	右翼
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	玻利維亞	被指控在 2003 年違反人權，軍事鎮壓。	2009	右翼
Mauricio Funes	薩爾瓦多	被指控其任內(2009-2014)洗錢及非法致富 (illicit enrichment)。	2016	左翼
Francisco Flores	薩爾瓦多	被指控盜用公款 (peculado)、洗錢及非法致富。	2015	右翼

資料來源：網路資料⁴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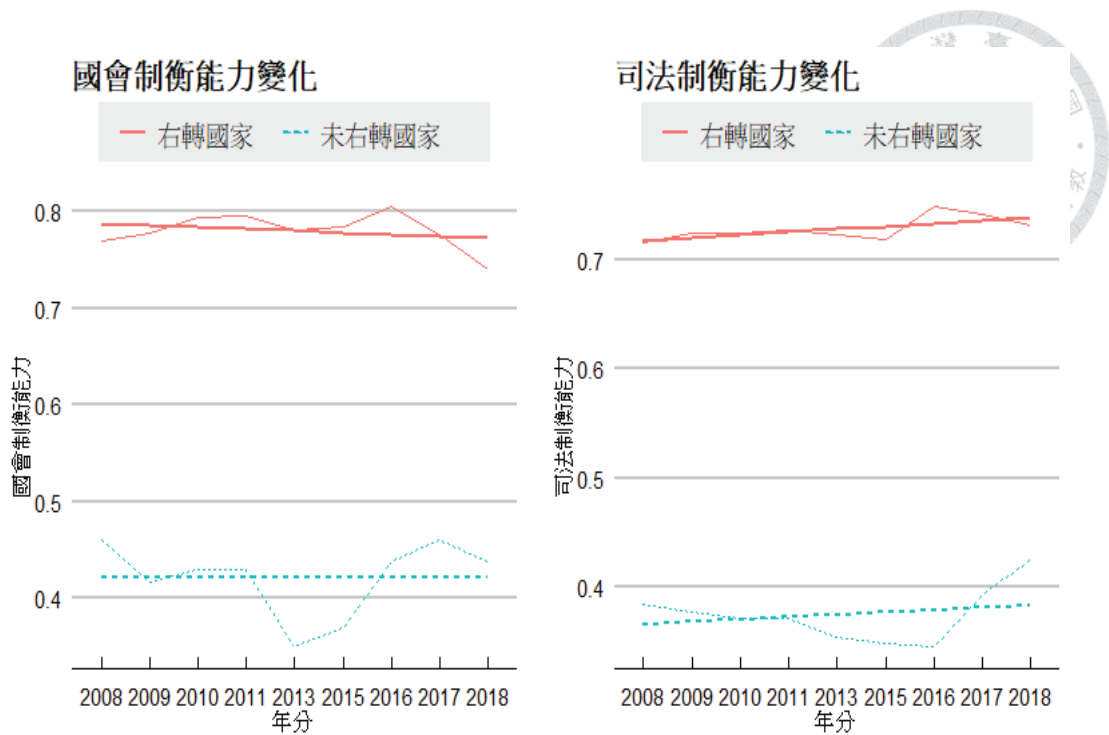
進一步以 V-Dem 資料觀察國會制衡能力與司法制衡能力在 2008 年至 2018 年間的變化，圖表 3-2 可觀察到右轉國的國會制衡能力與司法制衡能力都大幅高於未右轉國的水平制衡能力，且右轉國的司法制衡能力在 2008 年至 2018 年間有明顯上升趨勢，故在確立貪腐與左翼得票率關係，並證實右轉國司法制衡力量提升，並與未右轉國有大幅差距後，可以認為假設二「對於左翼反貪腐表現的課責效果，會隨著司法力量提高而增加」的論點成立。

⁴⁵ BBC Mundo. 2019. “Alan García: de qué acusaban al expresidente de Perú que se suicidó cuando lo fueron a detener.”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7967534>. Latest update 17 November 2019.

Benjamin Russell. 2019. “Legal Trouble for Latin American Presidents.” Americas Quarterly.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content/presidents-prison-temer>. Latest update 23 October 2019.

CÑÑ. 2017. “El mapa de los presidentes acusados de corrup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https://cnnespanol.cnn.com/2017/07/13/el-mapa-de-los-presidentes-acusados-de-corrupcion-en-america-latina/>. Latest update 17 November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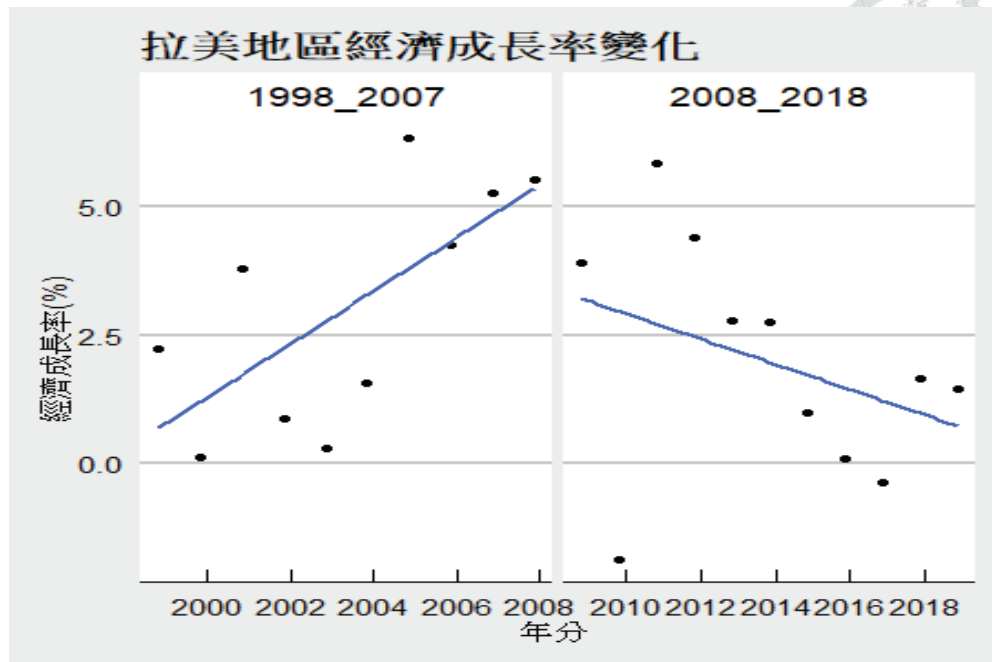
Univision. 2019. “Ordenan 3 años de prisión preventiva al expresidente de Perú Pedro Pablo Kuczynski acusado de corrupción.” <https://www.univision.com/noticias/america-latina/ordenan-3-anos-de-prision-preventiva-al-expresidente-de-peru-pedro-pablo-kuczynski-acusado-de-corrupcion>. Latest update 17 November 2019.



圖表 3-2 水平制衡能力變化

貳、經濟下滑與左翼衰退

左翼的新民粹主義不僅導致政治不穩定，且往往會迫使政府追求福利主義經濟政策，使經濟喪失競爭力(Biglaiser, 2016: 188)。阿根廷左翼總統 Néstor Kirchner 執政時期國際經濟環境繁榮穩定(Costa, 2018: 92)。繁榮的經濟能為社會政策的實施貢獻更多資源，如秘魯的 Junto 社會政策下，自 2001 年以來在健康醫療與教育的支出增加一倍以上(Vergara & Watanabe, 2019: 28)。惟當經濟下滑時，重分配政策的成本提高，領導人的政策選擇減少，人民對左翼政府的信心下降，選民投票偏好將朝向右翼傾斜(Rammer, 2012: 953)。假設三是「左翼執政時期經濟成長率愈低，選民對執政者（左翼）支持愈低。」此邏輯若要成立，必須先確定是否在左翼浪潮時期拉美地區總體經濟成長持續攀升，而在本文研究的左翼退潮時間段內拉美地區總體經濟成長出現衰退。這裡採用世界銀行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為指標，圖表 3-3 得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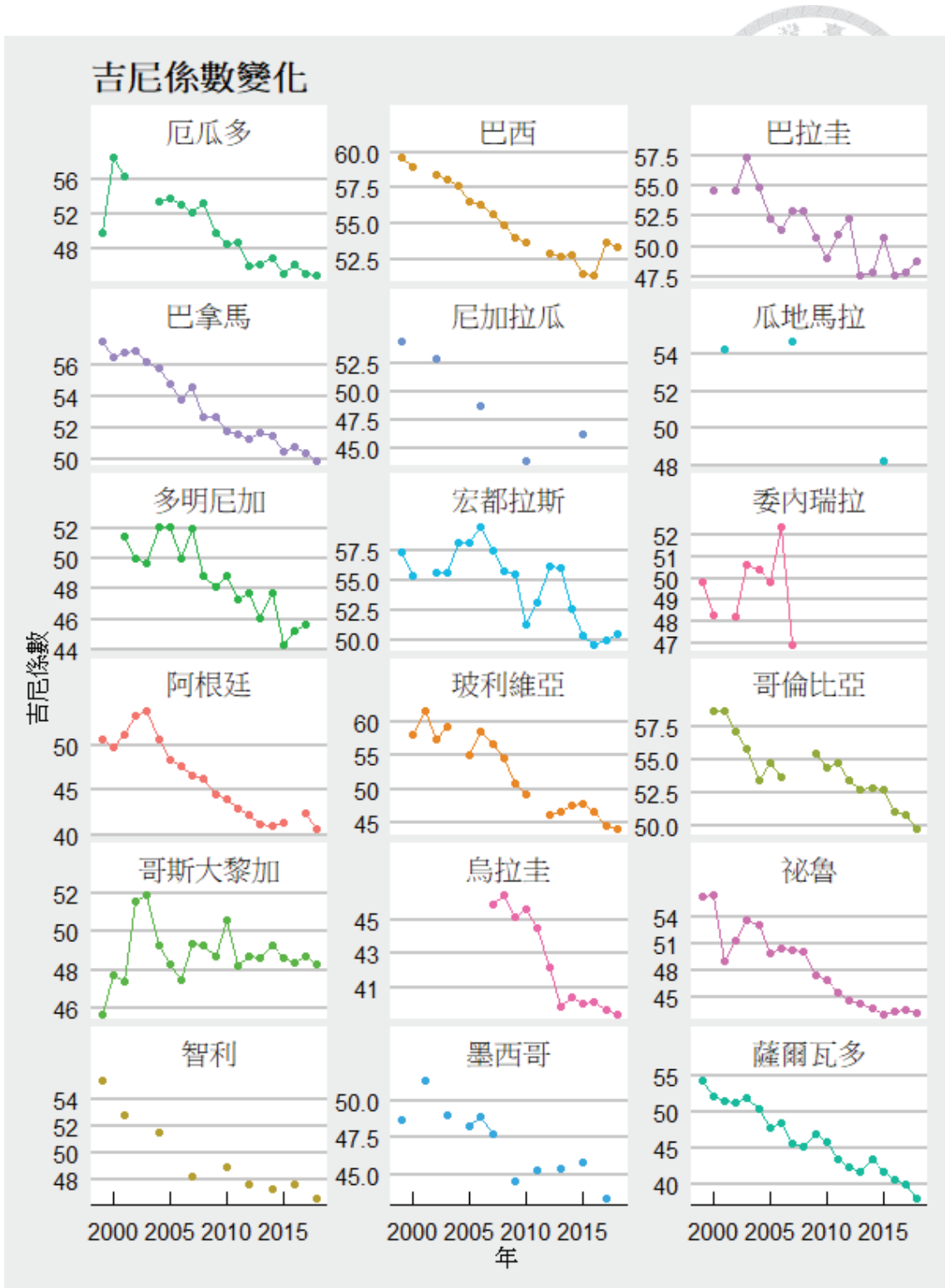
圖表 3-3 1998-2018 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參、貧富差距與左翼衰退

當貧窮減少，教育與醫療等社會福利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經濟將不再是影響投票行為的最重要因素。2000 年以降，在左翼改革者領導的國家，吉尼係數持續下降，包含 1998 年委內瑞拉的 Hugo Chávez、2002 年巴西的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2003 年阿根廷的 Néstor Kirchner、2005 年玻利維亞的 Juan Evo Morales Ayma。然而在擁抱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中，吉尼係數下降的比率也相近(Rojas, 2017: 72)。隨著貧窮人口減少，左翼政府吸引力不如過去所得高度不均時期，加上右翼執政國家的吉尼係數亦有降低，故中下階層選民並非一定要投給左翼才能改善其生活。

在此種觀點下，左翼退潮背後的邏輯是隨著貧富差距縮小，加上不論左翼或右翼執政下的拉美國家貧富差距都有縮小趨勢，使得左翼以財富重分配為口號的吸引力降低，並使人民開始關心經濟以外的議題。圖表 3-4 呈現拉美十八國 1998 年至 2018 年的吉尼係數，發現除了哥斯大黎加之外，幾乎各國不分執政者意識形態，吉尼係數都有下降的趨勢。



圖表 3-4 拉美吉尼係數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第二節 事件史分析



在上節確立左翼與貪腐、經濟議題的關係後，本節為強調左翼退潮的時間因素，進一步以事件史分析(time-to-event analysis)，證實 2008 年之後在司法制衡較高的左翼國家，其左翼失去執政權的可能性較大。這是因為根據本文理論在司法制衡高的國家，司法機構對政府貪腐案件的起訴會讓貪腐議題變得重要，進而導致左翼的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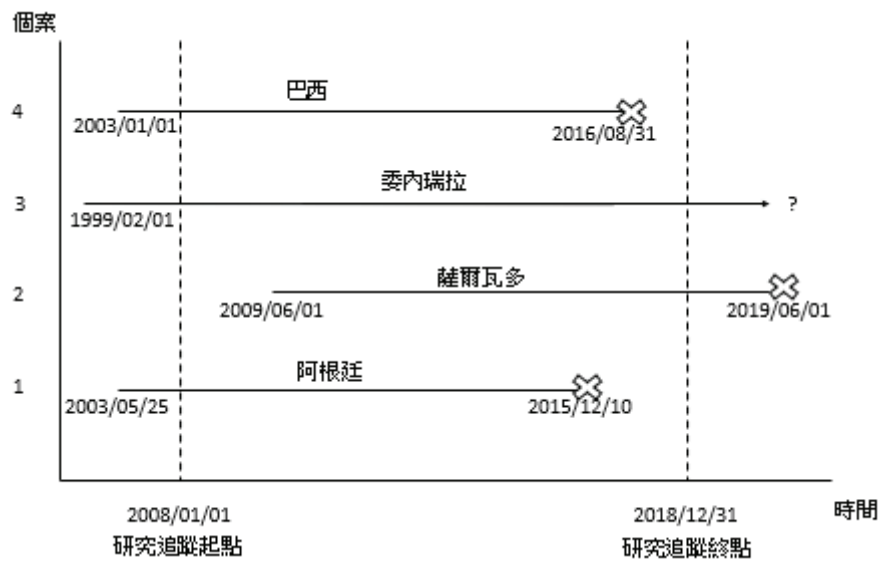
壹、 事件史分析的概念

事件史分析關注在隨著時間的變化，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分析，由於是分析特定時間長度的存活時間(survival time)，故又被稱為存活分析(survival analysis)。這種研究方法被廣泛運用在醫學研究上，包含死亡、腫瘤復發機率的計算(Altman & Bland, 1998: 468)。在社會科學領域可以被用來回答失業時間長短以及哪些因素造成每個人失業時間不同，如社會福利的接受、保留工資(reservation wage)多寡等(Kiefer, 1988: 646)。

貳、 研究設計與模型選擇

一、 資料結構

時間－事件資料結構特徵上要先了解追蹤時間多長、事件發生起點為何，以及資料型態是否被刪截(censored)。本文以天為單位，並以 2008 年 1 月 1 日作為追蹤的起點，2018 年 12 月 31 日為最後刪截的時間點，觀察這些左翼浪潮中左轉的國家在什麼時間，什麼因素影響下導致左翼喪失執政權，如下圖表 3-5 所示。



圖表 3-5 資料結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 觀察對象

目標國家為分類中的左左(LL)以及左右(LR)共十三國，即未右轉（左左）的五國－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維亞、厄瓜多、烏拉圭，以及右轉（左右）的八國－薩爾瓦多⁴⁶、瓜地馬拉、巴西⁴⁷、智利⁴⁸、秘魯、巴拿馬、巴拉圭。

十三個樣本數是否適合採用 Cox 模型進行事件史分析呢？傳統上認為此模型需要十個單位預測變量事件(event per predictor variable, EPV)(Vittinghoff & McCulloch, 2007: 710)。而 Vittinghoff & McCulloch (2007)以不同事件數量進行比較後發現採用 5-9 個單位預測變量事件與採用 10-16 個單位預測變量事件所犯型一錯誤的比率以及信賴區間相似(Vittinghoff & McCulloch, 2007: 716-717)。故本研究在 13 個目標觀察對象中，針對單一變項「司法制衡能力」進行分析有其正當性。

⁴⁶ 薩爾瓦多雖在本文歸類在右轉國家，但在此研究時間段中並沒有右轉，故在本分析中屬於被右刪截(right censored)而沒有事件發生（左翼喪失執政權）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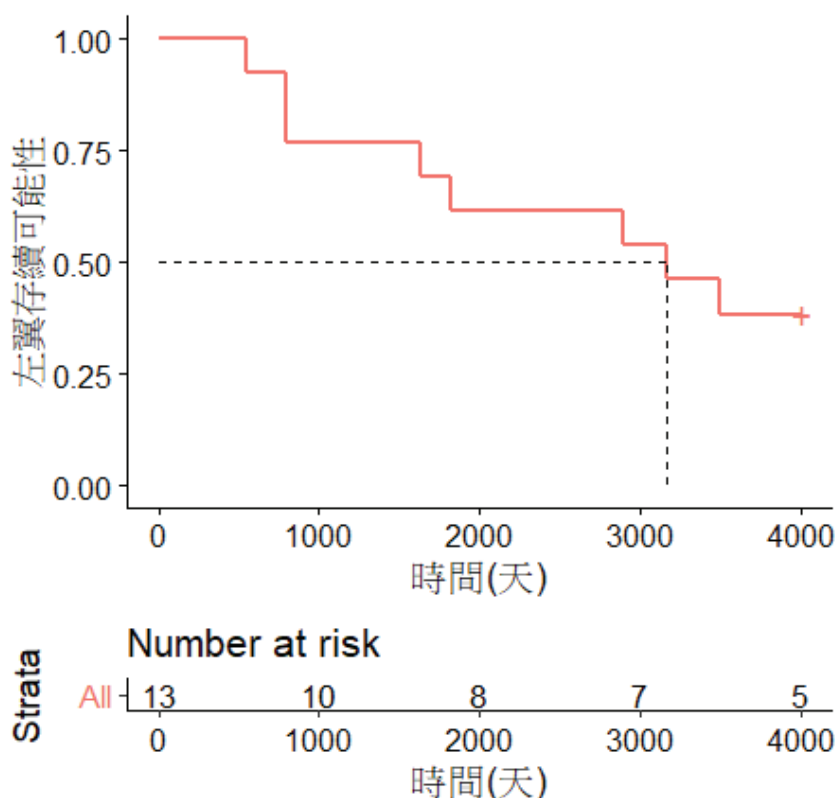
⁴⁷ 巴西以 Dilma Rousseff 被彈劾下台為事件發生點，雖然 Michel Temer 屬於中間派而非右翼，但這裡是以左翼執政的結束作為事件發生。

⁴⁸ 左翼失去執政權後仍可能重回，如左翼 Michelle Bachelet 於 2014 年重回執政，但這裡以智利民主化以來第一次右翼執政，也就是 2010 年右翼 Sebastián Piñera 的上台作為左翼退潮事件發生。



三、 模型選擇

在時間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分析上,採用生命表(life table)以及 Kaplan & Meier (1958)提出的分析方法,上述兩種分析方法可以得知超過特定存活時間 t 的可能性 (Cox, 1972: 188)。如下圖表 3-6 可以觀察到這十三國左翼自研究追蹤時間起點存續至 3165 天的可能性為百分之五十,且透過生命表可以得知在經過特定時間後有多少國家仍為左翼執政。



圖表 3-6 Kaplan-Meier 估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但這樣的非參數分析僅適用於敘述性統計,並未回答本文真正關心的議題「是什麼原因讓左翼退潮」,因此必須透過迴歸模型進一步分析。參數分析可以將其他變數納入考量,但需假定樣本適用於何種分布。常見的分配如 Weibull 分布、指數分布及對數正態分布(log-normal distribution)。而本文所採用的是 Cox (1972)所提出的比率危險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此模型被廣泛運用的原因是因為其屬於無母數分析的半參數模型(semiparametric model),對樣本分配假設的要求較為寬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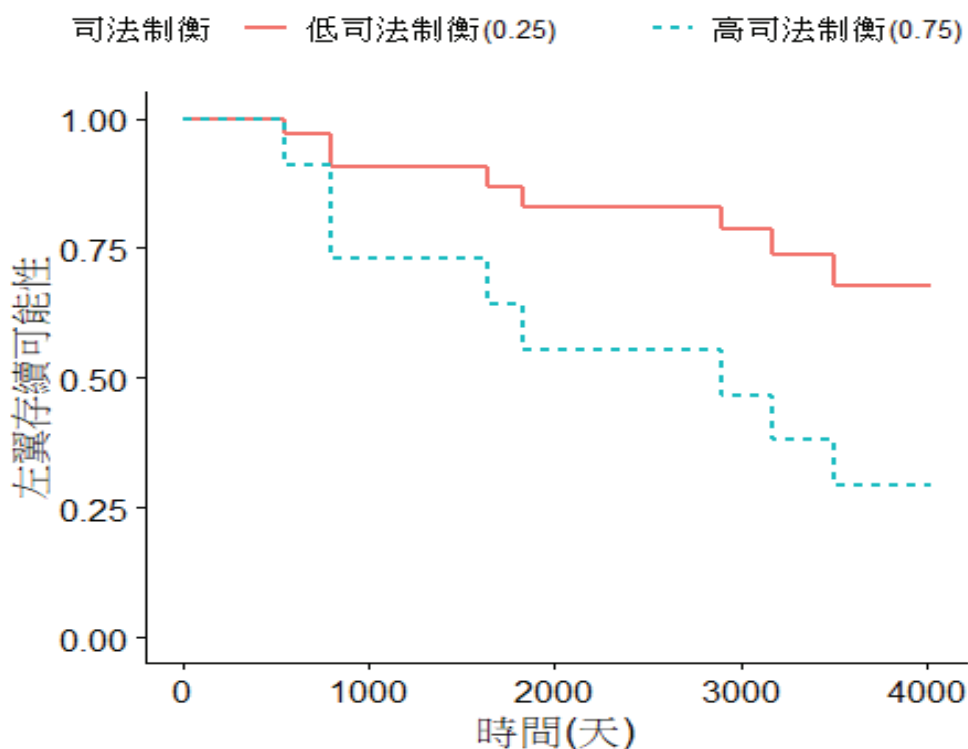


四、 實證分析

Cox 比率危險模型的依變數是危險率，解讀上若與自變數間係數為正，表示每增加一單位自變數相對危險率就會增加；若係數為負，則每增加一單位自變數相對危險率就會減少。本文自變數「司法制衡力量」與依變數「左翼失去政權的危險率」間的係數為 2.3136，即司法制衡力量愈高的國家，左翼失去政權的可能性愈高。

下圖表 3-7 呈現的結果中，在 V-Dem 資料庫的司法制衡力量是 0 到 1 之間的數值，故本文以 0.25 及 0.75 兩個數值將低司法制衡與高司法制衡分組，虛線代表高司法制衡組別，實線代表低司法制衡組別。可以發現兩條線的變化幅度有明顯差異，高司法制衡組別的左翼存續可能性較低，換言之，在高司法制衡國家左翼失去政權的可能性較大。

根據本文的論點，當司法制衡能力增強，司法機構對政府的不法行為揭露並起訴，導致貪腐相對於經濟而言成為人民較關注的議題。而貪腐感受會直接反映在對總統的支持度上(Quiroga, 2009: 245)，導致政權更迭。



圖表 3-7 Cox 比率危險模型

第三節 案例討論



以總體資料驗證本文理論假設之後，經由個案討論的方式檢驗各國的發展是否符合理論預期，也就是左翼政府執政下是否具有委任式民主領導人的特徵？右轉國家的司法部門是否因制衡能力提升而對左翼領導人起訴，使得貪腐在選舉中成為重要議題？研究發現未右轉五國中，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維亞、厄瓜多的左翼都有委任式民主的特徵，但烏拉圭自 Tabaré Vázquez 第二任期開始司法制衡力量已有提升，對左翼前總統 Raúl Sendic 的貪腐案仍在審理中，惟該國選民認為國家主要問題仍以經濟為主，而非貪腐。

右轉國家在左翼執政時期亦有委任式民主領導人特徵，而司法改革過程中各國的推力不完全相同，諸如公民團體的倡議、司法部門內部改革、獨立機構的成立、與國際組織的合作等。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使得貪腐弊案被揭發。必須注意的是右轉國家水平課責力量的提升反而侵蝕垂直課責，弱政黨體制讓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連結降低，形成失根民主。

新右翼的領導人往往非耳熟能詳的政治人物，以局外人的身分誓言對既有的貪腐政治階級進行改革。在經濟政策方面新右翼亦與新自由主義時期不同，並沒有大幅刪減社會福利支出的預算。

壹、左翼政府

一、委內瑞拉

(一) 左翼委任式民主與水平課責弱化

1998年勝選的左翼領導人Huga Chávez在一開始的執政並非順遂，在2002年甚至遭遇政變，其個人聲望的高漲是隨石油價格攀升而起，惟石油收益並沒有用在國家未來發展上。一直到Nicolás Maduro繼任，這個石油大國仍然面臨基本物資短缺以及主權債務違約(sovereign default)的影響(Lansberg-Rodríguez, 2016: 60)。Chávez到Maduro之間的轉移也可以看到民主形式與規範逐漸被遺棄，儘管Maduro

透過選舉取得執政權，但對水平機構的掌控卻愈加緊收，控制異議分子不滿的聲音，具體作法包含購買以及關閉媒體，並且將遊行抗議視為犯罪(Noriega & Puerta, 2015: 195-196)。



(二) 反對勢力的興起與限制

國家生活水平下降促使反對黨勢力崛起，2015年議會選舉反對黨大勝。但政府控制反對力量的發展，並透過最高法院宣布立法違憲，同時以總統命令非法通過法律，透過對法院和選舉的控制持續執政(Lansberg-Rodríguez, 2016: 61)。在委內瑞拉的個案中我們看到水平課責的力量仍然被行政權削弱並把持。

二、 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左翼總統 Daniel Ortega 和他的兩個兄弟在過去身負對抗獨裁政權蘇慕薩家族(Familia Somoza)⁴⁹大任，其領導的政黨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FSLN)在 2006 年、2011 年及 2016 年選舉中取得勝利(Colburn, 2019: 167)。但 Ortega 在 2006 年勝選後並沒有採取激進改革，反而與地方商界和解，向外國投資者獻殷勤，並且避免與美國起衝突。而給予窮人的基本生活物資成為 Daniel Ortega 的個人賞賜，導致恩庇侍從主義的氾濫(Colburn, 2019: 168-169)。Ortega 將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SLN)視為個人政黨緊握在手中，讓許多長期成員開始離開。而 Ortega 對於政府的控制力使其突破憲法的任期限制，繼續參與選舉進而連任，並在 2016 年選舉時限制當時最多人支持的反對黨候選人參加選舉，儘管抗議與杯葛的聲浪不斷，選舉仍然繼續，最後 Ortega 在 2016 年選舉以 72%得票率勝選，對手只有 15%的票(Colburn, 2019: 169)。

⁴⁹ 蘇慕薩家族(los Somoza)是尼加拉瓜 1936 年至 1979 年間的獨裁政權，執政時間長達 43 年。由 Anastasio Somoza García 於 1936 年政變推翻當時的總統 Juan Bautista Sacasa 開始，至 Luis Somoza(1957-1963)時由於農業與勞工改革承諾沒有實踐，致使 1960 年代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城市游擊隊興起，並於 1970 年代得到農村運動的支持，於 1979 年 7 月 20 日推翻蘇慕薩家族的統治(Blanco, 2018: 238-244)。



三、 玻利維亞

(一) 左翼與委任式民主

自 2014 年經濟成長減緩以來，總統 Evo Morales 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黨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MAS) 支持度開始衰退，人民抱怨政治權力過於集中在執政者手中，且執政者對反對黨及媒體具有敵意 (Anria, 2016: 99)。回顧社會主義運動黨的發展背景，高度的貧窮以及收入不均，加上公民權利的不平等，讓該黨以「好的生活」 (Vivir Bien) 以及帕查瑪瑪 (Pachamama)⁵⁰ 兩個核心概念贏得選舉。

自 1990 年代中期社會運動黨以運動 (movement) 為基礎從鄉村發跡，快速發展到各個城市，在鄉村、城市以及不同族群如印地安族群、農民及城市公會等取得廣大支持 (Anria, 2016: 102-103; Kaijser, 2014: 79)。其具有高度個人魅力的領導人 Evo Morales 也在 2005 年、2009 年及 2014 年以絕對多數贏得選舉。儘管 2009 年 1 月 25 日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第 168 條規定總統任期五年且僅能連選連任一次，惟同年九月 Morales 當選總統是其第二次連任，2014 年第三次連任，可以看到 Evo Morales 對於憲法任期限限制規定的不尊重 (Kaijser, 2014: 67-68)。

此外自 2006 年 Morales 上任開始，公民的抱怨主要聚焦在機構缺乏效率、自由權沒有被保障、法院政治化等。這些抱怨都與委任式民主所產生的問題相關，包含總統宣稱代表人民利益，集中行政權力並缺少水平課責，而僅存的垂直課責於選舉結束後也顯得不足 (Anria, 2016: 105-107)。委任式民主下的公民被動且不具政治積極性，並有社會組織衰退的現象。從這個理論看左翼總統 Morales，支配性的個人化總統、疲弱的水平課責，以及 2016 年試圖以公投推翻憲法任期限限制的舉動，都符合委任式民主的觀點 (Anria, 2016: 100)。

雖然 2016 年試圖以公投推翻憲法任期限限制讓總統能無限期連任，但結果以失敗告終，而 Morales 仍不放棄 2019 年參加選舉的機會，他表示：「我不想，也不能

⁵⁰ 帕查瑪瑪 (Pachamama) 是安地斯神話主管種植、收穫及生育的女神，但有製造地震、代表毀滅的形象。現今帕查瑪瑪是大地之母的化身，這個母親脆弱且被人類活動威脅，需要受到保護。因此被社會運動黨用來批評西方對於環境的傷害，西方國家須對氣候變遷負責 (Kaijser, 2014: 127)。

讓我的人民失望。」並認為 2016 年公投結果「由拒絕票勝出，但 51%比 49%的結果十分相近，我們只輸了 140,000 票，這不是什麼。」⁵¹



(二) 左翼所面對的挑戰

在 2019 年選舉中 Morales 雖然在第一輪取得優勢，但根據憲法 167 規定若未達絕對多數而要進入第二輪選舉。然而經重新計票後於投票日隔天宣布以於第一輪取得絕對多數，不須舉行第二輪選舉，此舉遭到受質疑以及對於選舉舞弊的抗議，使 Morales 於同年 11 月 10 日辭去總統職務⁵²，改由右翼的 Jeanine Áñez Chávez⁵³ 代理總統，Jeanine Áñez 則改變玻利維亞的外交政策，宣布加入針對委內瑞拉危機設立的利馬集團(Grupo de Lima)⁵⁴。不論如何，當一個國家過度腐敗時，其政權就可能受到威脅，如遭到他國介入、發生內戰、或國內動亂與政變威脅(Rose-Ackerman & Palifka, 2016: 476)。

四、 厄瓜多

厄瓜多的委任式民主近年來有退回到威權路線的趨勢。厄瓜多是拉美地區民主化的先驅，1979 年 4 月開始由文人統治，但其民主化受到許多政治、經濟危機的挑戰。2006 年左翼的 Correa 當選總統，主因選民厭倦厄瓜多遭遇的危機，希望投給一個有個人魅力且會帶來改變的總統。Correa 誓言結束政黨衝突，以公民革命的左翼政策消除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危機並冀求結束貧困(Conaghan, 2016: 109-110)。

Correa 並沒有打算建立典型的自由或代表性民主，其當選承諾是激進改革制度、擴張社會參與、發展國家領導的經濟政策並反對資產階級國家。2007 年上任後以

⁵¹ Daniel Pardo. 2017. “‘No quiero, pero no puedo decepcionar a mi pueblo’: Evo Morales habla sobre su tercera reelección en Bolivia y la intención de quedarse en el poder hasta 2025.”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2273980>. Latest update 12 November 2019.

⁵² BBC Mundo. 2019. “Evo Morales renuncia a la presidencia de Bolivia y denuncia un golpe de Estado.”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50370125>. Latest update 12 November 2019.

⁵³ Collins, D. 2019. "Bolivia president's initial indigenous-free cabinet heightens polarizatio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nov/14/bolivia-president-jeanine-anez-cabinet-indigenous>. Latest update 19 November 2019.

⁵⁴ BBC Mundo. 2019 “Crisis en Venezuela: qué busca Bolivia con su ingreso al Grupo de Lima, la alianza regional contra el gobierno de Nicolás Maduro.”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50888957>. Latest update 23 December 2019.

公投方式取得超過 87%的支持度，在 2008 年通過新憲法(Conaghan, 2016: 111)。惟 Correa 建立的制度缺少水平課責，並且以法律限制垂直課責。

新憲法將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僅保留 1998 年憲法中總統的公投提案權、覆議權，而取消過去對總統的連任限制，並給予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利；在司法方面替換眾多法官，司法自治受到嚴重干預；而在立法方面設立新的政府部門，並賦權使其能選擇重要政府職位，如檢察總長(Attorney-General)、審計部長(Comptroller-General)等，立法權在主權祖國聯盟運動黨(Alianza País, AP)控制下僅是橡皮圖章。而該憲法保障的言論與結社自由及人民複決權被政府管制而無法實踐(Conaghan, 2016: 112)。

2013 年 Correa 進一步刪除憲法保障的基本公民自由，並抑制公民的參政權，同年通過的通訊法使私人媒體受國家控制，總統控制政治溝通媒介，Correa 並於每週六早上製作廣播節目炫耀其成就或譴責對手。另外，2015 年的憲法修正案甚至允許所有公職不定期選舉。愛厄瓜多在自由之家 2008 年至 2015 年間的公民自由指數呈現下降趨勢(Conaghan, 2016: 113-116)。

五、 烏拉圭

(一) 左翼與委任式民主

2002 年到 2003 年的經濟危機不只影響阿根廷與巴西，也對烏拉圭產生衝擊⁵⁵，這個危機弱化傳統政黨科羅拉多黨(Partido Colorado, PC)的正當性，讓左翼廣泛陣線(Frente Amplio, FA)⁵⁶的 Tabaré Vázquez 能在 2004 年 10 月 31 日以 52%的絕對多數於總統選舉獲勝，並在 2009 年及 2014 年選舉勝選，取得國會多數席次(Bentancur & Busquets, 2019: 2; Caetano & Iber, 2019: 44; Oyhantçabal, 2019: 122-123; Piñeiro & Cardeillac, 2017: 367)。左翼政黨 FA 被視為「人民的政黨」，反

⁵⁵ 1998 年至 2002 年之間因經濟危機使烏拉圭 GDP 下降 15 個百分點，出口減少 33 個百分點；1998 年至 2004 年之間實質工資減少 22 個百分點。這場社經危機促使「廣泛陣線」(FA)的上台(Oyhantçabal, 2019: 128)。

⁵⁶ 廣泛陣線(Frente Amplio, FA)創立於 1971 年，由約 20 個左翼政黨和團體組成，與公民社會團體有特殊的連結，並有工人階級的支持，同時與工會運動有聯繫，靠廣大的群眾動員支持取得執政權，2004 年是第一次在總統選舉勝利，然而近年來該黨的動員能力逐漸減少(Bentancur & Busquets, 2019: 2; Caetano & Iber, 2019: 46; Oyhantçabal, 2019: 122; Piñeiro & Cardeillac, 2017:365)。

對傳統政黨科羅拉多黨(PC)以及民族黨(Partido Nacional, PN)，經大眾媒體傳播取得人民支持，如「國家日報」(El País)、「觀察者日報」(El Observador)及「尋找週報」(Búsqueda)(Oyhantçabal, 2019: 125)。Tabaré Vázquez 的第一任期具有委任式民主追求廣大人民參與的特徵(Bentancur & Busquets, 2019: 4)。Vázquez 作為 FA 的領導人，利用部長會議(Consejo de Ministros)與部門理事會(Consejos Sectoriales)貫徹其意志、賦予經濟部(Ministerio de Economía)優先地位，並讓總統秘書作為內閣首長(Lanzaro, 2016: 138-139)。

受益於國際原物料價格上升及外商直接投資增加，左翼 FA 執政時期伴隨穩定的經濟成長，讓實質工資提升，並有足夠的財源用於社會福利政策，使貧窮、失業率與貧富差距得以顯著下降，然而少數菁英仍握有大量財富(Caetano & Iber, 2019: 44-45; Oyhantçabal, 2019: 128; Piñeiro & Cardeillac, 2017: 365)。

儘管近年因國際原物料價格降低、外國直接投資減少而經濟滯緩，造成眾多左翼浪潮中國家的右轉，由於適當的經濟管理讓烏拉圭維持 15 年不間斷的經濟成長，並使工人階級收入增加，維持廣泛陣線(FA)的左翼統治(Caetano & Iber, 2019: 45; Oyhantçabal, 2019: 125)。而政策上左翼的重要改革包含健康照顧體系、勞工⁵⁷、性別平等與社會保護⁵⁸等(Caetano & Iber, 2019: 45-47)。

但在經濟相關法規上廣泛陣線(FA)沒有改變新自由主義時期的規定，反而沿用相關規定以助於資本累積，並且在 Tabaré Vázquez 及 José Mujica 執政時期通過吸引地方與國際私人投資的法案(Oyhantçabal, 2019: 129)。農業政策上廣泛陣線(FA)也沒有進行重分配改革，反而依循新自由主義信條，將農產工業(agro-industrial)部門去國有化(denationalization)，造成土地集中與家庭農場的減少，使經濟結構依賴農產品與原物料出口(Oyhantçabal, 2019: 129-130; Piñeiro & Cardeillac, 2017: 364)。Piñeiro & Cardeillac (2017)為此提出三種解釋途徑，第一是廣泛陣線(FA)為了吸引中間選民的選票，放棄左翼反帝國主義、反寡頭及親農業改革的政策。第二是農

⁵⁷ 薪酬委員會(Consejo de Salarios)在 1943 年設立，但 1992 年右翼的民族黨(PN)將其取消，直到左翼廣泛陣線(FA)執政時才重新設立，保障勞工薪資。並在 2009 年通過集體談判法(Leyes de Negociación Colectiva)保障受雇者權利(Bentancur & Busquets 2019: 6)。

⁵⁸ 譬如 2005 年設立社會發展部(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社會緊急國家關注計畫(Social Emergency National Attention Plan)與公民收入計畫(Citizen Income Programe)，聚焦於工人階級的社會保護，致力於減少貧窮、提升健康照顧(Oyhantçabal, 2019: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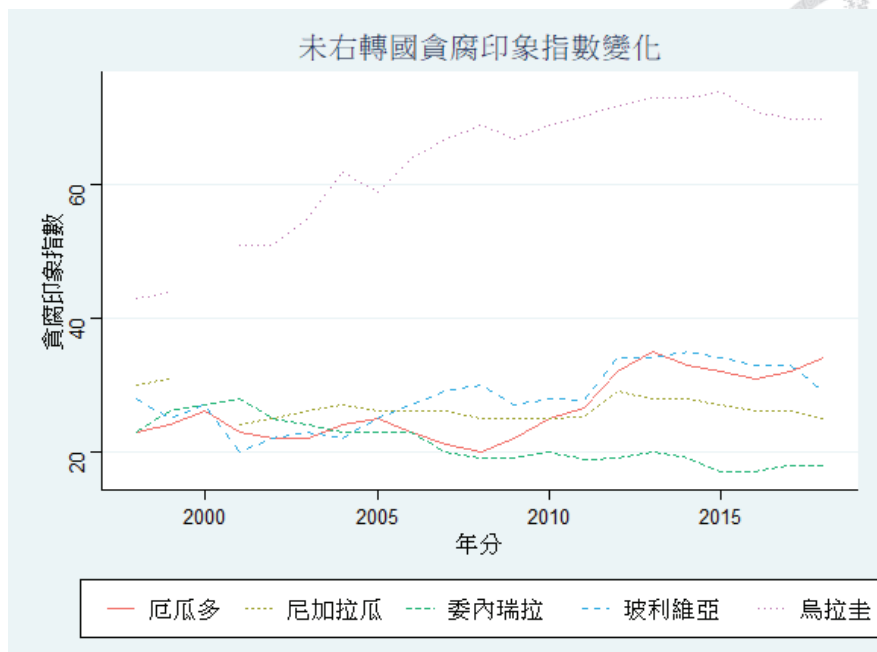
業改革政策只有在農業結構不變，且農業出口利潤能支持改革時，才會進行改革。第三則是認為廣泛陣線(FA)聯盟組成內部的競爭，導致其沒有在農業上採重分配政策(Piñeiro & Cardeillac, 2017 : 365-366)。

(二) 左翼所面對的挑戰

雖然 Bentancur & Busquets (2019)認為烏拉圭屬於自由民主並具較高的權力制衡機制⁵⁹，但如同右翼走向失根民主，可以觀察到的是烏拉圭水平制衡提高卻缺少垂直制衡。Tabaré Vázquez 在接續 José Mujica 的第二任總統任期開始，被批評與人民的距離漸遠，且在 2019 年的民調顯示，右翼保守勢力民族黨(PN)的支持度已經逐漸追上廣泛陣線(FA)，再加上左翼的前副總統 Raúl Sendic 於 2017 年的貪腐案仍在法院審理中(Caetano & Iber, 2019: 47)。這些跡象都與高司法制衡的右轉國家類似。右翼的力量在烏拉圭亦有所成長，如 2016 年烏拉圭商會聯合會(Confederación de Cámaras Empresariales)以及人民黨(Partido de la Gente)的成立，並有智庫透過媒體宣傳減稅的理念(Oyhantçabal, 2019: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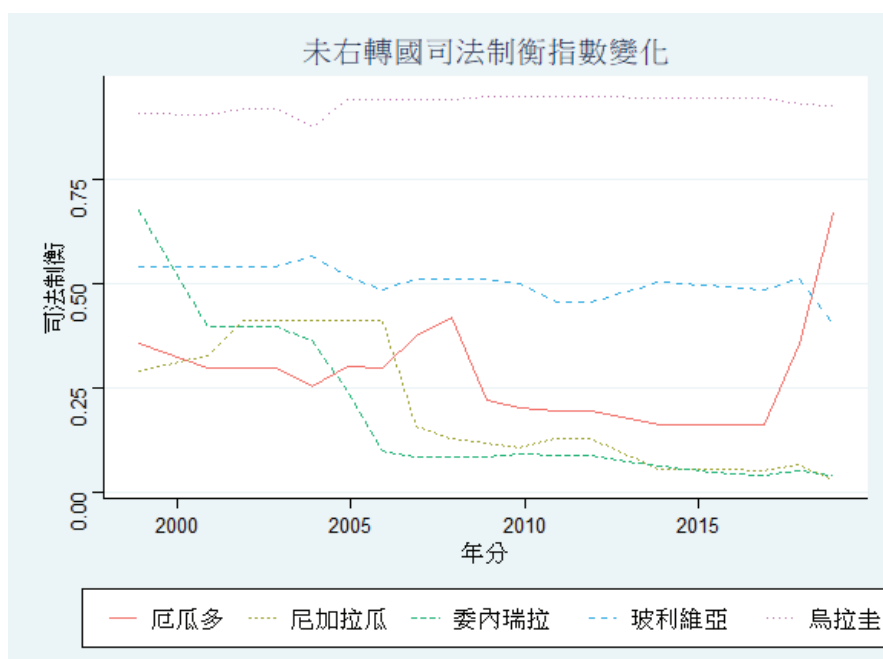
而如下圖表 3-8 與 3-9 所示，烏拉圭的貪腐印象指數與司法制衡在未右轉國家都居首位，是相對民主清廉的國家。但與右轉國不同的是根據 2018 年 LatinoBarameter 的數據，認為國家最重要的問題仍以經濟(10%)為主，且幾乎沒人(0%)認為貪腐是主要問題。雖然烏拉圭傳統上的低貪腐讓人民對國家機構信任程度高，而維持人民的信任需要很積極的反貪努力，否則左翼政黨的政權支持將會受到挑戰(Caetano & Iber, 2019: 47-48)。

⁵⁹ 譬如烏拉圭設有部門委員會(Juntas Departamentales)，其任務主軸為透明(transparencia)、參與(participación)與合作(colaboración)，致力於政府資訊透明、促進人民參與、教育人民對公共議題的了解、監督政策執行等，以提升民主品質(Britos et al., 2016: 3-4)。



圖表 3-8 未右轉國貪腐印象指數變化

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圖表 3-9 未右轉國司法制衡能力變化

資料來源：V-Dem



貳、右轉政府

一、 阿根廷

(一) 左翼的委任式民主特徵

左翼的 Néstor Kirchner (2003-2007) 得利於阿根廷新自由主義試驗的失敗、前總統 Eduardo Duhalde 的支持，加上阿根廷歷史及文化上的父權政治，公民習慣一個強人領導，使 Kirchner 得以領導其政黨勝利陣線(Frente para la Victoria)於 2003 年勝選。Kirchner 作為中下階級的代表，其政治改革計畫 Kirchnerista⁶⁰重新調整新自由主義時期機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Costa, 2018: 82-83)。

Kirchner 建立自己的正式與非正式網絡，提拔與自己最親近的人作為國家官員或新興企業家，使得國家收益落入私人所有，模糊公共與私人利益的界線，這些作為可以從西班牙雷普索爾石油公司(Repsol-YPF)的成員組成以及公共建設招標中得到證實。Kirchner 弱化水平制衡的方式則是控制大眾媒體並試圖讓其為自身政黨利益服務，進而導致民意極化，並於 2007 年干預國家統計調查局(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s y Censos, INDEC)的自主性(Costa, 2018: 84-86)。

在 2007 年由其妻子 Cristina Fernández (2007-2015) 接任總統職務後，行政與水平制衡機構的關係更為緊張，政府限制這些制衡機構，如干預審計以及檢調機構。此外 Cristina Fernández 與 2011 年選舉中以 54.11% 的絕對多數勝選，其政黨在國會也拿下 52.56% 的席次，國會作為監督及控制行政的角色喪失，並以此頒布法律修改國家治安法官委員會⁶¹以及司法部門的成員組成，讓其成員能直接透過人民選出，著重民主的人民主權而非憲法合法性(Costa, 2018: 87-89)。

⁶⁰ Néstor Kirchner 的 Kirchnerista 主要在改革過去 Carlos Menem 採行新自由主義的 Menemista 政策(Costa, 2018: 83)。

⁶¹ 國家治安法官委員會(Consejo de la Magistratura)是 1994 年憲法修正案中以法官提名透明化為目的而設立的機構，其第 144 條規定委員會主要成員由法官(magistrado)及司法行政人員(La administración del Poder Judicial)評選。Consejo de la Magistratura. <http://www.cmagistratura.gba.gov.ar/>. Last update 16 November 2019.



(二) 水平制衡的興起與右轉

水平制衡力量的興起可以從三個面向觀察。首先是公民團體對司法獨立與民主化的倡議，合法正義(*Justicia Legítima*)以推行阿根廷司法部門民主化為目標，主要任務包含司法獨立、司法透明以及檢調部門自治，並與其他公民團體合作達成這些目標⁶²。接著是最高法院對於司法獨立的確保，譬如最高法院要求國會修改國家治安法官委員會成員組成，宣布該委員會成員全部民選的法律違憲。最後是國會制衡的部分，可以發現Kirchnerismo的力量在2013年國會選舉所獲席次不再具有絕對多數(Costa, 2018: 89-93)。反對黨力量在民主國家中有助於政治競爭，降低貪腐，因為資訊自由讓反對黨能監督政府，且只要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存在，利於貪腐或偏好特定團體的法案與規定就可能在下次選舉中被改變，這會讓尋租者降低花錢取得開關貪腐渠道的動機(Montinola & Jackman, 2002: 150-151)。

在經濟上 Cristina Fernández 執政時期經濟並未好轉，而國家保護主義、貨幣管控使阿根廷與國際市場脫節。2015年新右翼的政治新秀 Mauricio Macri 以超脫傳統左右翼政黨為號召勝選，降低政府支出並讓通貨貶值，採行鼓勵投資的政策(Lansberg-Rodríguez, 2016: 62-63)。

(三) 為什麼阿根廷又回到左翼？

但阿根廷左翼 Alberto Fernández 與遭到貪汙起訴的 Cristina Fernández 在 2019 年 10 月 27 日總統選舉中再度勝利，可以用巴西的話來形容「雖然他偷竊，但他能把事情做好」(ele rouba mas faz)(Weyland, 1998: 119)，或用巴拿馬的話來說「為當下而活」(*Juega Vivo*)⁶³，不追求更高的價值，只選擇對自己最好的決定。這種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認為儘管手段違反規則，但結果會正當化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Pérez, 2017: 537)。反對黨是否能以貪腐作為選舉動員的力量取決於兩點：該黨長期支持者是否相信政治系統是腐敗的；不論選民政黨傾向為何，該政黨是否有能力吸引對於政治貪腐不滿的選民。後者會受到政黨體系的影響，若意識形態差異愈大，反對黨愈認為現任者貪腐。而若選民認為反對黨勝選

⁶² Justicia Legítima. <http://justicialegitima.org/mision.html>. Latest update 16 November 2019.

⁶³ Ducreux, E. 2019. "Juega Vivo: Panameño bobo." *La Juventud Opina*. <http://www.archive.voice-sofyouth.org/es/posts/juega-vivo--2>. Latest update 12 December 2019.

機會不大，他們會選擇以非選舉的方式對抗貪腐，譬如經由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以及利益團體。此時選民傾向不投給現任者的原因係對於貪腐的感受，而非對於反對黨的支持(Davis et al., 2004: 678-700)。換言之倘選民認為右翼政黨勝選機會不大，感到左翼領導人貪腐的選民可能選擇不投票，而非投給右翼政黨。這會讓拋出貪腐議題的右翼政黨也得不到選票，是以阿根廷左翼政黨能再以經濟為口號重新取得執政權。

二、 薩爾瓦多

薩爾瓦多的左翼力量在 2009 年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黨(Frente Farabundo Martí para la Liberación Nacional, FMLN)的 Mauricio Funes 當選後開始，結束國家共和聯盟黨(Alianza Republicana Nacionalista, ARENA)長達二十年的統治⁶⁴，是 1821 年自西班牙獨立以來第一次的政權和平轉移。Mauricio Funes 在其任內並沒有實質政策作為，反倒是享受奢華的生活並收集名錶⁶⁵，在離任之後被指控貪腐，逃到尼加拉瓜由 Ortega 保護其不受引渡⁶⁶。2014 年 Funes 的副總統 Salvador Sánchez Cerén 取得執政權，效法巴西的 Lula 擴張社會政策，並提高稅額來支付社會政策，政府仍舊面對財政赤字，也造成蕭條經濟(slugish economy) (Colburn, 2019: 170-171)。

Funes 的貪腐以及 Sánchez 領導下蕭條的經濟，使 FMLN 在 2018 年的國會及地方選舉表現黯淡。而在 2019 年 2 月 3 日中右翼的 Nayib Bukele 以非傳統兩大黨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MLN)及國家共和聯盟(ARENA)的第三勢力，領導民族團結大聯盟(Gran Alianza por la Unidad Nacional, GANA)在總統選舉中勝利(Colburn, 2019: 171)。

薩爾瓦多貪腐問題嚴重，右翼政府 Francisco Flores (1999-2004)、Elías Antonio Saca (2004-2009)以及左翼的 Mauricio Funes (2009-2014)都因貪腐而被起訴，以第

⁶⁴ 1979 年 10 月 15 日是薩爾瓦多歷史上最後一次政變，自此到 1992 年是薩爾瓦多內戰時期，1992 年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黨依據戰後的查普爾特佩克和平協定(Chapultepec Peace Accords)成為合法政黨，一直到 2009 年 FMLN 才取得執政權，結束 ARENA 長達 20 年的統治(Colburn, 2019: 170)。

⁶⁵ “La lujosa colección de relojes de Mauricio Funes,” *Diariol. Com*, 2 May 2017, <http://diariol.com/politica/2017/05/la-lujosa-coleccion-de-relojes-de-mauricio-funes>. Latest update 17 November 2019.

⁶⁶ “Former El Salvador President Granted Asylum in Nicaragua, Government Says.” *Guardian*, 6 September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sep/06/mauricio-funes-el-salvador-president-nicaragua-asylum>. Latest update 17 November 2019.

三勢力崛起年輕的 Nayib Bukele 在政策上親美，並致力於打擊貪腐，仿照聯合國與瓜地馬拉創立的瓜地馬拉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Comisión Internacional contra la Impunidad en Guatemala, CICIG)⁶⁷，與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簽署協定創立薩爾瓦多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Comisión Internacional Contra la Impunidad de El Salvador, CICIÉS)。⁶⁸

三、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在中美洲有最多的人口，同時也是種族最分歧、有最多原住民人口的國家。在過去左翼一直受到壓抑，直到 2007 年左翼政黨全國希望團結(Unidad Nacional de la Esperanza, UNE)的 Álvaro Colom 在總統選舉中取得勝利，成為 1954 年以來瓜地馬拉第一個左翼總統。Colom 與西部高地的原住民有很強的連結，並提高對窮人的幫助。但貪腐的議題日趨嚴重，致使人民對左翼的信賴降低，在 2011 年及 2015 年皆重回右翼執政，而在 2018 年二月時左翼前總統 Álvaro Colom 亦因貪腐而被逮捕(Colburn, 2019: 171-172)。

四、 巴西

(一) 左翼的委任式民主特徵

行政部門的權力集中在巴西歷史上相當常見，自 1822 年從葡萄牙獨立至 2018 年之間，有長達 67 年的君主制、34 年的軍人獨裁與 Vargas 的統治，在共和國下的民主選舉僅有 95 年(de Moura, 2019: 351)。左翼的 Lula da Silva 將權力集中於總統與其部會首長手中，對 Cardoso 政權時期設立的監管機關做出改變，並使用與聯邦預算有關的總統特權(presidential prerogative)對這些機構的決定施加壓力，最終這些原先依其創設章程(stature)行使職權的機關，改由與總統相關的部會與秘書處管理(de Moura, 2019: 366-369)。

⁶⁷ 瓜地馬拉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CICIG)是右翼的 Álvaro Colom 在 2007 年由聯合國與瓜地馬拉共同建立的組織，旨在強化與協助瓜地馬拉對於不法行為的調查與起訴。CICIG. <https://www.cicig.org/>. Latest update 6 January 2020.

⁶⁸ “Cicies en El Salvador: el gobierno crea una comisión contra la corrupción en colaboración con la OEA”, BBC News Mundo,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9617141>. Latest update 17 November 2019.

從左翼的 Lula da Silva 到 Rousseff，巴西形成以總統為政治系統中心的政治文化，獨立的專業機關角色受到弱化，總統政策是為了短期迎合選民，提高政治資本，長期而言會損及國家利益(de Moura, 2019: 376)。



(二) 巴西右轉

1. 貪腐議題與司法制衡力量提升

1992年 Collor de Mello 辭職⁶⁹後，巴西民主進展快速，水平課責機構逐漸鞏固，而 Lula da Silva 認為司法機構長期處在一個黑盒子狀態，造成嚴重貪腐問題，爰經修憲成立國家司法委員會(Conselho Nacional de Justiça)⁷⁰，作為監督司法機構的角色而不介入司法權的實施(de Moura, 2019: 365-366)。Dilma Rousseff 任內則於 2013 年通過反貪腐法案(Anti-Corruption Law)與犯罪組織法(Criminal Operations Law)，對司法制衡的提升獲益匪淺(Michener & Pereira, 2016: 496-497)。Rousseff 任內為避免各部會的尋租行為，通過新的資訊自由法，架設網站提供即時且透明的政府預算，在網路上公開政府資訊，並通過無前科法(Ficha Limpa)限制有犯罪紀錄的公民競選公職的權利(Michener & Pereira, 2016: 499-500)。左翼的執政使巴西在減少貧窮、擴張福利及社會安全網上有相當大的進展，選舉揮發性的降低使政黨體走向穩固的兩黨輪流執政(Hagopian, 2016: 119)。

巴西民主水平機構的強化可見於 Mensalão 貪腐案與 Petrolão 貪腐案。2005年 Mensalão 貪腐案⁷¹被聯邦議會揭發，而 Mensalão 案是針對 Lula da Silva 政府，因此有人認為這是右翼反對黨的陰謀，惟從司法體系觀之，巴西法務部長及檢察總長是總統提名，且當時近五分之四的最高法院法官是由 Lula 領導的勞工黨指派，可以見到司法機構的獨立性⁷²，對勞工黨立委的貪腐案起訴 (Michener & Pereira, 2016: 491-492)。Petrolão 貪腐案是 2014 年巴西石油公司醜聞被暴露，洗錢醜聞席捲巴西

⁶⁹ Collor 總統因貪腐受到國會彈劾，但在彈劾案結果出來前就主動請辭(de Moura, 2019: 361)。

⁷⁰ 由九位法官、兩位檢察官、兩位律師及兩名熟諳法律知識的公民組成(de Moura, 2019: 365)。

⁷¹ Mensalão 指每個月，這裡指每月的巨額補貼金(big monthly allowances)，是 Lula 執政時期勞工黨以資金換取國會支持的貪腐案件，有多達 28 名政治人物被宣判有罪(de Moura, 2019: 371; Michener & Pereira, 2016: 478)。

⁷² 尤其巴西法官的職涯升遷管道是司法內部自行遴選的層級結構，有助於保護司法獨立不受政黨意識形態干預(Michener & Pereira, 2016: 492)。

最大的石油企業(Parastatal oil giant Petrobras)和一些大型建設公司，而Rousseff的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被認為經由鑽井合約(rig contracts)項目，從國家財富收入的主要來源竊取國家數十億美元。儘管Rousseff本人並沒有與貪腐案有直接關聯，但是被認為技術上違反財政責任法，於2016年遭參議院彈劾，並且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公民同意此次彈劾(Hagopian, 2016: 119-120; Lansberg-Rodríguez, 2016: 61; de Moura, 2019: 374-375)。

為什麼強的司法課責會使貪腐醜聞變得更顯著呢？巴西在1994年的雷亞爾計畫(plano real)⁷³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開始改革⁷⁴，2002年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領導的左翼勞工黨執政受益於國家經濟蓬勃發展，其福利政策讓貧富不均減少，中學、醫療體系及退休津貼開始普及。在普遍受益下，窮困選民不需要倚賴接受買票維繫生活，使侍從需求降低，政黨的公信力(credibility)從侍從轉為治理，其民主包容性及政治參與較過去更高(Hagopian, 2016: 120-124)。Michener & Pereira (2016)指出巴西的司法機構更願意且更有能力調查並起訴貪腐行為，且能對總統權力的實施產生限制，在法治上有所進步(Michener & Pereira, 2016: 478-479)。因此貪腐案件在巴西成為選舉重要議題是司法機構力量的展現，代表司法獨立的強化以及更自由的媒體環境(Melo, 2016: 50)。

2. 左翼執政下經濟衰退

由於國際原物料價格下降的影響巴西面臨嚴重經濟的衰退，讓Rousseff提高公共支出的經濟政策無法實現(Melo, 2016: 50)，為了在2014年選舉中獲得勝利，Rousseff選擇以創造性會計(creative accounting)的方式隱藏高額國家債務，也就是以國有銀行而非國家財政資源來維持其補助政策，此舉明顯違反財政責任法(Fiscal Responsibility Law) (de Moura, 2019: 375-376)。經濟衰退與聯邦檢察官揭露國有企業參與貪腐醜聞的行為，使副總統Michel Temer於2016年以非常規預算實踐

⁷³ Collor 離職後，副總統 Itamar Franco 繼任，任命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為財政部長，匯集經濟專家建議提出雷亞爾計畫，除了貨幣貶值與發行新貨幣外，Cardoso 的經濟團隊認為行政部門的公共支出缺乏適當的管制，是以雷亞爾計畫主要是刪減並限制國家支出，降低通膨壓力的根源(de Moura, 2019: 362)。

⁷⁴ 1994 年選舉中 Cardoso 獲選成為總統，其任內經濟政策三大支柱為浮動匯率、央行的通膨目標及政府的財政目標(de Moura, 2019: 363)。

(unorthodox budget practice)為理由對左翼總統 Rousseff 提出彈劾(de Moura, 2019: 37-378)。



3. 右翼 Jair Bolsonaro 以反貪腐承諾崛起

2018 年 10 月 28 日右翼的 Bolsonaro 跳脫傳統左右翼政黨，以政治局外人(outsider)的身分踏入政治舞台，且在其上任後任命的 22 位部長中，只有六位有政黨背景(de Moura, 2019: 386)。過去軍人身分⁷⁵的他代表保守勢力，以法治與秩序為訴求，主張採取強硬反貪腐政策，讓巴西脫離勞工黨貪腐政治階級的統治，並且讓公共政策為國家服務，讓政治協商不再淪為政客爭奪公共職位與資源的工具(de Moura, 2019: 379-381)。並任命主導調查 Lava Jato 洗錢案及 Lula da Silva 罪責的聯邦法官 Sérgio Moro 為法務部長，研擬新的反貪腐政策(de Moura, 2019: 386-387)。

(三) 失根民主—高水平課責與低垂直課責

巴西的左翼領導人有委任式民主的色彩，至 Rousseff 任內拋棄 Cardoso 的三大經濟政策支柱，改採新宏觀經濟矩陣政策(New Macroeconomic Matrix)，強迫降低利率、直接介入匯率與物價、增加公共支出、公債與稅收補貼(de Moura, 2019: 372)。

隨著經濟穩定、社會服務與媒體近用擴張、收入上升與貧窮人口減少，公民對待從主義的依賴降低而對政府要求更提高，進而對貪腐的忍受度降低。其結果是水平課責機構增強對於垂直課責能力的侵蝕，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司法機構拋出貪腐議題，讓貪腐議題在選舉時成為 Donald Stokes (1963)提出的共識議題(valence issue)，進而對選民的投票抉擇產生影響(Hagopian, 2016: 125-127)。

值得注意的是勞工黨(PT)的自我政黨定位從 2013 年的 31%降到 2015 年的 12%，而這個選民—政黨的連結降低是因選民對政府執政表現的失望，連結降低並非代表選民對政黨失去信心，而是依據整個政府的表現來評斷。評斷標的變成是否能

⁷⁵ Bolsonaro 的軍人身分使他第二輪投票時被對手 Fernando Haddad 用作攻擊的目標，讓選民回憶起 1964 年至 1986 年間巴西的軍人統治，Haddad 批評 Bolsonaro 為會對民主造成威脅的法西斯分子。但實際上 Haddad 認為 1988 年憲法已在 2016 年彈劾 Rousseff 後與民意脫節，有草擬新憲法的必要，反之 Bolsonaro 認為巴西的改變應服膺於憲法規範下(de Moura, 2019: 383-384)。

維持經濟成長率、降低通膨等共識議題的指標，然而 Rousseff 政府面對經濟危機沒有做出適當的結構改變，使其支持度下降 (Hagopian, 2016: 125-127; Lansberg-Rodríguez, 2016: 60)。從巴西例子可見當水平課責增強但選民與政黨連結低時，貪腐議題針對的是選民對領導人的信心喪失而非對政黨支持的減退。

五、 智利

(一) 左翼的委任式民主特徵

智利自 1990 年開始由左翼政黨聯盟 Concertación 執政，直到 2010 年右翼的 Sebastián Piñera 上任才結束左翼領導。惟自 1990 年代以來，由於憲法設計的權力分配相當集中於總統，讓行政部門對立法部門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譬如總統能利用緊急情況 (urgencia)⁷⁶、預算倡議 (iniciativa presupuestaria) 等總統特權 (prerrogativas presidenciales) 的方式控制立法議程，並且透過與各政黨主席開會⁷⁷，來維持高法案通過率 (Toloza Castillo & Toro Maureira, 2017: 133-135)。

在 Ricardo Lagos (2000-2006) 與 Michelle Bachelet (2006-2010) 執政時期，左翼聯盟 Concertación 在國會都有過半席次 (Toloza Castillo & Toro Maureira, 2017: 136)。此外，以行政部門對眾議院常設委員會 (comisiones permanentes) 議程的影響力而言，左翼的 Michelle Bachelet 有很大的影響力，然而到了 2010 年右翼執政後，行政部門對眾議院常設委員會議程的控制力則明顯下降 (Toloza Castillo & Toro Maureira, 2017: 141)。

⁷⁶ 緊急情況 (urgencia) 是總統用來催促法案討論的特權，用以影響立法議程。有三種方式：簡單 (simple) 是指法案最多討論 30 日；總彙 (suma) 是指最多 15 日；立即 (inmediata) 則不可超過 6 日 (Toloza Castillo & Toro Maureira, 2017: 138)。

⁷⁷ 非正式名稱為「週一會議」 (reunión de los lunes)，行政部門會與各政黨開會，決定立法議程以維持高法案通過率。在此會議中不同黨派與地區的立法委員也會交換選區利益 (intercambio de beneficios distritales)，相互支持對方的法案 (Toloza Castillo & Toro Maureira, 2017: 134-135)。



(二) 智利的右轉－貪腐與水平制衡

1. 當貪腐成為重要議題

為什麼貪腐會成為重要議題？高度水平課責是最直接的答案。貪腐案是由獨立於民選總統的水平制衡機構發起（如審計、司法檢調單位）。健全的民主加上自由私人媒體環境對於貪腐案件的報導，降低人民對貪腐的忍受。人民希望菁英對錯誤的行為負責，故水平制衡機構增強。譬如 2014 年 Penta 商業集團被抓到勾結稅務官員非法將錢轉至右翼政黨獨立民主聯盟(Unión Demócrata Independiente, UDI)⁷⁸；在智利化學與採礦會(SQM)案件⁷⁹中採礦公司的逃漏稅與非法政治競選資助，不論右左翼的政治人物都受牽連。這些醜聞加強人民對於政治菁英利益勾結的貪腐印象。為回應民眾對貪腐的憤怒，Bachelet 設立一個排除政治人物的技術委員會來提供反貪腐政策意見。

許多民間組織要求易滋生貪腐的模糊政治過程要寫進新憲法的規範中，進而強化水平制衡的力量。惟 2016 年以來政治菁英與人民仍舊脫鉤，公民覺得代議士無法表達其意見，當得知政治人物的貪腐行徑後想要「將無賴踢出政治舞台」(throw the rascals out)，爰貪腐成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議題(Luna, 2016: 134-135)。

2. 水平制衡力量的崛起

為什麼智利有高度水平課責？2011 年智利開始面對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危機。傳統政治家幾乎把持所有選舉職位，但政治菁英對改革相當謹慎，認為開放智利的社會改革會增加衝突，擔心發生像 1973 年 Pinochet 暴力推翻 Allende 後所帶來近 20 年的軍事統治。是故智利較高水平課責的原因是智利

⁷⁸ 五門貪腐案(Pentagate)對右翼政黨 UDI 傷害很大，因為該醜聞與商業集團 Grupo Penta 的主要股東 Carlos Alberto Délano 和 Carlos Eugenio Lavín 有關，而這兩位都與右翼政黨有緊密聯繫。Pentagate 調查認為 Grupo Penta 有逃稅，以及對於獨立民主聯盟(UDI)的國會、總統候選人有非法資助的行為(Witte-Lebhar, 2015: 1)

⁷⁹ 智利化學與採礦會(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 SQM)是一家採礦公司，最主要的股東 Ponce Lerou 是軍事獨裁者 Augusto Pinochet 的前女婿。該項調查是由智利稅務機構(Servicio de Impuestos Internos, SII)所負責，認為該公司有逃稅與非法競選資金贊助的疑慮，且牽連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相當廣泛，在智利的貪腐議題反映的是系統性的弊端(Witte-Lebhar, 2015: 2-3)。

為了確保民主轉型後的穩定性，在 Pinochet 下台以後民主開始發展，經濟成長，民主的恢復帶來更好的水平制衡，更多元的社會融入(Luna, 2016: 130)。

左翼的爭取民主政黨協調(Concertación de Partidos por la Democracia)⁸⁰是重返民主後主要執政力量，改善智利社會安全網、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在左翼 Ricardo Lagos 和 Michelle Bachelet 領導下，1990 年至 2010 年間人類發展指數上升，被聯合國歸類為非常高人類發展的國家。貧窮減少、社會保護及教育近用擴張，經濟高度成長，並有高成就的自由民主，如政黨系統建制程度高及高品質的政策決策過程(Luna, 2016: 135)。

智利的民主發展在拉美地區特別的是其高度穩定的政黨體系，惟公民對政黨的認同程度並不高，2013 年至 2014 年 Adimark 民調顯示，尋求變革的社會菁英和保守的政治菁英之間有鴻溝；在 2006 年到 2014 年間 LAPOP 調查中，平均只有 12.5 智利民眾有政黨傾向。由此可見智利和巴西一樣有很強的水平制衡機構，但相應的是垂直課責能力的縮減(Luna, 2016: 129-130)。

(三) 失根民主－高水平課責與低垂直課責

為什麼智利的左翼會被右翼取代？在這樣正向的民主及社會發展背景下，左翼政府聯盟有兩大問題，第一是持續的社經不平等，第二是政黨認同以及年輕選民選舉投票率的降低。左翼聯盟政策的代價是社會去動員化及破壞垂直課責(Luna, 2016: 131)。

雖有高度水平制衡，但缺少合法性載具（如穩健的代表性政黨）來實施垂直課責。隨著投票參與率下降、政黨解組，政治菁英之間失去聯繫使政治去動員化成為一種威脅。政黨在公民社會去動員化(demobilize)並且在高度社經不平等前提下，很難發展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黨體系，導致政黨體系僵化，無法代表廣大的社會。

⁸⁰ 1997 年智利兩大聯盟形成，分別為中左翼的爭取民主政黨協調(Concertación de Partidos por la Democracia)以及右翼的智利團結(Unión por Chile)。而爭取民主政黨協調(Concertación)是由基督教民主黨(Partido Demócrata Cristiano, PDC)、智利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PSC)以及爭取民主黨(Partido por la Democracia, PPD)組成；智利團結(Unión por Chile)則由民族革新(Renovación Nacional, RN)以及獨立民主聯盟(Unión Democrática Independiente, UDI)所組成(Davis et al., 2004: 682)。

左翼流失原本的草根性，學生和原住民團體被遺棄或不組黨，菁英失去代表公民社會的媒介(Luna, 2016: 135)。

由於政治菁英無法回應社會需求，選民開始想要改變制度，以新的基本法取代1980年制定的憲法，並以制度外方式發聲。這讓左翼社會黨的 Bachelet 在 2013 年得以再度勝選。雖然在他領導下智利的強水平課責、高度領導人個人魅力、社經狀況的改善，暫時掩蓋垂直課責赤字的問題，但其左翼聯盟新多數派(Nueva Mayoría)缺乏對公民社會組織的連結，以及他兒子、兒媳婦的貪汙醜聞⁸¹導致他的下台(Luna, 2016: 133-134)。

六、 秘魯

(一) 委任式民主特徵

1. 課責力量的喪失—低垂直與水平課責

1990 年代右翼 Alberto Fujimori 執政結束秘魯 12 年的民主治理(Mauceri, 1995: 7)，Fujimori 統治時期採用如同競爭式威權的做法限制垂直和水平課責(Vergara & Watanabe, 2016: 148-149)。1992 年 4 月的自我政變(*autogolpe*)後停止議會運作，並建立新憲法改採一院制，使總統更好掌控國會，並以自己的親信替換立憲法庭法官。其舞弊的選舉減少垂直課責的力量；購買媒體讓媒體監督能力下降；在國防部分令軍隊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在選區畫分上採單一選區減少各省分的代表性；在公民社會面積極對抗光明路(*sendero luminoso*)的毛派游擊隊成員，並弱化公民社會；政策面實施激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並交由技術官僚制定政策。在自我政變那年國會傳統政黨仍占總席次的五分之四，但三年後一個席次都沒有(Mauceri, 1995: 7-8; Vergara & Watanabe, 2016: 149-150; Vergara & Watanabe, 2019: 30-31)。

在經濟上承續右翼新自由主義帶來秘魯的高經濟成長。Alejandro Toledo (2001-2006)在 2005 年任命 Pedro Pablo Kuczynski 為經濟部長，由於課責力量的缺

⁸¹ 2015 年 Bachelet 的兒子 Sebastián Dávalos 和兒媳婦 Natalia Compagnon 持有的 Caval 公司(Explotadora y de Gestión Caval Limitada)向智利銀行(Banco de Chile)貸款購買鄉村土地，之後重劃為都市區售出，獲取數百萬元的利潤。而 Bachelet 則否認參與此內線交易醜聞(Luna, 2016: 134; Witte-Lebhar, 2015: 1-2)。



乏，不受監督的技術官僚能在國家經濟穩定的政策擬訂上有較大的彈性(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0)。至 García Pérez (2006-2011)任內由於國際原物料價格提高，秘魯經濟穩定增長。在 2006 年至 2011 年間實質 GDP 成長 7 個百分點，且貧窮率從近 50%降低至 31% (Levitsky, 2011: 84)。

2. 左翼與委任式民主

2011 年 4 月 10 日秘魯總統大選第一輪選舉中最高票的兩人⁸²皆為反對自由民主的候選人，而建制派(pro-establishment)的候選人⁸³則無法進入第二輪選舉(Levitsky, 2011: 84-85)。最終左翼的 Ollanta Humala 在第一輪選舉以激進的民粹感染力⁸⁴，強調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取得勝利。而在第二輪則走向意識形態中央以吸引中間選民的支持(Levitsky, 2011: 90; McNulty, 2017: 575)。

低水平制衡是委任式民主的特徵，2011 年到 2016 年左翼 Humala 執政時期的國會超過百分之八十都是新任立法委員，且百分之七十三的立法委員先前都無立法經驗，高比例的新任立委讓國會沒有具經驗的資深立委進行體制改革(McNulty, 2017: 577-578)。

O'Donnell 認為委任式民主起源於經濟危機，但右翼執政時期經濟表現良好，為何會讓左翼 Humala 上台呢？Levitsky (2011)認為首先是 2011 年選舉中右翼的分裂，中右翼三位候選人 Castañeda、Toledo 以及 Pedro Pablo Kuczynski 彼此瓜分選票，而左翼只有 Humala 一位候選人，使其具有優勢(Levitsky, 2011: 86)。在議題上雖然 Keiko Fujimori 在父親終結高通膨、解決光明路的政績下得到菁英支持，但最終以民眾對於經濟不滿與反利馬菁英為競選議題的 Humala 在該年選舉勝出，這是因為儘管國家總體經濟表現良好，但國家力量太弱，並沒有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

⁸² 分別為左翼的前軍官 Ollanta Humala 以及前威權總統 Alberto Fujimori 的女兒 Keiko Fujimori。Humala 在 1990 年代擔任軍事指揮官被指控在秘魯中部 Huánuco 地區的 Madre Mía 有違反人權的行徑；Keiko Fujimori 因父親 Alberto Fujimori 被指控貪腐以及違反人權，許多選民視其為 Fujimorismo 的回歸，然其政治新秀的身分吸引許多反建制選民支持，亦有天主教會、對外貿易及採礦業商人的支持，認為其領導有助於經濟發展與安全提升(Levitsky, 2011: 85-86; McNulty, 2017: 564-565)。

⁸³ 前總統 Alejandro Toledo 以及首都利馬(Lima)的前市長 Luis Castañeda Lossio 被視為支持民主制度的候選人(Levitsky, 2011: 84-85)。

⁸⁴ 2006 年參選總統選舉時效法委內瑞拉的查維茲，以激進反體制的演說批判當時的總統 Toledo 是受傳統政客控制的獨裁者，並訴求自然資源及戰略工業的國有化，雖然 2011 年競選中相對較溫和，但仍不受利馬菁英與中產階級的支持(Levitsky, 2011: 85-86)。

改善人民生活品質，讓人民認為政治菁英無法代表人民，而選擇反建制、以重分配為訴求的 Humala (Levitsky, 2011: 87-89)。



(二) 秘魯的右翼回歸

1. 貪腐與水平制衡

秘魯 2016 年的選舉中，總統選舉第二輪的兩位候選人皆為右翼，而國會多數政黨亦支持新自由主義(McNulty, 2017: 575)。2016 年新自由主義的勝出⁸⁵象徵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回歸以及民主的穩固，讓右翼的「自動駕駛」(automatic pilot) 執政模式重新運作。相比於左翼 Humala 時期的不穩，右翼的 PPK 執政下的行政部門較為專業及穩定(McNulty, 2017: 576)。McNulty (2017)以資料分析認為秘魯在超過 15 年的自由與公平的競爭選舉後，民主已穩固地制度化⁸⁶，從低度民主品質過渡到中度民主品質⁸⁷，水平力量的提升讓貪腐醜聞在 2016 年選舉成為重要議題，但貪腐議題也造成民眾對立法及司法部門的不信任(McNulty, 2017: 564-565)。其中反貪腐以及民主是 PPK 所強調的競選承諾(Vergara & Watanabe, 2019: 36)，他認為秘魯應效法巴西與阿根廷，採行司法改革，以改善當前司法部門對於打擊貪腐的能力。⁸⁸司法部門對於巴西 Odebrecht 醜聞的處理將檢驗司法機構對於貪腐議題處理的能力，截至 2017 年初，已有超過一半的地方政府受到貪腐的調查(McNulty, 2017: 578-582)。

⁸⁵ 在經濟上 2016 年 12 月當川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時，右翼的 Pedro Pablo Kuczynski 予以指責，並認為要有新的協定，並且將中國納入其中；在政治上 PPK 是委內瑞拉左翼總統 Maduro 的堅定反對者(McNulty, 2017: 574-575)。

⁸⁶ 第二輪選舉中兩位候選人 Keiko Fujimori 與 Pedro Pablo Kuczynski (PPK)皆為右翼領導人。由於選民對於 Keiko 對民主、法治與透明原則的態度抱有疑慮，使 Mendoza 領導的左派轉而支持中間偏右的 PPK，選民選擇支持 PPK 這種缺少個人魅力、偏向技術官僚的執政風格，可以看到委任式民主在秘魯政治中的消退(McNulty, 2017: 566-567)。

⁸⁷ 從程序(procedure)、內容(content)與結果(result)三個面向建構民主品質，認為 2016 年的選舉過程中可見程序民主的制度化，內容面向上秘魯有很高的人民自由，惟結果面向上於 2016 年只有 53% 的秘魯人支持「民主是最好的制度」，人民對民主的支持略有下降，故歸類在中度民主品質(McNulty, 2017: 583-584)。

⁸⁸ Perú21. 2016. "PPK en clausura de CADE 2016: 'Tenemos un Poder Judicial con leyes anticuadas.'" <https://peru21.pe/politica/ppk-clausura-cade-2016-judicial-leyes-anticuadas-234903-noticia/>. Latest update 13 December 2019.

諷刺的是 PPK 亦因 Odebrecht 的貪腐事件而下台⁸⁹，2018 年右翼的 Martín Vizcarra 接續 PPK 的總統職務，由於巴西 Odebrecht 貪腐案牽連甚廣，Vizcarra 宣布將會舉行有關司法改革的公投，包含建立司法部門內部監管機制、行政訴訟程序修改、透明與資訊公開等六項倡議。⁹⁰

2. 左翼執政下經濟衰退

左翼重分配政策的資金來源仰賴原物料出口，經濟衰退使左翼失去採行重分配政策能力導致其下台是本文的假設三。而 Ollanta Humala (2011-2016)執政時期面對國際原物料價格衰退，使過去高國際原物料價格時靠採礦部門獲取大量資金的榮景不再，迄 2016 年以前連續四年經濟成長率低於四個百分點。這讓承諾經濟改革以刺激經濟發展的右翼 PPK 得以勝選(McNulty, 2017: 568)。此外 2004 年以降秘魯貧窮率持續下降，從 2004 年的 58.7%降至 2015 年的 21.8% (McNulty, 2017: 569-571)，亦符合本文認為「貧窮人口的減少使得以窮人為選票根源的左翼吸引力下降」的觀點。

(三) 失根民主—高水平制衡與弱政黨體系及公民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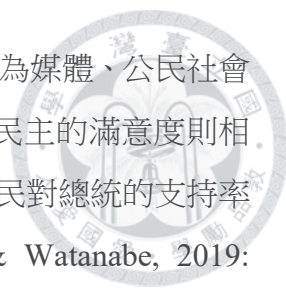
1. 水平制衡提升與公民不滿的衝突

後Fujimori時期水平課責開始恢復，國會、司法和其他機構都展現制衡總統的能力，水平課責提升，但被Fujimori破壞的垂直課責仍疲弱。在垂直課責上無法回復對政黨和公民社會的傷害，民主回應性低；在水平課責上代理總統Valentín Paniagua著重恢復公平選舉、法治、尊重憲法及乾淨政府⁹¹，使秘魯在自由之家評比從部分自由到自由。2001年Alejandro Toledo執政開始更讓民主機構回復，國會、

⁸⁹ BBC Mundo. 2018. “Perú: renuncia el presidente Pedro Pablo Kuczynski (PPK) entre acusaciones de corrupción y sobornos.”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3481060>. Latest update 13 December 2019.

⁹⁰ Deutsche Welle. 2018. “Perú: habrá referéndum para reformas política y judicial.” <https://www.dw.com/es/per%C3%BA-habr%C3%A1-refer%C3%A9ndum-para-reformas-pol%C3%ADtica-y-judicial/a-44865151>. Latest update 13 December 2019.

⁹¹ 秘魯領導人接受司法、國會、憲法法庭及美洲人權法庭(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的制衡，秘魯的民主成長得益於經濟繁榮、貧窮減少、社會健康照顧與教育的提升(Vergara & Watanabe, 2019: 27-29)。



司法恢復獨立性，Alberto Fujimori則被控訴貪腐及濫權。另外也為媒體、公民社會創造友善環境。雖然秘魯在各指標表現都相當優異，但公民對民主的滿意度則相對較低，且自Alejandro Toledo到Pedro Pablo Kuczynski之間，公民對總統的支持率也是拉美最低(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0-151; Vergara & Watanabe, 2019: 33-37)。更具體而言，在2010年的Latinobarameter調查結果顯示，在自由民主、對法治及新聞自由的尊重等相關問卷題目，秘魯幾乎是拉美地區最高，但在民主滿意度上僅有28%秘魯人民滿意當前的民主，與拉美地區平均值44%有很大的落差(Levitsky, 2011: 87)。

2. 弱政黨體系與公民社會

是什麼導致秘魯公民對領導人和機構如此苛刻？秘魯有高水平制衡力量，但垂直課責僅有選舉。O'Donnell 認為垂直課責力量主要來自於選舉，但秘魯的個案告訴我們在一些條件下無法產生令人滿意的垂直課責(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2)。首先是憲法限制總統連任，使總統因無法繼續連任而短期內無選票壓力，消除社會對執政者的課責能力。其次是弱政黨體系，自從 1990 年代 Fujimori 執政時期秘魯政黨體系瓦解後就沒有再恢復，造成選民沒有長期穩定的政黨認同(Levitsky, 2011: 86)。這使得秘魯政黨存活短暫並有個人化特徵，被稱為「沒有政黨的民主」(democracy without parties) (McNulty, 2017: 577)。Vergara & Watanabe (2016)認為這會造成五點影響：(1) 有利於政治素人及個人風格的政黨。選民無法藉由反對其政黨來間接懲罰總統，因為政黨揮發性高，總統多仰賴個人魅力。(2) 弱政黨無法實踐政黨培訓政治菁英的功能，使民選總統缺少民主治理的技能，損害民主(例如 Fujimori) 或交由技術官僚代勞(例如 Toledo 及 Humala)。(3) 使總統與國會關係複雜，臨時組成的聯盟缺少忠誠，當選後國會與總統關係不緊密，總統無法靠其政黨議員通過法案，總統也不易找到合適的部長候選人。(4) 技術官僚有其自己的政策目標，並在治理經驗上較豐富，2016 年 Humala 下台前，技術官僚佔據內閣的 17/19。(5) 總統與選民連結喪失，尤其是在 Toledo 和 Humala 執政時期，主要支持者來自鄉村和南部、高地及亞馬遜流域選民，但當選後與選民脫節。總統



之所以能違背競選承諾更改政策方向，是因為不用擔心受到以政黨為基礎的民眾課責(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3)。

第三個垂直課責問題是弱公民社會，理論上群眾動員可以補足政黨的缺乏，但秘魯的公民社會積弱，無法制衡總統，主因農人和鄉村組織在對抗光明路的內部衝突時瓦解，而都市地區產業工會衰敗，不到 4%的人口屬於工會成員，使秘魯不像玻利維亞⁹²和智利能有大規模群眾動員(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4)。

儘管採礦業能動員民眾，但無法擴及到其他政治需求，這使秘魯總統不受垂直課責，不須擔心抗議動員，而一旦當選後發現自己不受選民課責，易使其作出侵蝕人民對民主機構信任的行為。第四個垂直課責阻礙是經濟持續成長，經濟成長是靠不受課責的技術官僚而非總統，使總統與其官僚、人民關係不緊密(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5)。經濟成長給予根深蒂固的專業技術官僚正當性，讓無經驗、沒政黨基礎的總統在當選後於維持現狀或改變過去政策之間作抉擇時，往往選擇能維持現狀持續高經濟成長的政策，拋棄過去尋求改變的競選承諾，因為改變政策的結果不一定會好，但保證和商人階級、媒體與政治菁英立刻起衝突(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0-152)。

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周遭的玻利維亞及厄瓜多挑戰新自由主義，秘魯卻無法有大規模左翼改革，儘管 Alejandro Toledo、Alan García⁹³和 Ollanta Humala⁹⁴都以改革為號召上台，誓言改革新自由主義經濟，但當選後都沒實踐承諾，選擇維持現狀，重用技術官僚並加深新自由主義，這種現狀維持的穩定對經濟成長有利，但對總統不利。猶如自動駕駛班，技術官僚治國下總統無法回應人民，得不到人民的青睞。選民的要求沒有成為政策，使得選民對總統的不滿上升(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3-154)。

⁹² 譬如 2003 年玻利維亞的 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 就受到群眾動員的威脅(Vergara & Watanabe, 2016: 154)。

⁹³ Alan García 和 Ollanta Humala 都宣稱反對新自由主義，並批評 Fujimori 時期擬定的憲法。但 García 領導的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 APRA)執政後所推行的政策維持保守派立場，且任命非選舉產生的專家與商人來制定經濟政策，讓選民與政策制定間的距離拉大(Vergara & Watanabe, 2019: 34-35)。

⁹⁴ Ollanta Humala 在 2011 年選舉一改過去效法 Hugo Chávez 的激進左翼立場，改以中左翼立場競選。但當選後受商人與政界的壓力，選擇支持自由市場經濟，指派 Luis Miguel Castilla 領導財政經濟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如同前任幾位領導人，Humala 卸任後支持率大跌，且與其妻 Nadine Heredia 被指控貪腐而入獄(Vergara & Watanabe, 2019: 35-36)。



七、 巴拿馬

(一) 左翼不具委任式民主特徵

巴拿馬在本文中因 2008 年為左翼，2018 年為右翼被歸類在右轉國家，然巴拿馬的左翼政府 Martín Torrijos(2004-2009)並不具有新民粹左翼的特徵。O'Donnell 所提出的委任式民主是源自於經濟危機，而拉美新民粹亦有經濟色彩，然而巴拿馬的經濟是由金融銀行體系帶動(Mann, 2016: 261)，經濟一向表現亮眼，儘管 2016 年 GDP 成長率為五年內最低，仍有拉美地區第二高的成長率(Pérez, 2017: 521)。

此外巴拿馬有自由、競爭的選舉，且每屆選舉都由反對黨獲勝(Pérez, 2017: 524)。如 2004 年是左翼民主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mocrático, PRD)的 Martín Torrijos 勝選，2009 年是右翼政黨改變的民主(Cambio Democrático, CD)的 Ricardo Martinelli 勝選，2014 年是右翼巴拿馬黨(Partido Panamenista)的 Juan Carlos Varela 勝選。然而巴拿馬最大的問題是貪腐議題(Mann, 2016: 260)。

(二) 貪腐問題與低司法制衡

巴拿馬有避稅天堂之稱(Mann, 2016: 264; Pérez, 2017: 526)，且侍從主義的貪腐問題在 Ricardo Martinelli 任內尤其嚴重(Mann, 2016: 266-267)。Pérez (2017)認為巴拿馬貪腐嚴重有三大原因，首先金融商業體系，在低稅率環境、開放經濟體系與複雜的銀行體系作用下，形成適合避稅與洗錢的平台，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即為此例。接著是收入不平等與侍從主義的遺緒，最後是弱的水平課責機制導致(Pérez, 2017: 520-521)。

(三) 改善貪腐的努力與司法制衡提升

巴拿馬近幾年一直在反貪腐讓做出努力。左翼政府 Martín Torrijos 於 2009 年設立捍衛國際金融服務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Defens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ANDSIF)來提高巴拿馬金融體系的透明度(Pérez, 2017: 533)。

2014 年 Juan Carlos Varela 上任後根據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⁹⁵提供的建議進行法律改革(Mann, 2016: 264)。並在 2016 年任命兩位新大法官取代 Harly Mitchell 及 Nelly Cedeño 兩位大法官，後者在 2015 年坦承非法斂財以及性犯罪。在新大法官的加入後，司法對貪腐的制衡提升，尤其是對於前總統 Ricardo Martinelli 的起訴，罪名包含動用國家資源監聽政治敵人、侵占國家援助計畫(Programa de Ayuda Naciona, PAN)及社會福利計畫的資金(Pérez, 2017: 524-525)。

八、 巴拉圭

巴拉圭 1989 年結束軍事統治後開始民主轉型，1992 年新憲法的規範是一個高度法治、代議式及參與式的多元民主(Duarte-Recalde, 2017: 66-68)。惟儘管選舉體系規則係基於民主原則設立，在實踐上卻缺少對違反規則的懲罰，對選舉經費的規範亦有不足，再加上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使得人民雖依法有權參與選舉，但實際上只有少部分人有能力參與(Bourscheid & González, 2019: 41; Duarte-Recalde, 2017: 83-84)。

(一) 左翼的委任式民主特徵

自民主轉型開始 19 年後，2008 年卸任天主教主教 Fernando Lugo Méndez 領導的政黨愛國變革聯盟(Aianza Patriótica para el Cambio, AP)⁹⁶結束科羅拉多黨(Partido Colorado)長達 61 年的領導(López, 2010: 90)。但 Lugo 執政下的巴拉圭並不民主，甚至造成機構弱化、無法回應人民需求，讓民主品質衰退(Bourscheid & González, 2019: 39-40)。Villagra & Delgadillo (2018)認為 Fernando Lugo Méndez 這位政治局外人能夠在 2008 年選舉取得勝利，是仰賴左翼的政治運動、國家經濟衰退與政治危機，以及其作為領導人高度個人魅力等因素(Villagra & Delgadillo, 2018: 133-136)。而這些正是委任式民主所強調的特徵：起源於經濟危機、由領袖個人魅

⁹⁵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Grupo de Acción Financiera Internacional, GAFI)是由巴拿馬以外的三十五個國家及兩個多邊組織組成，2014 年 6 月對巴拿馬防制洗錢法律框架的缺陷及不足處提出建議(Mann, 2016: 264)。

⁹⁶ 愛國變革聯盟(Aianza Patriótica para el Cambio)是一個破碎且意識形態分歧的選舉聯盟，其選舉勝利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和傳統上與科羅拉多黨(Partido Colorado)敵對的中右翼政黨真正激進自由黨(Partido Liberal Radical Auténtico, PLRA)策略性聯盟，而結盟條件是讓 Federico Franco 作為副總統候選人(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287)。



力帶領的政治運動以及弱化的水平課責機構。在政策上 Fernando Lugo Méndez 欲重拾巴拉圭能源主權、追求平等、消弭貧窮與飢餓並採取收入重分配政策(López, 2010: 91)。

(二) 水平制衡與右翼崛起

本文所強調的是司法制衡的角色，而巴拉圭的例子則主要體現在國會制衡。Lugo 領導愛國變革聯盟(Aianza Patriótica para el Cambio)在國會中僅掌握少數席次，Lugo 在該政黨聯盟中的力量也相當薄弱，反觀科羅拉多黨(Partido Colorado)在眾議院 80 席中仍有 30 席，參議院 45 席中握有 15 席，具有優勢地位(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287)。而 Lugo 在競選期承諾的農業改革無法落實的原因，正是因為雖左翼取得總統選舉的勝利，惟國會仍掌握在控制國家的寡頭以及土地菁英手中，使其政策落實受到國會掣肘(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280)。而 Fernando Lugo 在 2012 年 6 月 21 日受到國會彈劾的案例更可以看到水平課責力量對行政部門的制衡(Becker, 2013: 253)。該彈劾案由眾議院 76 比 1 (3 票棄權) 提出，參議院 39 比 4 (2 票棄權) 通過，卸去 Lugo 職務，由長期反對其改革政策的副總統 Federico Franco 接續剩下 14 個月的任期(Ezquerro-Cañete & Fogel, 2017: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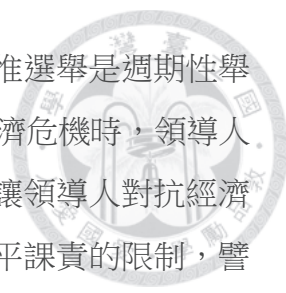
其後 2013 年與 2018 年持續由科羅拉多黨(Partido Colorado)的 Horacio Cartes 與 Mario Abdo Benítez 執政。而 Mario Abdo Benítez 競選時也強調將司法改革與打擊貪腐作為其政策目標。⁹⁷

參、小結

(一) 左翼國家

在這些左翼持續執政的國家中，大多可歸類於委任式民主的類別。委任式民主是強總統的強選舉委任(mandate)形成其社會合法性，問題是水平課責疲弱。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在這些國家提供垂直課責的媒介，言論自由及媒體讓人民可以針對

⁹⁷ Última Hora. 2018. "Marito propone un plan estratégico de desarrollo nacional con 12 puntos." <https://www.ultimahora.com/marito-propone-un-plan-estrategico-desarrollo-nacional-12-puntos-n1140913.html>. Latest update 22 November 2019.



社會需求向政府發聲，以投票來懲罰做出錯誤決策的領導人。惟選舉是週期性舉行，且垂直課責的有效性仍待確立(O'Donnell, 1998)。當面臨經濟危機時，領導人選舉承諾的重分配政策變得更有吸引力，社會委任龐大的權力讓領導人對抗經濟危機，當水平課責機構被侵蝕後，總統更能集中權力，忽視水平課責的限制，譬如厄瓜多的 Correa、玻利維亞的 Evo Morales 及委內瑞拉的 Nicolás Maduro 都冀求改變憲法對其權力的限制，例如企圖改變或漠視憲法的任期限制。

(二) 右翼國家

1. 左翼時期的委任式民主特徵

右轉國家在過去左翼浪潮時期的執政者也有委任式民主特徵，訴諸直接民主並弱化監管機構，如阿根廷的 Néstor Kirchner 干預國家統計調查局(INDEC)自主性、Cristina Fernández 修改國家治安官委員會(Consejo de Magistratura)的成員組成，著重人民主權而非憲法合法性；巴西 Lula da Silva 以總統特權(presidential prerogative)對監管機構施加壓力；秘魯的 Ollanta Humala 也被視為反對自由民主的總統。

2. 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

讓貪腐議題浮上檯面的司法制衡力量在各國以不同方式提升。諸如公民團體的助益，如阿根廷有合法正義(Justicia Legítima)推動司法部門民主化；司法部門的改革，如阿根廷最高法院修改國家治安法官委員會(Consejo de la Magistratura)成員組成、巴西設立國家司法委員會(Conselho Nacional de Justiça)；與國際組織合作，如瓜地馬拉與聯合國合作成立的瓜地馬拉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Comisión Internacional Contra la Impunidad en Guatemala, CICIG)、薩爾瓦多與美洲國家組織合作成立的薩爾瓦多消除有罪不罰國際委員會(Comisión Internacional Contra la Impunidad de El Salvador, CICIS)、巴拿馬的捍衛國際金融服務委員會(CANDSIF)；政府推動反貪腐法案，如巴西 2013 年的反貪腐法案(Anti-Corruption Law)與犯罪組織法(Criminal Operations Law)；設立反貪腐政策建議機構，如智利 Bachelet 總統設立排除政治人物的技術委員會來建議反貪腐政策。



3. 貪腐案的出現

司法制衡力量提升後，這些右轉國家過去的領導人或是直接因貪腐受到司法偵查與起訴，或是執政政府受到貪腐醜聞影響而支持率下滑。譬如阿根廷的 *Cristina Fernández*；薩爾瓦多的 *Francisco Flores*、*Elías Antonio Saca*、*Mauricio Funes*；瓜地馬拉的 *Álvaro Colom*；巴西 *Lula* 面對的 *Mensalão* 案、*Rousseff* 面對的 *Petrolão* 案；智利 *Bachelet* 面對兒子和兒媳婦 *Caval* 公司的內線交易醜聞；秘魯的總統無不受到巴西 *Odebrecht* 公司的貪腐案牽連；在巴拿馬則有巴拿馬文件的貪腐案。

貪腐案與過去的政治菁英掛勾，使新上任的右翼多為超脫傳統左右翼的政治局外人，企求與既有政治菁英的貪腐形象脫鉤，並以打擊貪腐為競選承諾，如阿根廷的 *Mauricio Macri*、薩爾瓦多的 *Nayib Bukele* 與巴西的 *Jair Bolsonaro*。

4. 新右翼的經濟政策

新右翼並沒有全面緊縮福利政策開支 *Niedzwiecki & Pribble (2017)* 以 *Pribble (2013)* 提到影響政府是否實施福利政策相關的變數⁹⁸為基礎，分析智利右翼的 *Sebastián Piñera* 政府和阿根廷右翼的 *Mauricio Macri* 政府，發現這次的右轉有別於過去新自由主義時期的政策，兩國政府都沒有緊縮社福政策開支⁹⁹，而是透過政策飄移(*policy drift*)¹⁰⁰和私有化進程的方式創造社會福利政策，更接近先進工業民主國家的方式(*Niedzwiecki & Pribble, 2017: 74*)。

在 1980、90 年代拉美可以實施全面的緊縮政策是因為經濟危機、資本項目開放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和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但這種全面的緊縮政策因為民主化的經驗與左翼政黨統治帶來的政治背景 (*political*

⁹⁸包含政策遺風、選舉競爭種類、政黨特徵、經濟能力、社會動員、社會壓力與政治制度設計七項，並認為前三者為最重要的因素(*Niedzwiecki & Pribble, 2017: 73*)。

⁹⁹福利國家緊縮開支的方式有三種：第一，全面與直接(*overt and outright*)的緊縮政策，譬如私有化、福利計畫刪減及減少開支；第二種為少部分改變(*minor change*)的方法，如提高享有社會福利的資格限制、增設更多條件門檻等；最後一種是消極措施(*passive measure*)，如政策飄移(*policy drift*)(*Niedzwiecki & Pribble, 2017: 74*)。

¹⁰⁰政策飄移有不同方式，其中一種是遞增改變 (*incremental change*)，也就是儘管外在條件改變帶來影響，但維持既有的規則。譬如雖然人民對社會福利的需求提高，但該國維持原有的社會福利支出；亦如一國提高收入轉移 (*income transfer*) 水平，但比率低於通貨膨脹率；再如一國在特定部門的花費少於預定的預算。透過上述方式進行實際上的緊縮開支政策(*Niedzwiecki & Pribble, 2017: 74*)。

context) 改變，使其在實踐上成本更高且更不切實際(Niedzwiecki & Pribble, 2017: 75-76)。

譬如智利的 Piñera 政府就一定程度上維持過去左翼 Concertación 實施 20 年的政策，也因此其右翼聯盟 Alianza 得到中間政黨獨立區域黨(Partido Regionalista Independiente, PRI)與中間偏左的基督教民主黨(Democracia Cristiana)在法案表決時的支持(Toloza Castillo & Toro Maureira, 2017: 147)。



第四章 個體層次分析



在透過總體資料證明右轉國家近年來確實因貪腐印象指數降低、經濟成長趨緩、吉尼係數下降以及司法制衡提升對左翼退潮造成影響，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證實未右轉國家與右轉國家的差異，結果符合理論之預期。在第四章我們將以個體層次的問卷資料結合總體層次的司法制衡力量，以複層次迴歸將個體與總體共同納入考量，論證「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確實使貪腐議題在近年對選民投票行為有所影響」，而由於貪腐議題的重要性取代左翼領導人擅長的經濟議題，在貧窮人口減少且生活福祉提升後，人民轉向追求經濟以外的議題，使得被司法機構揭露貪腐的政府因而下台。

第一節 資料來源與變數設計

壹、分析層級與資料庫選擇

本研究係研究拉美左翼退潮中選民的投票行為，採個體分析層次。相比過去較高的分析層次，採個人層次的分析更能忠實反映選民偏好，譬如在自變數設計上過去採 GDP 增長率、吉尼係數、通貨膨脹率及犯罪率等，本研究的方式是以個人對經濟的感受、對收入的主觀感覺進行分析，如此更能解釋選民投票行為。

相關調查問卷的資料庫包含 Latin America Public Opinion Project (LAPOP) 以及 Latinobarómetro¹⁰¹ 兩種。LAPOP 的問卷資料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 24 個國家進行，在所有國家都採用具有相同問題的問題卷，確保其結果具有跨國可比較性。通過面對面訪談蒐集數據，誤差範圍為正負百分之二點五或者更小。在每個國家有一千五百次或更多的訪談，故每年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總樣本達三萬八千多筆。但相比於 LAPOP 兩年進行一次調查，Latinobarómetro 雖然只在 18 個

¹⁰¹ 問卷由 Latinobarómetro Corporation 提供，是一個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總部位於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在拉美 18 國中每個國家取 1000 到 1200 個受試者代表該國母體，誤差範圍在正負 3% 之間。可至 www.latinobarometro.org 取得更多細節。

拉丁美洲國家進行訪談，卻幾乎每年都執行調查計畫，為了能精確捕捉到選民態度變化，本文採用後者資料庫進行分析。研究時間由於過去研究左翼崛起的時間段都到 2007 年(Blanco & Grier, 2013; Remmer, 2012)，本文以 2008 年為始點，一來是接續過去左翼崛起的研究，二來是本文認為左翼退潮與國際原物料價格下跌導致的經濟衰退有關，故以 2008 年經濟危機為分界。

貳、依變數

左右翼的測量參考過去學者對拉美左翼崛起的研究方法，Remmer (2012)以二元編碼的方式，採用 Coppedge (1997)、Wiesehomeier & Benoit (2009)、網路新聞、NotiSur 以及政黨網頁將自由民主政黨定義為左翼。為了避免傳統定義左、右翼研究，而消弭左派間內部差異（如極左、中左之間的差別），Blanco & Grier (2013)、Murillo et al. (2010)採取的作法是把政黨分為左翼、中左翼、中、中右翼及右翼，並根據左、中左翼政黨的得票率作為計算。Baker & Greene (2011)、Wiesehomeier & Doyle (2013) 則是採取 VRL (Vote-reveled leftism) 的方式測量，採用 Wiesehomeier-Benoit (2006)調查的資料，把各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意識形態劃分為一到二十個等第，一是極右，二十是極左。而所有競選政黨的意識形態與得票率相乘的總和，即為該次選舉的 VRL。具體公式為： $VRL_{itk} = Ideology_{it} * VoteShare_{itk}$ 。如此可以區分所謂肉食主義的民粹左派與草食性的社會民主左派(Baker & Greene, 2011)。然而上述研究方法以總體層級計算政黨得票率，不宜直接套用至本研究個體層級分析中。

故本研究在編碼採左翼與右翼的二元變數，依據 Latinobarómetro 的問卷題項「如果這個星期天有選舉，你會投票給哪一政黨？」並將政黨的意識形態依據 Baker & Kenneth (2011)各政黨的意識形態進行左右翼編碼，以 11.6 作為分界，以下為左翼，以上為右翼。¹⁰²使用 2019 年 8 月更新的資料，該筆資料包含百分之九十九點七的總統選舉投票。

¹⁰² Baker & Kenneth (2011)的意識形態編碼為 1 到 20 的順序尺度，直觀上會以 10.5 為分界點，但由於該指標結合不同研究的意識形態資料，如 Pop-Eleches (2009)、Coppedge (1998)、Wiesehomeier-Benoit (2009)以及自己的研究，故在其說明文件有提到以 11.6 為分界較為恰當。



參、自變數

受限於依變數的資料來源，貪腐亦須從 *Latinobarómetro* 尋找相關變數，其中有兩項問題比較完整，第一個是貪腐感知，題項為「近一年來您或您的親朋好友是否知悉公務員或政治人物的貪腐行為？」，回答為「親身經歷」、「家人經歷」、「朋友經歷」、「不曾親身經歷」及「未聽聞親友經歷」，涵蓋此題項的資料時間段為 2001 年至 2016 年。第二個是反貪腐表現，問題是「您認為在過去兩年中政府在減少國家機構腐敗方面取得了多大進展？」，資料時間段為 2004 年至 2017 年，其中缺少 2016 年與 2018 年的資料。本文採用後者的原因第一是在理論意義上後者較能代表選民對政治人物課責的回溯性投票，第二是前者貪腐感知的評判標準是以親身經歷，但文獻回顧中我們提到貪腐感受很大程度受到媒體的影響，且貪腐感受不必然與真實貪腐情況有連結(Davis, 2004: 686)，Bohn (2012)亦以經驗資料證實貪腐經歷與民主滿意度沒有顯著相關。反之政府打擊貪腐表現及當前政府滿意程度對貪腐感受呈現顯著負相關¹⁰³，也就是當政府的反貪腐表現愈好時，選民的貪腐感受則會降低(Bohn, 2012; Quiroga, 2009)。第三是資料時間段上後者雖缺少 2016 年及 2018 年的資料，但包含最近當前的 2017 年資料。為方便資料解讀，將回答重新編碼後以 0 表示沒進展、1 表示進展少、2 表示有進展、3 表示進展多。

肆、調節變數

本文調節變數設計，將在統計模型中放入司法制衡作為調節變數進行統計操作。由於本研究的理論意涵強調水平制衡以及司法獨立性的重要性，故採用 V-Dem 的司法對行政制衡指數，司法制衡囊括行政權對於憲法的尊重、對於法治的遵守以及司法能獨立行使職權的程度(V-Dem, 2019: 46)。該指標為 0 到 1 之間的值，愈高代表司法對行政制衡能力愈強。

¹⁰³ Quiroga (2009)認為這是因為貪腐感受主要來自於媒體對於貪污醜聞的報導，而非親身的經歷貪腐，故反映在政權滿意度。反之若為貪腐受害上升，由於是親身感受，會直接反映在對於民主機構的不信任上，損及民主正當性。



伍、控制變數

假設三預期左翼執政時期經濟成長率愈低，選民對執政者（左翼）支持愈低。所以在經濟的部分採 *Latinobarómetro* 中受訪者對母國當前經濟狀況的滿意度；控制主觀認定的社會階級亦相當重要，在過去左翼崛起的文獻中，左翼的支持者多為社會中較弱勢的群體，而右翼往往與社會菁英、企業家的形象結合。另外因為選民的意見形塑都在選舉年，選民依據競選時期的政見形成意見，並且會懲罰態度模糊的競選活動(Lora et al., 2005)。所以在此控制住選舉年，若當年該國有選舉則設為 1，若無則設為 0。

此外亦控制選民自認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對拉丁美洲地區選民的政黨偏好是重要因素(Saiegh, 2015: 363)。檢視拉美選民在自認的意識形態與其政黨偏好的比較，發現意識形態對政黨偏好的影響，會因為社會階級、就業等因素在不同社會有不同影響，因此國家背景(national context)影響很大(Seligson, 2007; Saiegh, 2015: 368)。舉例而言，Seligson (2007)發現在哥斯大黎加，選民意識形態對於政黨偏好的影響不大，政黨偏好為傳統上屬於中左翼民族解放黨(*Partido Liberación Nacional, PLN*)的選民，其意識形態的平均值為 6.3，比該國的平均值 5.9 還偏右，可見在此國家意識形態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有限。惟意識形態對政黨偏好的影響在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則相對較強，在尼加拉瓜投給左翼政黨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SLN*)的選民，其意識形態平均值為 4.3；投給右翼政黨立憲自由黨(*Partido Liberal Constitucionalista, PLC*)的選民，其意識形態平均值為 6.0。在薩爾瓦多，投給左翼政黨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黨(*FMLN*)的選民，其意識形態平均值為 3.3；投給右翼政黨國家共和聯盟黨(*ARENA*)的選民，其意識形態平均值為 7.5。且若選民與執政黨意識形態差異愈大，反對黨的選民認為現任執政者愈貪腐，且反對菁英在選舉過程中會對執政黨型塑更負面的形象(Davis et al., 2004: 679-680)。

在執政時期的判斷標準上由於本文重視投票行為中執政者表現的回溯性課責，在編碼上以七月為中間值，若因選舉緣故該年七月以前更換領導人，該年執政者意識形態編碼以新政黨為主；反之若七月之後新執政者上台，該年仍以舊執政者的意識形態編碼。

控制人口特徵中的性別、教育程度與年齡的原因是由於貪腐議題在選舉過程中是否會被強調取決於反對黨對現任者的敵意程度，而跨黨派的敵視程度會受到階級以及其他人口特徵影響(Davis et al., 2004: 679-680)。左右翼支持者人口組成特徵亦相當重要，傳統上我們會認為右翼的人口組成是統治階級且具有反動的特徵，代表穩定與父權思想；左翼則是社會的進步主義，是都市中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工團主義(Nikolajczuk & Prego, 2017: 11-12)。

表格 4-1: 變數與操作化指標

變數種類	操作化定義	資料來源	層級
壹、依變數			
選民投票行為	如果這個星期天有選舉，你會投票給哪一政黨？ 0 投給左翼政黨 1 投給右翼政黨	Latino Barometer; Baker & Kenneth (2011)	個體
貳、自變數			
政府打擊貪腐表現	在過去兩年中在減少國家機構腐敗方面取得了多大進展？ 0 表示沒進展 1 表示進展少 2 表示有進展 3 表示進展多	Latino Barometer	個體
參、調節變數			
司法制衡	V-Dem 的 Judicial constraints on the executive index，衡量國家司法制衡的指標，分數介於 0 到 1，分數愈高代表國家司法制衡愈高。	V-Dem	總體
肆、控制變數			
經濟滿意度	衡量受訪者對於母國的當前經濟狀況滿意度，為四階段順序變數： 0 表示非常不滿意 1 表示不滿意 2 表示滿意 3 表示非常滿意	Latino Barometer	個體
政治傾向	衡量受訪者自我定義的意識形態，為 0-10 的 11 點量尺： 0 代表左派 1 代表右派	Latino Barometer	個體
性別	受訪者性別，為虛擬變數： 0 表示受訪者為女性 1 表示受訪者為男性	Latino Barometer	個體

教育程度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 0-12 年的順序變數。	Latino Barometer	個體
年齡	受訪者的實際年齡，為順序變數。	Latino Barometer	個體
社會階級	衡量受訪者自我定義的社會階級，為順序尺度： 1 表示低社會階級 2 表示中低社會階級 3 表示中社會階級 4 表示中高社會階級 5 表示高社會階級	Latino Barometer	個體
選舉年	以該年度有無選舉建立虛擬變數： 0 表示該年度無選舉 1 表示該年度有選舉	Baker & Kenneth (2011)	總體

第二節 實證模型分析

壹、計量模型選取

檢驗司法制衡力量對選民貪腐感受影響及投票行為的調節效果，涉及選民個體層面以及國家總體層面兩個層次的變數，且選民層面的資料巢形鑲嵌在國家層面的資料之中。對於這種多層巢狀結構的資料，羅吉斯迴歸通常將其視為同一層級的變數，不考慮國家層次，只在選民貪腐感受影響其投票行為這一層次進行分析。這種處理方式將高層級的變數放置個體層次，會違背誤差彼此之間獨立以及樣本相互獨立的前提假設(Woltman et al., 2012: 54)。並且很可能會發生區位謬誤，即研究者試圖將總體層次的因果關係推論直接用於個體層次；或可能發生原子論式謬誤，也就是個體層次的推論結果用於總體層次的解釋(黃旻華，2006: 158)。

而分層廣義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HGLM)能夠克服羅吉斯迴歸的侷限，將迴歸分析中的誤差分為兩個部分，也就是假設個體層面的測量誤差相互獨立，國家層面的誤差也相互獨立。考量到巢狀結構資料的共同變異，分層廣義線性模型能夠準確測量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的影響(Woltman et al., 2012: 52-53)。結合本研究特點，採用分層廣義線性模型對跨國跨時司法制衡對

貪腐影響投票行為的調節效果進行實證檢驗，有助於釐清分析層次的因果作用，區別國家層面的脈絡效果、個體層面的心理效果以及總體與個體的交互效果。



貳、模型設定

一、 集群效應分析

複層次線性迴歸分析的本質就是變異數分析，區別不同層次依變項之變異數，然後分別用對應層次的自變數來解釋其變異。但若高層次依變數的變異在統計上不顯著，則代表低層次的組間變異並不顯著，所以無理由將低層次的資料分組來處理，可視為單層次的迴歸分析。故先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y-way ANOVA model)檢驗模型中是否存在顯著的集群效應(cluster effect)，首先要建立隨機截距模型，亦即空模型(Null Model)¹⁰⁴ (Garson, 2013: 62)。

個體層次模型：

$$\text{Prob} \left(Y_{ij} = 1 \mid \beta_j \right) = P_{ij}$$
$$\ln \left(\frac{P_{ij}}{1 - P_{ij}} \right) = \beta_{0j}$$

總體層次模型：

$$\beta_{0j} = \gamma_{00} + u_{0j}$$

其中 Y_{ij} 是鑲嵌在總體層次第 j 個群體中的第 i 個選民的投票行為，投給左翼(0)或右翼(1)； β_{0j} 是個體層次截距項； γ_{00} 是總體層次的隨機截距項； u_{0j} 是總體層次的隨機誤差項(random error term) (Garson, 2013: 63; Raudenbush & Bryk, 2002: 19; Woltman et al., 2012: 56)。

再來以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測試總體層次上依變項是否有足夠變異來進行複層次迴歸分析，得出下表 4-2，發現不論在左翼或右翼執政時期，投票行為的變異數都顯著受到總體層次的影響。而該項顯著也代表組內相關

¹⁰⁴ 空模型的作用在於計算組內相關係數(Intr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其值為 $\left(\frac{\text{組間差異}(\tau)}{\text{組內差異}(\sigma^2) + \text{組間差異}(\tau)} \right)$ ，用以測量是否有需要採用複層次模型(Garson, 2013: 61; Raudenbush & Bryk, 2002: 24)。



係數顯著，即有使用複層次模型的必要性(Garson, 2013: 64-65)。由此可見不同組平均值所產生的變異是不可被忽略的，因此我們推論這些組別所形成的兩層次模型成立，以及兩層次的依變數都有足夠的變異來被解釋。

表格 4-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左翼執政時期－左翼十三國					
隨機效果	標準差	變異數成分的分解	自由度	卡方值	P 值
組間(u_0)	1.29247	1.67049 (τ)	54	4251.16506	0.000
右翼執政時期－右轉八國					
隨機效果	標準差	變異數成分的分解	自由度	卡方值	P 值
組間(u_0)	1.36569	1.86512 (τ)	22	1801.11585	0.000

二、 中心化方式

本文個體層級所採用的是 LatinoBarameter 的問卷資料，而個體問卷資料主要有四項問題，首先是預先設定的量表尺度限縮受試者的選擇；第二是對每個人而言尺度代表的意義不同，會根據他們自己對题目的詮釋產生錨定效應；第三是每人對於尺度區間的詮釋也不同；最後是每個人會依據自己的立場而有系統性偏誤 (Saiegh, 2015: 367)。為解決第三點問題，我們要對部分變數做中心化處理。

中心化是要找出每一個總體單位的比較基準，在個體層次以該組的平均值作為比較基準，分析在不區分其他個人屬性的前提下，個人與該組平均數值的差異；在總體層次則以總平均值為基準，分析在不區分其他總體屬性的前提下，每個群組與總平均值的差異(黃旻華，2006: 130)。而本文所選用的變數中，年齡、教育程度、性別、選舉年、主觀收入評估與主觀社會階級不進行中心化設定，而個體對政府與國家評價如政府反貪腐表現、經濟評估、政治傾向以及總體各國的司法制衡力量則進行中心化設定。



三、 交叉效果測試

在確立複層次模型使用的正當性，並進行中心化設定後，要透過交叉效果測試決定要將個體層次的迴歸係數設定為固定、隨機或是納入總體層次的自變數進行解釋。如表格 4-3 所示，可以看到在政府反貪腐表現在左翼執政時期的卡方值較高，因此這部分要以總體層次變數進一步解釋，即本文中以司法制衡力量解釋。

表格 4-3: 交叉效果測試

目的： 決定模型設定中個體層次的迴歸係數會不會受到組間變異影響。					
個體層次模型：					
$Prob(Y_{ij} = 1 \beta_j) = P_{ij}$ $\ln\left(\frac{P_{ij}}{1-P_{ij}}\right) = \beta_{0j} + \beta_{1j}(\text{反貪腐表現} - \overline{\text{反貪腐表現}}) + \beta_{2j}(\text{經濟評估} - \overline{\text{經濟評估}}) + \beta_{3j}(\text{政治傾向} - \overline{\text{政治傾向}}) + \beta_{4j}\text{收入評估} + \beta_{5j}\text{社會階級} + \beta_{6j}\text{年齡} + \beta_{7j}\text{教育程度} + \beta_{8j}\text{性別}$					
總體層次模型：					
截距模型 $\beta_{0j} = \gamma_{00} + u_{0j}$					
斜率模型 $\beta_{1j} = \gamma_{10} + u_{1j}$					
$\beta_{2j} = \gamma_{20} + u_{2j}$					
$\beta_{3j} = \gamma_{30} + u_{3j}$					
$\beta_{4j} = \gamma_{40} + u_{4j}$					
$\beta_{5j} = \gamma_{50} + u_{5j}$					
$\beta_{6j} = \gamma_{60} + u_{6j}$					
$\beta_{7j} = \gamma_{70} + u_{7j}$					
$\beta_{8j} = \gamma_{80} + u_{8j}$					
實證結果—左翼執政時期—左翼十三國					
隨機效果	標準差	變異數成分的分解	自由度	卡方值	p-value 值
組均變異	1.99644	3.98575	28	140.58391	0.000
反貪腐表現	0.28639	0.08202	28	77.57794	0.000

經濟評估	0.32164	0.10345	28	72.96556	0.000
社會階級	0.10035	0.01055	28	31.55974	0.292
政治傾向	0.28799	0.08294	28	441.57754	0.000
性別	0.18867	0.03560	28	31.73514	0.285
教育	0.04105	0.00169	28	36.20481	0.137
年紀	0.01150	0.00013	28	49.95591	0.007
實證結果—右翼執政時期—右轉八國					
隨機效果	標準差	變異數成分的分解	自由度	卡方值	p-value 值
組均變異	3.75289	14.08416	9	71.66498	0.000
反貪腐表現	0.25985	0.06752	9	13.02517	0.161
經濟評估	0.22868	0.05230	9	12.11883	0.206
社會階級	0.17004	0.02891	9	10.33413	0.324
政治傾向	0.62031	0.38478	9	272.53446	0.000
性別	0.40152	0.16122	9	17.13449	0.046
教育	0.10604	0.01124	9	21.60885	0.010
年紀	0.01478	0.00022	9	18.45689	0.030
結論					
左翼執政時期	「反貪腐表現」、「經濟評估」、「政治傾向」、「年紀」的迴歸係數應設為隨機，其餘變數的迴歸係數應設為固定。				
右翼執政時期	「政治傾向」、「性別」、「教育」、「年紀」的迴歸係數應設為隨機，其餘變數的迴歸係數應設為固定。				



四、完整模型設定

表格 4-4 為依照交叉效果測試後，選定固定、隨機效果所得出的完整模型，為後續分析所採用的複層次模型。

表格 4-4: 複層次迴歸完整模型

左翼執政時期－左翼十三國	
個體層次模型：	$Prob(Y_{ij} = 1 \beta_j) = P_{ij}$ $\ln\left(\frac{P_{ij}}{1-P_{ij}}\right) = \beta_{0j} + \beta_{1j}(\text{反貪腐表現} - \overline{\text{反貪腐表現}}) + \beta_{2j}(\text{經濟評估} - \overline{\text{經濟評估}}) + \beta_{3j}(\text{政治傾向} - \overline{\text{政治傾向}}) + \beta_{4j}\text{收入評估} + \beta_{5j}\text{社會階級} + \beta_{6j}\text{年齡} + \beta_{7j}\text{教育程度} + \beta_{8j}\text{性別}$
總體層次模型：	<p>截距模型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text{司法制衡} - \overline{\text{司法制衡}}) + \gamma_{02}\text{選舉年} + u_{0j}$</p> <p>斜率模型 $\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text{司法制衡} - \overline{\text{司法制衡}}) + u_{1j}$</p> <p>$\beta_{2j} = \gamma_{20} + u_{2j}$</p> <p>$\beta_{3j} = \gamma_{30} + u_{3j}$</p> <p>$\beta_{4j} = \gamma_{40}$</p> <p>$\beta_{5j} = \gamma_{50}$</p> <p>$\beta_{6j} = \gamma_{60} + u_{6j}$</p> <p>$\beta_{7j} = \gamma_{70}$</p> <p>$\beta_{8j} = \gamma_{80}$</p>
右翼執政時期－右轉八國	
個體層次模型：	$Prob(Y_{ij} = 1 \beta_j) = P_{ij}$ $\ln\left(\frac{P_{ij}}{1-P_{ij}}\right) = \beta_{0j} + \beta_{1j}(\text{反貪腐表現} - \overline{\text{反貪腐表現}}) + \beta_{2j}(\text{經濟評估} - \overline{\text{經濟評估}}) + \dots$

$$\overline{\text{經濟評估}}) + \beta_{3j}(\text{政治傾向} - \overline{\text{政治傾向}}) + \beta_{4j}\text{收入評估} + \beta_{5j}\text{社會階級} + \beta_{6j}\text{年齡} + \beta_{7j}\text{教育程度} + \beta_{8j}\text{性別}$$

總體層次模型：

$$\text{截距模型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text{司法制衡} - \overline{\text{司法制衡}}) + \gamma_{02}\text{選舉年} + u_{0j}$$

$$\text{斜率模型 } \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text{司法制衡} - \overline{\text{司法制衡}})$$

$$\beta_{2j} = \gamma_{20}$$

$$\beta_{3j} = \gamma_{30} + u_{3j}$$

$$\beta_{4j} = \gamma_{40}$$

$$\beta_{5j} = \gamma_{50}$$

$$\beta_{6j} = \gamma_{60} + u_{6j}$$

$$\beta_{7j} = \gamma_{70} + u_{7j}$$

$$\beta_{8j} = \gamma_{80} + u_{8j}$$

參、實證結果

一、敘述統計

模型所使用的所有變數之摘要列於表 4-5 與表 4-6。每個變數的樣本數再扣除遺漏值後以投票行為的樣本數最少，這是因為在編碼過程中將無法被明確定義為左右翼的政黨視為遺漏值。樣本數最多的則為性別、年齡等人口特徵的變數。其中本文的依變數「投票行為」的平均數在左右翼執政時期分別為 0.36 與 0.67，可見選民傾向投給執政黨。而本文的解釋變數「反貪腐表現」的平均數在左右翼執政時期分別為 1.2 以及 1.13，在 0 到 3 的區間尺度而言是相對較低的，亦即認為政府的反貪腐表現並不突出。同樣地本文調節變數「司法制衡力量」的平均數在左右翼執政時期分別為 0.55 與 0.68，可見左翼退潮時期司法制衡的表現在 0 到 1 的尺度中相對較好，其中右翼執政時期司法制衡平均數高於左翼執政時期。

表格 4-5: 敘述統計摘要表—左翼執政時期 (十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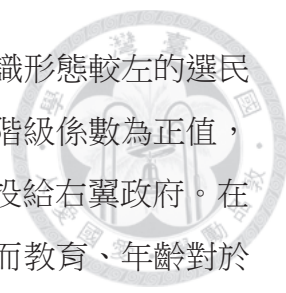
變數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個體層次					
投票行為	28695	0.36	0.48	0	1
反貪腐表現	73218	1.20	0.93	0	3
經濟評估	83587	1.09	0.85	0	3
政治傾向	67403	5.04	2.70	0	10
性別	87274	0.52	0.50	0	1
教育程度	75604	4.20	4.52	0	12
年齡	87274	40.57	16.72	16	99
社會階級	40346	1.30	0.91	0	4
總體層次					
司法制衡	76	0.55	0.30	0.04	0.97
選舉年	76	0.21	0.38	0	1

表格 4-6: 敘述統計摘要表—右翼執政時期 (八國)

變數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個體層次					
投票行為	10639	0.67	0.47	0	1
反貪腐表現	25595	1.13	0.93	0	3
經濟評估	29979	0.98	0.83	0	3
政治傾向	24193	5.32	2.64	0	10
性別	31200	0.511	0.50	0	1
教育程度	26838	5.26	4.72	0	12
年齡	31200	40.04	16.23	16	95
社會階級	17113	1.42	0.95	0	4
總體層次					
司法制衡	28	0.68	0.19	0.48	0.96
選舉年	28	0.22	0.41	0	1

二、 分析結果

表格 4-7 是左翼與右翼執政時期的估計結果。首先探討左翼執政時期，可以觀察到個體層次的反貪腐表現、國家經濟評估、政治傾向、社會階級及性別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解釋變數上反貪腐表現係數為負值，左翼執政時期政府的反貪腐表現愈差，愈傾向投給右翼政府，符合本文中關於左翼退潮的第一個假設。在控制變數上國家經濟評估係數為負值，左翼執政時期若選民認為國家經濟表現



不佳，傾向投給右翼政黨，假設三成立；政治傾向為正值，意識形態較左的選民傾向投給左翼政黨，較右的選民傾向投給右翼政黨；自認社會階級係數為正值，自認社會階級較低者傾向投給左翼政府，階級較高的選民傾向投給右翼政府。在人口特徵上男性傾向投給右翼政黨，女性傾向投給左翼政黨。而教育、年齡對於左右翼政黨的投票行為皆沒有顯著影響。在交互作用上，反貪腐表現與司法制衡力量為顯著正相關，當國家司法制衡力量愈高，政府反貪腐表現對於選民投給左右翼政黨的投票行為影響愈高，意即若司法制衡力量愈強，執政者反貪腐表現對選民投給左右翼政黨的效果愈強。

右翼執政時期總體層次的司法制衡；個體層次的政府反貪腐表現、國家經濟評估與政治傾向達統計上顯著水準，其中解釋變數右翼政府反貪腐表現係數為正值，認為右翼政府反貪腐表現愈好的選民，愈傾向投給右翼政府，符合假設一的預期。控制變數中國家經濟評估係數為正值，當選民認為右翼政府執政時期經濟表現愈好，愈傾向投給右翼政府，符合假設三的預期；政治傾向的迴歸係數為正，意識形態較左的選民傾向投給左翼政黨，較右的選民傾向投給右翼政黨。人口特徵則無顯著影響。總體層次的司法制衡愈高，則愈投給左翼政府。交互作用上反貪腐表現與司法制衡力量為顯著正相關，當國家司法制衡力量愈高，政府反貪腐表現對於選民投給左右翼政黨的投票行為影響愈高，也就是當司法制衡力量愈強，執政者反貪腐表現對選民投給左右翼政黨的效果愈強。

表格 4-7: 分層估計結果

效果的分解	左翼執政時期	右翼執政時期
總體層次效果		
司法制衡	0.770779 (0.416991)	-5.256819** (1.811637)
選舉年	0.460655 (0.389061)	0.208367 (0.748241)
個體層次效果		
反貪腐表現	-0.234718*** (0.023511)	0.163496*** (0.046412)
經濟評估	-0.244155*** (0.029185)	0.201318** (0.066441)
社會階級	0.054569** (0.017328)	0.111993 (0.067099)
政治傾向	0.158878*** (0.025758)	0.079246* (0.039323)
性別	-0.077392* (0.032047)	0.064546 (0.074485)
教育	0.011028 (0.006204)	-0.014427 (0.024699)
年紀	0.001440 (0.001699)	-0.005551 (0.004247)
交叉效果		
反貪腐表現×司法制衡	0.265952*** (0.049184)	1.081822* (0.364605)

註：* p<0.05; ** p<0.01; *** p<0.001。

表格 4-8 以勝算比解讀左翼執政時期與右翼執政時期的結果。先從解釋變數觀察，左翼執政時期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選民認為左翼政府的反貪腐表現每提高一單位，投給右翼的勝算就會比原本的勝算減少約 20.92%，即投給左翼的勝算比原本的值增加約 20.92%，換句話說若左翼政府愈貪腐（反貪腐表現降低），則

選民更傾向投給右翼。交互項的部分司法制衡與反貪腐表現對於左右翼投票行為的勝算比約為 1.3。在控制變數的部分，當選民對於左翼執政時期國家經濟表現評估每提高一單位，投給右翼的勝算就會比原本的值減少約 20.92%；若選民自認意識形態每提高一單位，投給右翼的勝算就會比原本的勝算增加 17.22%；若選民自認社會地位每提高一單位，投給右翼的勝算就會比原本的勝算增加 5.61%；男性投給右翼的勝算比女性高 7.45%。

右翼執政時期，在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解釋變數中選民認為右翼政府的反貪腐表現每高一單位，投給右翼的勝算就會比原本的勝算增加約 17.76%。在控制變數的部分，當選民對於右翼執政時期國家經濟表現評估每提高一單位，投給右翼的勝算就會比原本的值提升約 22.3%；若選民自認意識形態每提高一單位，投給右翼的勝算就會比原本的勝算增加 8.24%。在總體層次上，若該國該年的司法制衡每提升一單位，選民投給右翼的勝算為原本勝算的 0.52 倍。在交互項的部分司法制衡與反貪腐表現對於左右翼投票行為的勝算比約為 2.95。

表格 4-8: 勝算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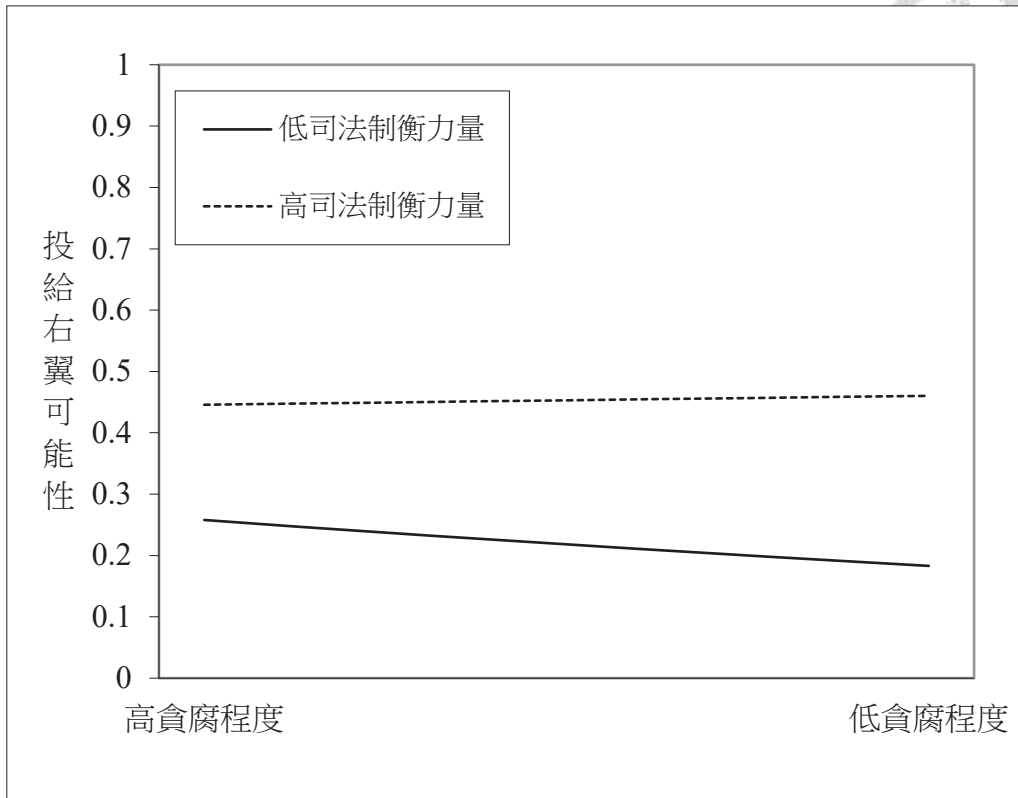
效果的分解	左翼執政時期	右翼執政時期
總體層次效果		
司法制衡		-5.256819 (0.005212)
選舉年		
個體層次效果		
反貪腐表現	-0.234718 (0.790794)	0.163496 (1.177620)
經濟評估	-0.244155 (0.783366)	0.201318 (1.223014)
社會階級	0.054569 (1.056086)	
政治傾向	0.158878 (1.172195)	0.079246 (1.082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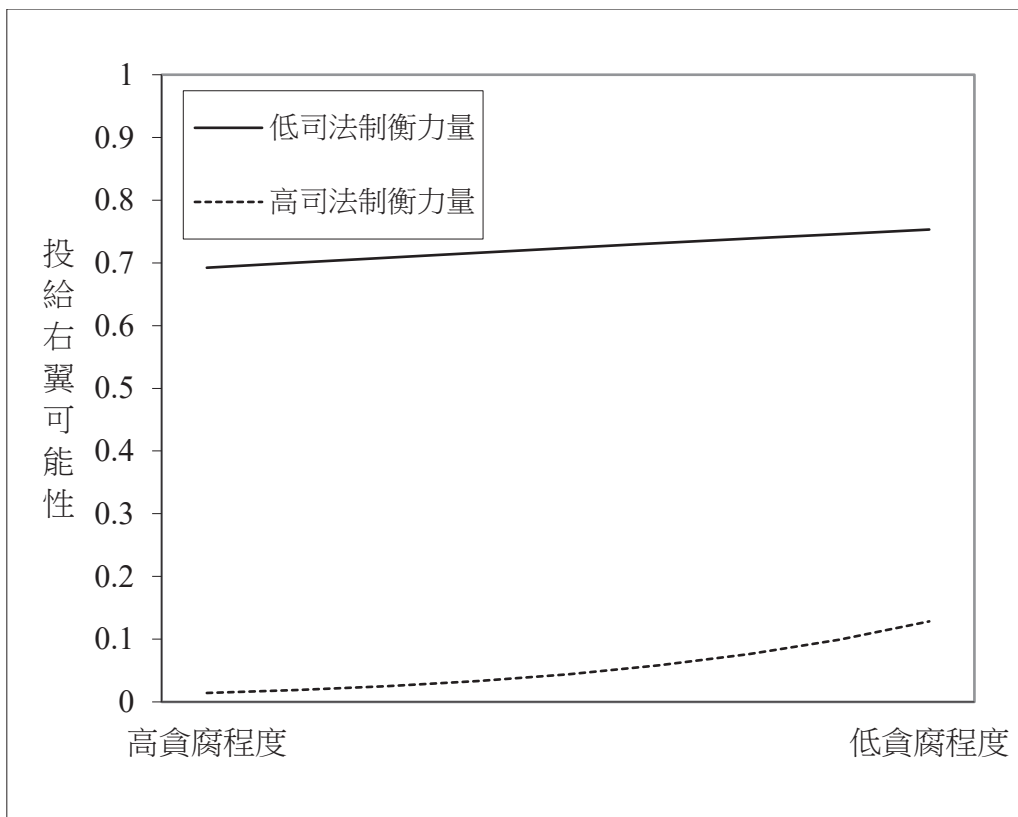
性別	-0.077392 (0.925527)	
教育		
年紀		
交叉效果		
反貪腐表現×司法制衡	0.265952 (1.304673)	1.081822 (2.950050)

註：顯著水準為小於 0.05，只列出有顯著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為勝算比。

由於廣義線性模型的交互項比一般線性模型的交互項解讀上更為困難，在確立交互項有顯著影響後，接著從圖表 4-1 與圖表 4-2 將交互項作用呈現，虛線代表高司法制衡力量，實線代表低司法制衡力量。由於自變數是政府反貪腐表現，為方便解讀於圖中以貪腐程度表示，因此橫軸左側為高貪腐程度（低政府反貪腐表現），右側為低貪腐程度。可以發現左翼執政時期高司法制衡力量的國家，若選民認為左翼政府貪腐程度高，投給右翼可能性比低司法制衡力量的國家高。而在右翼執政時期若選民認為右翼政府的貪腐程度高，投給左翼的可能性比低司法制衡力量的國家高。意即司法制衡力量的高低確實會影響選民貪腐感受對執政者的課責效果，符合本文之假設二。



圖表 4-1 司法與貪腐交互作用－左翼執政時期（左翼十三國）



圖表 4-2 司法與貪腐交互作用－右翼執政時期（右轉八國）

第三節 解讀民意支持的變化



壹、 貪腐議題與司法制衡的調節效果

前一節的實證結果證實近年來貪腐議題對選民投票行為有顯著影響，在左翼浪潮崛起的十三個左翼國家中，左翼執政時期若左翼政府反貪腐表現不佳，選民傾向投給右翼政黨。在十三個左翼國家裡的八個右轉國中，可以看到右翼執政時期貪腐表現也會影響投票行為。而其中左翼執政時期反貪腐表現對投票行為的迴歸係數為負 0.23，右翼執政時期該係數為 0.16，故左翼執政時期貪腐對投票行為的影響比右翼執政時期來的高。那麼是什麼原因讓貪腐議題的重要性提高呢？我們已經知道選民的貪腐感受會影響其投票行為，但是這項個體層次的關係是否會隨著國家脈絡中某種因素而變化，形成不同大小與方向的改變？

在本文的理論中選民貪腐感受對投票行為影響的程度改變是因為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經由複層次迴歸模型的使用，以總體與個體間的交叉效果確立此一關係存在。不論是左翼或右翼時期，當司法制衡力量提高時，貪腐這項變數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都有增加。也就是說左翼執政時期如果國家司法制衡力量低，則選民關於政府反貪腐表現的感受對其投票行為的影響效果有限，反之在高司法制衡力量的國家貪腐議題對於投票行為的影響更強，即本文推論中左翼國家的右轉是因為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導致貪腐議題顯著地對左翼執政黨課責，使選民投給右翼政黨。

在總體層次分析中我們觀察到近年來被彈劾與起訴的總統都處於司法制衡力量高的右轉國家，惟因貪腐下台的總統不僅是左翼，右翼總統亦包含於其中。雖然經濟民粹崛起的左翼於這幾年因貪腐議題造成退潮現象的發生，但若這些新右翼無法有效打擊貪腐，也會因選民的課責而下台，秘魯 PPK 總統的下台即為此例。

貳、 右轉時機－貪腐與經濟議題的重要性變化

考慮退潮現象的時間因素，既然左翼因經濟民粹而起，本文進一步比對是否在 2008 年左翼巔峰時人民最關注的國家問題是經濟議題，而到左翼失去政權時選民最關注的議題轉變為貪腐。如表格 4-9 與表格 4-10 所呈現，在未右轉持續由左翼執政的國家中，人民仍然認為國家最主要問題是經濟議題，符合過去左翼崛起文獻對經濟因素討論，以及左翼支持者來自中下階層選民的觀點。其中 2008 年到 2018 年之間認為經濟是國家主要問題的總變化提高 20%，以委內瑞拉最多；反之右轉國家的選民認為國家最大問題是經濟議題的比例縮小，認為是貪腐議題的比例上升。符合我們理論預期貪腐是影響左翼退潮的主因。其中 2008 年至左翼下台年間，經濟是主要問題的比例總變化縮減 54%，而貪腐是主要問題的比例總變化上升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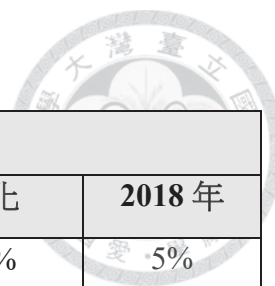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 2019 年時事的變化，阿根廷再度選出左翼總統 Alberto Fernández，而我們透過資料看到的是阿根廷至 2018 年時認為貪腐較重要的人數比例下降，從 2015 年右翼上台時的 5% 降至 2018 年的 3%，反之經濟議題重現，從 2015 年右翼上台時的 8% 到 2018 年高達 29%，符合過去研究認為左翼以經濟為口號上台的論述；相反地，玻利維亞於 2019 年左翼領導人 Evo Morales 因被選民質疑選舉舞弊而提出辭職，由右翼的 Jeanine Áñez Chávez 代為行使職權，我們可以看到玻利維亞選民認為貪腐為國家主要問題的比例有顯著上升，在 2008 年至 2018 年間上升 9%，同時認為經濟為主要問題的比例下降 3%。

表格 4-9: 國家主要問題－未右轉國家

貪腐是國家最主要的問題(%)			
國家	2008 年	2018	變化
厄瓜多	7%	8%	+1%
尼加拉瓜	2%	2%	±0%
玻利維亞	1%	10%	+9%
烏拉圭	1%	0%	-1%
委內瑞拉	3%	1%	-2%
總變化			+7%
經濟是國家最主要的問題(%)			
國家	2008 年	2018	變化
厄瓜多	18%	22%	+4%
尼加拉瓜	24%	17%	-7%
玻利維亞	12%	9%	-3%
烏拉圭	13%	10%	-3%
委內瑞拉	4%	33%	+29%
總變化			+20%

資料來源：Latinobarometer

表格 4-10: 國家主要問題－右轉國家



貪腐是國家最主要的問題(%)					
國家	2008 年	左翼下台當年度	左翼下台年	變化	2018 年
智利	1%	1%	2010	±0%	變 -5%
阿根廷	4%	5%	2015	+1%	3%
瓜地馬拉 ¹⁰⁵	2%	4%	2012	+2%	10%
巴拉圭	11%	10%	2013	-1%	13%
秘魯	4%	9%	2016	+5%	19%
巴西	5%	20%	2016	+15%	16%
巴拿馬	1%	1%	2009	±0%	7%
薩爾瓦多 ¹⁰⁶	0%	3%	2019	+3%	3%
總變化				+25%	
經濟是國家最主要的問題(%)					
國家	2008 年	左翼下台當年度	左翼下台年	變化	2018 年
智利 ¹⁰⁷	14%	3%	2010	-11%	2%
阿根廷	14%	8%	2015	-6%	29%
瓜地馬拉	19%	8%	2012	-11%	12%
巴拉圭	5%	2%	2013	-3%	4%
秘魯	24%	6%	2016	-18%	10%
巴西	2%	9%	2016	+7%	5%
巴拿馬	8%	8%	2009	±0%	13%
薩爾瓦多	23%	11%	2019	-12%	11%
總變化				-54%	

¹⁰⁵ 瓜地馬拉左翼於 2012 年下台，但 Latinobarameter 並沒有 2012 年之資料，故在此以 2013 年資料呈現。

¹⁰⁶ 由於薩爾瓦多左翼 2009 年才上台，故此處以 2009 年資料取代 2008 年資料，然而薩爾瓦多雖於 2019 年右轉，惟因資料只到 2018 年，爰採 2018 年之值。

¹⁰⁷ 2010 年 3 月 11 日右翼的 Sebastián Piñera 取代左翼 Michelle Bachelet 為總統，雖然 2014 年 Michelle Bachelet 再次繼任，而 2018 年 Sebastián Piñera 再度重回政權，對於此兩人輪流執政的情況，本文以 2010 年為右轉年做計算，本文之右轉時機指左翼浪潮後的第一次右翼執政。



參、 控制變項的討論

總體經濟評估對執政者課責的效果在左右翼執政時期都存在。若選民認為國家經濟狀況不好，左翼執政時期選民傾向投給右翼候選人；右翼執政時期則傾向投給左翼候選人，符合張佑宗(2006)對於經濟投票的選舉課責機制確實存在於拉美各國的證實。

在社會階級與性別的部分，拉丁美洲傳統上認為右翼的人口組成是統治階級，代表父權思想；左翼則是社會的進步主義，是都市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工團主義(Nikolajczuk & Prego, 2017: 11-12)。左翼的支持者主要為貧窮人口、原住民及農民等社會弱勢群體為主，冀求社經地位改變；右翼支持者則多為既存社會菁英及企業家，並與大眾媒體保有良好關係。左翼執政時期的分析結果符合此一論述，社會階級的迴歸係數約為 0.055，中低社會階級者傾向投給左翼，高社會階級者傾向投給右翼；性別的迴歸係數約為負 0.077，女性傾向投給左翼政黨，男性則傾向投給右翼政黨，符合既有文獻認為右翼政黨代表父權思想，而左翼政黨代表進步主義的觀點。

然而左翼退潮期間，新右翼執政時期社會階級與性別則對左右翼投票無顯著影響，本文推測這與右翼執政時期的政策方向有關，如 Niedzwiecki & Pribble (2017) 的研究指出這些新右翼沒有如同新自由主義時期採取全面緊縮福利政策開支。由於新上任的右翼政府並未放棄重分配政策，且二十一世紀至今右翼政府執政時期也確實降低吉尼係數，使社會階級、性別與左右翼投票傾向的藩籬被打破。譬如智利的 Piñera 政府就一定程度上維持過去左翼 Concertación 政黨聯盟實施 20 年的政策，得到中間政黨獨立區域黨(PRI)與中間偏左的基民黨在法案表決時的支持(Toloza Castillo & Toro Maureira, 2017: 147)。

在意識形態的部分，這些新右翼政府拒絕明確表態自己的意識形態，試圖打破過去左派與右派意識形態的對立，跳脫左右翼的爭論(Ansaldi, 2017: 49-50)。從分析結果而言，雖然選民政治傾向仍對其投給左翼或右翼政黨有所影響，但新右翼執政時期相比左翼執政時期，選民政治傾向對投票行為影響力相對較小。新右翼執政時期政治傾向迴歸係數為 0.079，僅一顆星顯著($p < 0.05$)；左翼執政時期則

為 0.158，達三顆星顯著($p < 0.001$)。這個結果反映在新右翼的政治新秀形象，由於其身分為政治界的局外人，能夠同時吸引傳統左右翼政黨的支持者，選民政治傾向對左右翼政黨投票的效果較左翼執政時期低。

最後是新右翼執政時期司法制衡愈高，選民愈不支持執政的右翼政府。由於這些新右翼國家都有較高的水平制衡力量（國會與司法制衡），合理的解釋是強水平課責與弱垂直課責同時存在會導致失根民主，造成政治系統與廣大社會脫節，如近年來右轉的巴西、智利及秘魯就是此類國家(Luna & Vergara, 2016: 162-163)。當水平課責機制回復，而人民偏好與政策制定之間的代表性連結仍舊疲弱，領導人沒有實踐競選諾言來回應選民需求，致使人民對領導人更為失望(Vergara & Watanabe, 2019: 37)。換言之，在缺少制度化垂直課責機構（政黨）的情況下，水平課責的提高會侵蝕垂直課責(Luna & Vergara, 2016: 164)，政黨無法代表人民，菁英失去代表公民社會的媒介(Luna, 2016: 135)，當選民感到聲音無法傳達至領導人耳旁時，對於現況的不滿會直接反映在對執政者的滿意度。此時當司法機構拋出貪腐議題，選民更有理由對當前執政的領導人課責 (Hagopian, 2016: 125-127)，如秘魯右翼 PPK 的貪腐改革承諾沒有實踐，加上貪腐行徑被司法機構起訴，使其失去人民的支持並受到國會的彈劾。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左翼浪潮時期，國家領導人會用激進而華麗的競選承諾，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且往往會限制水平制衡的力量(Caetano & Iber 2019: 44)。這股左翼浪潮之中，領導人以正式與非正式管道將權力集中於行政部門，影響行政、立法、司法三者間的權力平衡(Lanzaro, 2016: 121-122)。本文主張近年左翼勢力的退潮是由於貪腐議題致使選民投票行為產生改變，而貪腐議題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高司法制衡力量，跳脫過去缺乏水平課責力量的委任式民主，使司法機構能對行政部門的不法行為行使監督功能，進而對選民投票行為產生影響。隨著拉美貧富差距降低，以經濟民粹主義興起的左翼領導人，其中低社會階級支持者減少，再加上國家經濟的下滑使左翼政府重分配政策的實施遭遇瓶頸。當經濟下滑，政府必須減少公共支出並調整財稅政策時，會影響左翼政府對於重分配政策的承諾，進而對執政正當性造成影響(Oyhantçabal, 2019: 133)。鑒於近十年來不論左右翼執政貧富差距皆有下降，貪腐議題取代經濟議題成為選民心中關注的焦點，當司法機構對左翼執政者拋出貪腐議題時，選民便失去對左翼執政黨的信心。因此新右翼會將現任左翼政府的貪腐議題作為攻擊對象，如秘魯 2016 年選舉與巴西 2018 年選舉中貪腐都是重要議題，PPK 與 Bolsonaro 都誓言要司法改革展現打擊貪腐的決心。

在右翼的部分，拉丁美洲的右翼發展可以區分為三種，第一個是 1964 年到 1985 年的獨裁右翼，其次是 1985 年到 2000 年間的新自由主義，以及近年來崛起的新右翼(Segrera, 2016)。新自由主義時期拉美作為民主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右翼亦有嚴重貪腐問題。而近年來這些右轉國家中的新右翼與過去的右翼不同，過去的右翼會堅持其意識形態，而這些以新面孔出現的右翼拒絕明確表態自己的意識形態，試圖打破過去左右意識形態的對立，跳脫左右翼的爭論(Ansaldi, 2017: 49-50)。新右翼執政者往往是政治的局外人，超脫過去左右兩黨的身分有助於建立清廉形

象挑戰既存貪腐政治菁英，並實施強硬的反貪腐政策(de Moura, 2019: 380)，例如阿根廷的 Mauricio Macri、薩爾瓦多的 Nayib Bukele 及巴西的 Jair Bolsonaro。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首先要討論的第一個限制是左翼退潮並不代表拉丁美洲選民意識形態的右轉，左翼失去執政權後，取而代之的是中間偏右的政黨。在選民個人意識形態上並沒有從左至右的結構性轉變，而僅是貧窮人口減少及生活福利水準提高，使人民從經濟議題轉而重視司法機構拋出的貪腐議題，導致對左翼政府的課責。

其次是貪腐議題並非只對左翼政府產生效果，對右翼執政者亦有效果。雖然近年來新上任的右翼都以反貪腐作為主要政策目標之一，若不能達到讓選民滿意的反貪腐成效，這些右翼亦可能受到選民的課責而失去執政權。

第三是司法制衡力量提升的過程在各國的發展路徑不盡相同，諸如公民團體的倡議、司法機構內部的改革、總統對司法改革的政策與對司法部長的任命、打擊貪腐獨立機構的成立及與國際組織的合作等，尚欠缺司法制衡力量提升過程之通則化論述。

最後要澄清的是儘管本文認為拉美右轉是因為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導致貪腐議題變得重要，但司法制衡力量的提升不表示拉美的民主發展更為鞏固。由於軍人獨裁時期以及委任式民主時期弱化的公民社會與政黨體系仍未健全發展，水平課責力量的提升可能會侵蝕垂直課責，產生失根民主的現象。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張傳賢、張佑宗，2006，〈選舉課責：拉丁美洲國家政府施政表現與選舉得票相關性的研究〉，《台灣政治學刊》，10(2)，頁 101-147。

黃旻華，2006，〈如何看待穆斯林社會中政治伊斯蘭的民意支持？複層次迴歸模型的實證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1)，頁 119-169。

西文部分

Altman, D. G., & Bland, J. M. 1998. "Time to event (survival) data." *Bmj* 317 (7156): 468-469.

Andvig, J. C. 2006. "Corruption and fast change." *World Development* 34(2): 328-340.

Agis, E., Cañete, C. y Panigo, D. 2010. "El impacto de la asignación universal por hijo en Argentina." *Documento de trabajo CEIL-PIETTE*. Argentina.

Anria, S. 2016. "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More inclusion, less liberalism in Bolivia."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99-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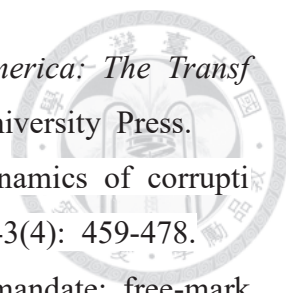
Ansaldi, W. 2017. "Arregladitas como para ir de boda. Nuevo ropaje para las viejas derechas." *Theomai* 35: 2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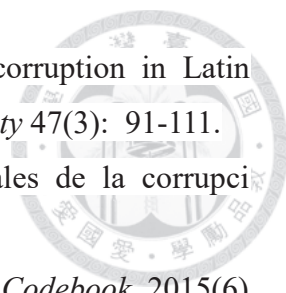
Black, D., Newing, R. A., McLean, I., McMillan, A., & Monroe, B. L. 1958.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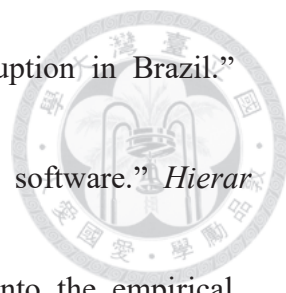
Bobbio, N. 1995. *Derecha e izquierda: razones y significados de una diferenciación política*. Madrid: Taurus.

Brunetti, A., & Weder, B. 2003. "A free press is bad news for corrup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7(7-8): 1801-1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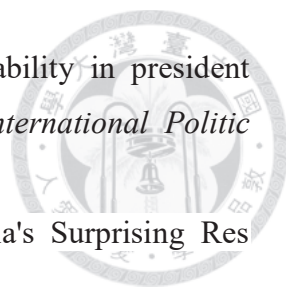
Baker, A. 2009. *The market and the masses in Latin America: Policy reform and consumption in liberalizing econom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Brooks, S. 2009. *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Market in Latin Americ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lán, M. 2011. "Competition by denunciation: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corruption scandals in Argentina and Chile." *Comparative Politics* 43(4): 459-478.
- Baker, A., & Greene, K. F. 2011. "The Latin American left's mandate: free-market policies and issue voting in new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63(1): 43-77.
- Bohn, S. R. 2012. "Corruption in Latin America: Understanding the Perception-Exposure Gap."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4(3): 67-95.
- Blanco, L., & Grier, R. 2013. "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68-90.
- Becker, M. 2013. "South America's left turn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0(3): 247-254.
- Biglaiser, G. 2016. "Mandate and the market: policy outcomes under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48(2): 185-204.
- Britos, V., Caballero, A., Espósito, E., Guerrero, S., Nieves, C., Pérez, M., & Ruiz Díaz, M. 2016. "El largo camino hacia la transparencia: apertura en línea de las juntas departamentales en Uruguay." *XV Jornadas de Investigación: el oficio del investigador en Ciencias Sociales*.
- Blanco, M. D. 2018. "Dictadura y guerrilla en Nicaragua Reflexiones sobre la finalización del conflicto, desmovilización y paz." *Revista Temas* (12): 237-251.
- Bentancur, N., & Busquets, J. M. 2019. "La Izquierda Gobernante En Uruguay (2005-2015). Análisis de Un Experimento Democrático Participativo."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6(1): 137-51.
- Bourscheid, J. I., & González, R. S. 2019. "Transición y precarización democrática paraguaya: los efectos de la baja calidad institucional y del comportamiento político negativo." *Colombia Internacional* (98): 31-65.
- Cox, D. R. 1972. "Regression models and life-tabl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34(2): 187-202.
- Coppedge, M. 1998. "The Dynamic Diversity of Latin American Party Systems." *Party Politics* 4(4): 547-5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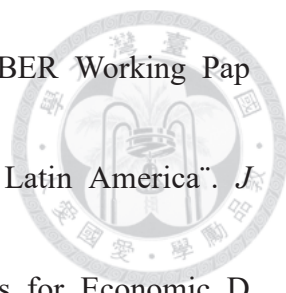
- 
- Canache, D., & Allison, M. E. 2005. "Perception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Latin American democracie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47(3): 91-111.
- Cabrera, J. O. P. 2008. "Causas políticas y consecuencias sociales de la corrupción." *Papers: revista de sociologia* 88: 153-164.
- Coppedge et al. 2015. "V-Dem Working Paper Series." *V-Dem Codebook* 2015(6)
- Conaghan, C. M. 2016. "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Ecuador under Correa."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109-118.
- Costa, F. 2018. "Democracia delegativa de alta intensidad: Una mirada sobre el régimen político argentino del siglo XXI." *Ciencia Nueva. Revista de Historia y Política* 2(1): 75-98.
- Colburn, F. D. 2019. "The Decay of The Central American Left." *Journal of Democracy* 30(3): 165-172.
- Caetano, G., & Iber, P. 2019. "Uruguay: The End of the Dream?" *Dissent* 66(1): 44-48.
- Dornbusch, R., & Edwards, S. 1991.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NBER Books*, 7-13.
- Davis, C. L., Camp, R. A., & Coleman, K. M. 2004. "The influence of party systems on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and electoral response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7(6): 677-703.
- Duarte-Recalde, L. 2017.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on in Paraguay."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10(1): 66-88.
- de Moura, M. 2019. "N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this country: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power in the Lula da Silva and Rousseff administrations (2003-201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8(2): 349-394.
- Ezrow, N. 2011. "The Importance of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 Conflict Resolution*: 1-11.
- Ezquerro-Cañete, A., & Fogel, R. 2017. "A coup foretold: Fernando Lugo and the lost promise of agrarian reform in Paragua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7(2): 279-295.
- Fried, B. J., Lagunes, P., & Venkataramani, A. 2010.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at the crossroad: a multimethod study of bribery and discrimination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7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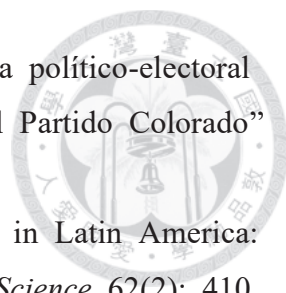
- 
- Geddes, B., & Neto, A. R. 1992.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orruption in Brazil." *Third World Quarterly* 13(4): 641-661.
- Garson, G. D. 2013. "Introductory guide to HLM with HLM 7 software."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Guide and applications*: 55-96.
- González, L. 2013. "Unpacking delegative democracy: digging into 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a rich theoretical concep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uillermo O'Donnell and the Study of Democracy, September 16.
- Heywood, P. M. 2007. "Corruption in contemporary Spain."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40(4): 695-699.
- Hagopian, F. 2016. "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Brazil's Accountability Paradox."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119-128.
- Houtart, F. 2017. "Latin America: End of a Cycle or Collapse of Post-Neoliberalism?" *Social Scientist* 45(7/8): 3-6.
- Johnston, M. 1997. "Public officials, private interests, and sustainable democracy: When politics and corruption meet." *Corrup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83: 61-82.
- Jiménez, F. 2004. "The politics of scandal in Spain: Morality plays, social trust, and 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7(8): 1099-1121.
- Jorge, C., & Castaneda, J. G. 2006.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Foreign Affairs* 85(3): 28-43.
- Kiefer, N. M. 1988. "Economic duration data and hazard fun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2): 646-679.
- Kaltwasser, C. R. 2014. "La derecha en América Latina y su lucha contra la adversidad." *Nueva sociedad* 254: 34-45.
- Kaijser, A. 2014. *Who is marching for Pachamama?: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struggles in Bolivia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Evo Mora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Lund University, Sweden.
- Lipset, S. M. 2000.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1(1): 48-55.
- Lodola, G., & Queirolo, R. 2005. *Ide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Lora, E., Olivera, M., Galiani, S., & Bó, E. D. 2005.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Economia* 5(2): 1-61.
- López, M. 2010. "LA DEMOCRACIA EN PARAGUAY Un breve repaso sobr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tradicionales, el sistema electoral y el triunfo de Fernando Lugo Méndez." *Ciencia Política y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8(13): 89-106.
- Levitsky, S. 2011. "Peru's 2011 Elections: A Surprising Left Turn." *Journal of Democracy* 22(4): 84-94.
- Luna, J. P., & Kaltwasser, C. R. 2011. "Las derechas gobernantes en América Latina: hacia una caracterización preliminar." *LASA Forum* 13(3): 16-19.
- Lansberg-Rodríguez, D. 2016. "Life after Populism: Reforms in the Wake of the Receding Pink Tide." *Geo. J. Int'l Aff.* 17(56): 56-65.
- Lanzaro, J. 2016. "El centro presidencial en Uruguay 2005-2015." *Revista Uruguaya de Ciencia Política* 25(2): 121-142.
- Luna, J. P. 2016. "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Chile's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129-138.
- Luna, J. P., & Vergara, A. 2016. "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Latin America's Problems of Success."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158-165.
- Mauceri, P. 1995. "State reform, coalitions, and the neoliberal autogolpe in Peru."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0(1): 7-37.
- Mainwaring, S. 1999. *Rethinking party systems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on the case of Brazi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tinola, G. R., & Jackman, R. W. 2002. "Sources of corruption: A cross-country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1): 147-170.
- March, L. 2007. "From vanguard of the proletariat to vox populi Left-populism as a 'shadow'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7(1): 63-77.
- Murillo, M. V., Oliveros, V., & Vaishnav, M. 2010. "Electoral revolution or democratic alternati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87-114.
- Martinez-Torres, M. E., & Rosset, P. M. 2010. "La Vía Campesina: the birth and evolution of a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7(1): 149-175.

- 
- Marsteintredet, L. 2014. "Explaining variation of executive instability in presidential regimes: Presidential interruption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5(2): 173-194.
- Mayka, L. R. 2016. "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Colombia's Surprising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139-147.
- Mann, C. G. 2016. "Panamá: luces y sombras en torno a la institucionalidad democrática."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36(1): 259-285.
- Melo, M. A. 2016. "Latin America's New Turbulence: Crisis and Integrity in Brazil." *Journal of Democracy* 27(2): 50-65.
- Mitchell, R. 2016. "The Pink Tide Recedes: End of An E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 Washington.
- Michener, G., & Pereira, C. 2016. "A Great Leap Forward for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Brazil's Mensalão Trial."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48(3): 477-507.
- McNulty, S. 2017. "Peru 2016: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n Electoral Year."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37(2): 563-587.
- Nye, J. S. 1967.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2): 417-427.
- Newell, J. L. 2008. "Introduction: corruption and democracy in We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9(1): 1-7.
- Noriega, A. C., & Puerta, M. I. 2015. "Quo vadis Venezuela": de la democracia delegativa al autoritarismo del siglo XXI. *Revista Mexicana de Análisis Político y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7: 175-202.
- Niedzwiecki, S., & Pribble, J. 2017. "Social policies and center-right governments in Argentina and Chile."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9(3): 72-97.
- Nitlajczuk, M., & Prego, F. 2017. "Las ciencias sociales frente al avance de las "nuevas" derechas en América Latina en el siglo XXI." *Leviathan* 14: 1-25.
- Nadeau, R., Arel-Bundock, V., & Daoust, J. F. 2019.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3): 000-000.
- O'Donnell, G. A. 1994.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1): 55-69.

- 
- O'Donnell, G. A. 1998.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9(3): 112-126.
- O'Donnell, G., Iazetta, O., & Quiroga, H. 2011. *Democracia Delegativa*. Buenos Aires: Prometeo Libros.
- Oyhantçabal, G. 201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gressive Uruguay, 2005–2016."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6(1): 122-136.
- Pierson, P. 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World politics* 48(2): 143-179.
- Pop-Eleches, G. 2008. *From economic crisis to reform: IMF programs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ibble, J. 2013. *Welfare and party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érez, O. J. 2017. "Panama: Democracy under the shadow of corruption." *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 37(2): 519-541.
- Piñeiro, D. E., & Cardeillac, J. 2017. "The Frente Amplio and agrarian policy in Uruguay."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7(2): 365-380.
- Pérez-Liñán, A., & Polga-Hecimovich, J. 2017. "Explaining military coups and impeachments in Latin America." *Democratization* 24(5): 839-858.
- Quiroga, M. M. 2009. "Corrupción y democracia: América Latina en perspectiva comparada." *Gestión y política pública* 18(2): 205-252.
- Raudenbush, S. W., & Bryk, A. S.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CA: 1:485.
- Rothstein, B., & Uslaner, E. M. 2005. "All for all: Equality, corruption, and social trust." *World politics* 58(1): 41-72.
- Remmer, K. L. 2012. "The rise of Leftist–Populist Governance in Latin America: the roots of electoral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5(8): 947-972.
- Rose-Ackerman, S., & Palifka, B. J. 2016.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jas, R. 2017. "The ebbing 'pink tide': An autopsy of left-wing regimes in Latin America." *New Labor Forum* 26(2): 70-82.

- 
- Sala-i-Martin, X. 2002.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BER Working Paper: 8933.
- Seligson, M. A. 2007.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18(3): 81-95.
- Skidmore, T. E., Smith, P. H., & Green, J. N. 2010.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kidmore, T. E., Smith, P. H., & Green, J. N. *Modern Latin America 7th edit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9-368.
- Saiegh, S. M. 2015. "Using joint scaling methods to study ideology and representation: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Analysis* 23(3): 363-384.
- Segrera, F. L. 2016. *América Latina: crisis del posneoliberalismo y ascenso de la nueva derecha*. CLACSO.
- Sánchez, A., & Goda, T. 2018. "Corruption and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40(2): 675-693.
- Talia, P., & Ernesto, M. 2017. "La institucionalización partidista y su relación con la calidad de la democracia: Paraguay y Uruguay en perspectiva comparada."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 62(229): 297-330.
- Tolosa Castillo, M., & Toro Maureira, S. 2017. "Amigos cerca, enemigos más cerca: el gobierno de Sebastián Piñera y las dinámicas legislativas en Chile." *Revista Uruguaya de Ciencia Política* 26(1): 131-149.
- Van Rijckeghent, C., and Weder, B. 2001.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the rate of temptation: do wages in the civil service affect corruption, and by how mu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5(2): 307-31.
- Vittinghoff, E., & McCulloch, C. E. 2007. "Relaxing the rule of ten events per variable in logistic and Cox reg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65(6): 710-718.
- Valente, R. R., & Berry, B. J. 2015. "Countering Inequality: Brazil's Movimento Sem-Terra." *Geographical Review* 105(3): 263-282.
- Vergara, A., & Watanabe, A. 2016. "Delegative Democracy Revisited: Peru Since Fujimori."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148-157.
- Vergara-Camus, L., & Kay, C. 2017. "Agribusiness, peasants, left-wing governments,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An overview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7(2): 239-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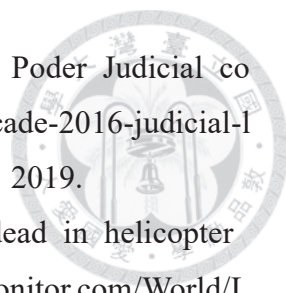
- 
- Villagra, S. P. C., & Delgadillo, J. M. S. 2018. “La alternancia político-electoral en Paraguay la elección de Fernando Lugo y la caída del Partido Colorado” *Apuntes Electorales* 17(58): 133-158.
- Valdini, M. E., & Lewis-Beck, M. S. 2018. “Economic Voting in Latin America: Rules and Responsi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2): 410-423.
- Vergara, A., & Watanabe, A. 2019. “Presidents without Roots: Understanding the Peruvian Paradox.”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6(5): 25–43.
- Weyland, K. G. 1998. “The politics of corruption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9(2): 108-121.
- Williamson, J. 2003. “From Reform Agend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Suggestions for What to do Next” *Finance & Development* 40(3): 10-11.
- Wiesehomeier, N., & Benoit, K. 2009. “Presidents, parties, and policy competi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1(4): 1435-1447.
- Woltman, H., Feldstain, A., MacKay, J. C., & Rocchi, M. 2012. “An introduction to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utorials in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psychology* 8(1): 52-69.
- Wiesehomeier, N., & Doyle, D. 2013. “Discontent and the left turn in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1(2): 201-221.
- Witte-Lebhar, B. 2015. “Chilean President Boggled Down by Concurrent Corruption Cases.” *NotiSur*: 1-3.
- Warf, B., & Stewart, S. 2016. “Latin American corruption in geograph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Geography* 15(1): 133-155.
- Wong, M. Y. 2017. “Public spending, corrup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3): 298-315.
- Yamamura, E. 2014.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its effect on preferences for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perceived tax burden.”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15(1): 71-100.

網路資料



- BBC Mundo. 2018. “PPK y otros 5 presidentes de América Latina que no pudieron terminar sus mandatos por acusaciones de corrupción.”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internacional-43509229>.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BBC Mundo. 2018. “Perú: renuncia el presidente Pedro Pablo Kuczynski (PPK) entre acusaciones de corrupción y sobornos.”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3481060>. Latest update 13 December 2019.
- BBC News. 2018. “Argentina notebook scandal: Driver details 'decade of bribe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45049064>. Latest update 29 December 2019.
- BBC Mundo. 2019. “Alan García: de qué acusaban al expresidente de Perú que se suicidó cuando lo fueron a detener.”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7967534>.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BBC Mundo. 2019. “Evo Morales renuncia a la presidencia de Bolivia y denuncia un golpe de Estado.”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50370125>. Latest update 12 November 2019.
- BBC Mundo. 2019. “Crisis en Venezuela: qué busca Bolivia con su ingreso al Grupo de Lima, la alianza regional contra el gobierno de Nicolás Maduro.”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50888957>. Latest update 23 December 2019.
- Benjamin Russell. 2019. “Legal Trouble for Latin American Presidents.” *Americas Quarterly*.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content/presidents-prison-temer>.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CICIG. <https://www.cicig.org/>. Latest update 6 January 2020.
- Consejo de la Magistratura, <http://www.cmagistratura.gba.gov.ar/>, Latest update 20/11/16.
- CÑÑ. 2017. “El mapa de los presidentes acusados de corrup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https://cnnespanol.cnn.com/2017/07/13/el-mapa-de-los-presidentes-acusados-de-corrupcion-en-america-latina/>.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Coppedge, Michael, John Gerring, Carl Henrik Knutsen, Staffan I. Lindberg, Jan Teorell, David Altman, Michael Bernhard, M. Steven Fish, Adam Glynn, All

- en Hicken, Anna Lührmann, Kyle L. Marquardt, Kelly McMann, Pamela Paxton, Daniel Pemstein, Brigitte Seim, Rachel Sigman, Svend-Erik Skaaning, Jeffrey Staton, Steven Wilson, Agnes Cornell, Lisa Gastaldi, Haakon Gjerløw, Nina Ilchenko, Joshua Krusell, Laura Maxwell, Valeriya Mechkova, Juraj Medzihorsky, Josefina Pernes, Johannes von Römer, Natalia Stepanova, Aksel Sundström, Eitan Tzelgov, Yi-ting Wang, Tore Wig, and Daniel Ziblatt. 2019. "V-Dem [Country-Year/Country-Date] Dataset v9". 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 <https://doi.org/10.23696/vdemcy19>.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Collyns, D. 2019. "Bolivia president's initial indigenous-free cabinet heightens polarizatio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nov/14/bolivia-president-jeanine-anez-cabinet-indigenous>. Latest update 19 November 2019.
- Daniel Pardo. 2017. "‘No quiero, pero no puedo decepcionar a mi pueblo’: Evo Morales habla sobre su tercera reelección en Bolivia y la intención de quedarse en el poder hasta 2025." <https://www.bbc.com/mundo/noticias-america-latina-42273980>. Latest update 12 November 2019.
- Dom Phillips. 2017. "Brazil's ex-president Lula sentenced to nearly 10 years in prison for corruptio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jul/12/brazil-president-lula-convicted-corruption>. Latest update 15 November 2019.
- Deutsche Welle. 2018. "Perú: habrá referéndum para reformas política y judicial." <https://www.dw.com/es/per%C3%BA-habr%C3%A1-refer%C3%A9ndum-para-reformas-pol%C3%ADtica-y-judicial/a-44865151>. Latest update 13 December 2019.
- Ducreux, E. 2019. "Juega Vivo: Panameño bobo." *La Juventud Opina*. <http://www.archive.voicesofyouth.org/es/posts/juega-vivo--2>. Latest update 12 December 2019.
- Justicia Legítima. <http://justicialegitima.org/mision.html>. Latest update 2019/11/16.
- Latinobarometer. <http://www.latinobarometro.org/lat.jsp>. Latest update 2019/06/25.
- Margot Desautez. 2017. "Los presidentes destituidos en América Latina en los últimos 25 años." Deutsche Welle (DW).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 Perú21. 2016. “PPK en clausura de CADE 2016: ‘Tenemos un Poder Judicial con leyes anticuadas.’” <https://peru21.pe/politica/ppk-clausura-cade-2016-judicial-leyes-anticuadas-234903-noticia/>. Latest update 13 December 2019.
- Servin, P. 2013. “Lino Oviedo, Paraguay presidential hopeful, dead in helicopter crash.”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Latest-News-Wires/2013/0204/Lino-Oviedo-Paraguay-presidential-hopeful-dead-in-helicopter-crash>. Latest update 29 December 2019.
- Santiago Riesgo Pérez. 2018. “Latinoamérica se hace de derechas” in <http://www.rve.es/noticias/20181030/latinoamerica-se-hace-derechas/1829180.shtml>.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8. “Policy and Research—Surveys and Indice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cpi2018> Latest update 25 June 2019.
- Última Hora. 2018. “Marito propone un plan estratégico de desarrollo nacional con 12 puntos.” <https://www.ultimahora.com/marito-propone-un-plan-estrategico-desarrollo-nacional-12-puntos-n1140913.html> . Latest update 22 November 2019.
- Univision. 2019. “Ordenan 3 años de prisión preventiva al expresidente de Perú Pedro Pablo Kuczynski acusado de corrupción.” <https://www.univision.com/noticias/america-latina/ordenan-3-anos-de-prision-preventiva-al-expresidente-de-peru-pedro-pablo-kuczynski-acusado-de-corrupcion>.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
- Wor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orld Bank. in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Latest update 26 June 2019.